

秋天小语

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告诫我们：在“菊暗荷枯一夜霜”的季节，素有高洁情怀的荷、菊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圣斗士”之感慨。可是，当下的果并不逊色于昔日的花，对当下之景的顺应、注目、欣赏影响着你的心绪、姿态和取向。

荷塘沉寂的死水、枯败的茎干和零乱的倒影在灰色的天空、朔风的季节和迟暮的风景中，渲染不枝蔓、不妖艳、不规则的线条、色彩和韵味，憧憬“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幻梦、燃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火焰、拾起“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怅然，诠释着枯叶无存的本身、污泥不染的本能和繁华落尽的本真。

孤标傲世的菊花仿佛迟暮的美人香销玉殒，绕梁三日的菊香犹如飞逝的时光渐行渐远，姿怀贞秀的菊枝似乎不屈的斗士挺拔劲节，远离尘俗的东篱好像羞涩的南山云苦雾罩。“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偏爱、“蕊寒香冷蝶难来”的孤寂、“冲天香气透长安”的浩气，消逝在西风愁起、霜风凄紧的肃杀之中了。

茅舍在橘林的垂青中、橘林在山丘的遐想中、山丘在故乡的梦境中，故乡悠然、飘然、灿然于硕果累累的枝头。傲霜而立的残枝反衬着“经冬犹绿林”的意绪、“可以荐嘉客”的青黄、“自有岁寒心”的神韵、“江南有丹橘”的好景，炊烟袅袅的笛音弥散成田野、小溪、山坡、茅舍、竹篱、橘林上飘荡、弥漫、笼罩的初冬薄雾和仙境祥瑞。竹篱茅舍、香雾喂人、橙黄橘绿，这不是一年中最新最美的景色吗？



研究 SUSHIYANJIU

2010年第3期（总第22期）



目 录

□特 稿

- 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年
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周成仕/4
-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年总结报告 张志烈/5
- 弘扬东坡创新精神 继续推进苏轼研究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年纪念活动总结讲话 苏 灿/10

□苏学论坛

- 心心相印
——简说东坡与少陵精神特质的契合 张志烈/15
- 谈谈苏轼的“疑”
——由读《石钟山记》想到的 胡先酉/24
-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试探苏轼的文赋对赋体的承传与创新 陈慧君/28
- 苏东坡晚年美学境界的新追求
与指导文学创作的新思想 李景新/32
- 苏东坡如何适应谪居的黄州环境
——兼述其黄州诗文中的环境信息 陈 弼/35

-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 主 编：张志烈
- 执行主编：周成仕
-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 特邀编辑：孙开中
-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308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com>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03—006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9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靖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希龙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何家治 周成仕 周裕锴
涂普生 熊 英 蔡心华

清丽舒徐 出人意表

——论苏轼婉约词的创新 陈立华/40

论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与超越

——兼论苏轼贬寓黄州后人生思想的重大转变 王启鹏/43

共享为义 适度即尊

——论北宋黄州酒业与苏东坡酒趣 周金平 童菁/49

苏轼与禅师的交游 彭印川/55

“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

——兼与有关“东坡地在何方”争鸣的朋友商榷 饶学刚/59

□诗文鉴赏

颍水清流 淡泊明志

——苏轼《泛颍》赏析 熊朝东/62

□新书序评

草野文化的力作

——读熊朝东《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 孙开中/64

□苏学专家

赤壁矶头唱大江

——记“赤壁山人”王琳祥 何志弘/68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四) 池泽兹子/70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六)

——省费养财 社稷之福 雷金贵/73

□本期关注

悼词——哀挽孔凡礼先生 刘尚荣/77

一蓑烟雨任平生

——悼著名学者孔凡礼先生 余世磊/78

挽词 唁电 张志烈 刘尚荣等/79

□苏学动态

《苏轼全集校注》出版 王书华/封二

《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出版 一 杨/14

三十而立 继往开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年举行纪念活动 流水/80

新增顾问、副会长、理事等名单 /80

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年 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周成仕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今年适逢纪念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年，我们在东坡老家隆重集会，举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 10 届理事会暨“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在此，我代表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向不远千里、不辞辛劳、不怕炎热前来参加会议的学会领导、学会会员和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声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苏轼遗迹遗址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迄今，苏轼遗迹遗址地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河南平顶山、浙江杭州、陕西凤翔、山东烟台、海南儋州、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河北栾城、河南郟县、江苏江阴先后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共同主办了 16 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和 7 次纪念活动暨苏轼学术研讨会。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苏轼研究热潮。

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弘扬东坡精神，传承东坡文化。近年来，紧紧围绕保护、发掘、继承、弘扬三苏文化，做了一系列工作。改扩建三苏祠，修建三苏纪念馆，改造通惠河，重修“中国名楼”远景楼。2007 年 5 月到 6 月，组织了“东坡足迹万里行”活动，考察团历时 48 天，行程万余公里，对东坡先生曾经为官的 16 个城市进行了学习考察，将活动情况拍成 18 集专题片，还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了 7 集电视纪录片《走遍中国·眉山》。以东坡遗迹遗址地为名新命名了城市

街道，将东坡的半身像作为城市标志，将“东坡老家，快乐眉山”作为城市名片主题词。加大东坡文化研究力度，成立了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聘请了 21 位省内外苏学专家为三苏文化特约研究员，实施《三苏文化研究规划》和《三苏文化创作规划》；着力于东坡文化的应用研究，先后出版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两本学术专著。在互联网上开设以“鉴赏三苏诗文、感悟三苏精神、弘扬三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三苏文化研究网。广泛开展东坡知识竞赛，创办《苏轼研究》，出版发行《眉山苏轼》，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打造中国文人系列重头戏“品苏轼”。继 2007 年成功举办东坡国际文化节之后，去年又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公开出版发行“三苏传”。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东坡文化在眉山和全国各地的传承和弘扬，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苏学专家、学者的肯定，受到人民群众欢迎。

各位朋友，因为苏东坡，我们欢聚眉山，共同探讨东坡创新思想，体味东坡百味人生，弘扬东坡文化。我们相信东坡精神一定能发扬光大，东坡文化一定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一定能成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最具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专家学者、各位朋友顺利、健康、快乐！

2010 年 8 月 18 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共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年 总结报告

张志烈

各位朋友：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1980 年 9 月成立于眉山，到今天已经 30 年了。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家在各方面拨乱反正，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应运而生。30 年来，在有关苏轼遗迹遗址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带动下，在全体会员朋友的努力下，学会发挥了桥梁作用、推动作用，为整理、研究、学习、宣传苏轼文化精神，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里，我受理事会委托，对学会 30 年来的活动，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一、三十年回顾

（一）三十年重大活动

1. 召开全国性苏轼学术研讨会议 16 届

从 1980 年至今，按照惯例，组织开展了两年一届的苏轼学术研讨会议 16 届。从第 1 届到 16 届，依次分别在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河南平顶山、浙江杭州、陕西凤翔、山东烟台、海南儋州、四川眉山、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河北栾城、四川眉山、河南郟县、江苏江阴、江苏徐州举行。结合学术研讨会还举行了苏轼贬惠 890 周年、苏轼诞生 960 周年、苏轼知徐 920 周年、苏轼逝世 900 周年、苏轼葬郟 900 周年和苏轼知徐 930 周年纪念活动。

2. 另外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议 7 次

1987 年 9 月在四川眉山举行了纪念苏轼诞生 950 周年暨苏轼学术研讨会、1987 年 12 月在海南儋州举行了纪念苏轼贬儋 890 周年暨苏轼学术研

会、2007 年 9 月在陕西凤翔举行了苏轼文化研讨会、2007 年 11 月在四川眉山举行了纪念东坡诞辰 970 周年暨苏轼民本思想研讨会、2008 年 11 月在四川眉山举行了苏东坡酒文化研讨会、2009 年 4 月在四川眉山举行了纪念苏洵诞辰 1000 周年暨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2010 年 1 月在广州从化举行了首届广州从化苏东坡国学论坛暨纪念苏东坡诞辰 973 周年活动。

（二）三十年重要成果

1. 学术研究成果丰硕

（1）三苏作品整理出版方面。全集、选集的点校、笺注、注释、赏析等多达上百种，其中影响最大者莫如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曾枣庄等主编的《三苏全书》，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薛瑞生《苏轼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刘乃昌《苏轼选集》，王水照《苏轼选集》，张志烈的《苏轼选集》等。

（2）三苏研究专著成果方面。会员专著约百种，如王水照的《苏轼论稿》、刘乃昌的《苏轼文学论集》、曾枣庄的《苏轼研究史》、朱靖华的《苏轼新论》、杨胜宽的《苏轼人格研究》、潘殊闲的《叶梦得与苏轼》等。

（3）三苏生平传记方面。此类作品如雨后春笋，数量惊人，据不完全统计约二百种。本世纪苏轼传记发端于林语堂旅美期间用英语写作的《苏东坡传》，此书于 1947 年在海外以英文出版；七十年代，由台湾的宋碧云、张振玉分别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版本众多（10 多家出版社出版了 20 多种版本），流布所及，影响巨大。学会会员撰写的苏轼传记如曾枣庄、王水照、颜中其、熊朝东、刘小川

等的传记影响较大。

2. 学术研究队伍壮大

学会领导在纯粹的学者班子、大学教授的基础上,逐步吸收了党政领导进入,如第七届理事会增选了时任眉山市委副书记的苏灿和时任眉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宋明刚任副会长,第九届增选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成仕和曾任徐州市市长、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希龙为副会长。我们将按照《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章程》逐步吸收研究、挖掘、弘扬东坡文化上有突出贡献的苏氏后裔、企业精英为理事、常务理事,甚至副会长。

学会会员自成立初的 56 人发展到现在涵盖全国各地 268 人,其中四川省会员 87 人,其余绝大多数分布在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充分反映了研究会的权威性、广泛性和群众参与性。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纷纷掀起了东坡文化研究的热潮。仅从 2001 年在眉山举行的第 13 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国外参会者来看,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苏学专家和学者多达 40 余人。

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影响下,苏轼遗址遗迹地出现了东坡文化研究热潮,纷纷成立研究会、学会,如郫县苏轼文化研究会(2002.8)、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2002.10)、江阴市苏东坡研究会、栾城县苏轼文化研究会、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2008.3)、黄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2009.12)、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2010.1)等。

发表苏轼研究成果的书刊有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朱靖华、刘尚荣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2004 年创刊),中国苏轼研究会主办的《苏轼研究》(2005 年创刊),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主办的《三苏祠》(2002 年 7 月创刊,出版 11 期后于 2004 年停办;2008 年复刊),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主办的《苏学通讯》,出版的《苏东坡研究丛刊》(已出三辑),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放鹤亭》(2009 年创刊),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主办的《载酒堂》(2010 年创刊),有的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乐山师范学院、黄冈师范学院等的学报、学刊开辟有“苏轼研究”专栏等。

此外,代表海内外 50 万苏氏族人的世界苏姓宗亲总会于 1994 年 3 月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中国大陆各地亦成立有苏氏联谊会,如四川苏氏宗亲

联谊会、广东苏氏联谊会、北京苏氏联谊会、河北栾城县苏氏联谊会、山东济南章邱苏氏联谊会,等等。许多苏姓人编撰家谱,认苏轼为祖;自费参加苏轼会议;到眉山祭祖朝圣,捐款捐物。

3. 学术研究机构健全

(1) 成立机构

2007 年 3 月 16 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挂牌成立,作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挂靠的专门工作和管理机构。该机构是经眉山市编委 2006 年第 2 次会议和市委 1 届第 157 次常委会议研究,批准同意成立的,属核定收支、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的副县级事业单位。核定事业编制 5 名、人员控制数 4 名,内设办公室、研究室和创作室中层机构。逐步配置了院长、副院长、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和创作室主任各 1 人;配备办公室 6 间、会议室 1 间。从而加强了学会与全国各地和海外苏学专家的联系,使学会日常工作顺利开展。2009 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被评为优秀学会。

(2) 创办会刊

川新出报刊[2006]8 号批复同意创办《苏轼研究》(季刊),市委、市政府每年下拨学会会刊经费共 7 万元。研究会会刊定期出版 1000 册,免费赠阅会员、各大图书馆、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和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苏学专家学者。创刊至今已经出版 21 期,发表了 200 多万字的苏轼研究论文,在苏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 2009 年度眉山市报刊评审中,《苏轼研究》被评为一级报刊。

(3) 修改章程

学会迁眉之后,理事会几次对学会章程进行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使之更加有利于学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这次理事会也将对章程进行小范围的修改。

4. 成果转化成效显著

为弘扬东坡文化,四川眉山扩建了眉山三苏祠博物馆。2006 年,眉山邀请有关专家对三苏祠的建设发展重新规划,相继投入资金 8000 多万元,恢复了纱縠行三苏祠西段,修建了三苏纪念馆、东园、西园、游客服务接待中心等。现占地面积百亩,是四川传统园林的典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AAA 旅游景区。

以东坡文化为契机,河北栾城新建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1998 年,栾城县委、县政府针对栾城苏

东坡祖籍源远流长,“三苏”文化遗存多、史料性强的特点,在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作出了“开发民族文化遗产,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迅即派出多批次人员调查取证,征集资料,整理归纳,为苏东坡祖籍纪念馆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先后召开了“开发栾城文化旅游资源研讨会”、“三苏文化考察万里行”、“栾城县筹建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完成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项目建议书。2002年,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建成并进入布展阶段,2003年对外接待来访游客。

运用研究成果,提升城市竞争力。东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集苏洵、苏辙文化成就而形成的融哲学、历史学、文学、领导学、军事学、养生学、美学、烹饪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把东坡文化研究成果,运用于城市建设可大大提高城市的品位,例如,苏东坡的出生地原眉山县拆县建区以后,就以东坡的名字来命名为东坡区。尤其是东坡区中心城市的许多街道、学校、建筑、景点都以苏东坡的名字或诗词来命名。例如,东坡镇、东坡中学、东坡大道、东坡广场、东坡公园、东坡湖等等。据统计东坡区228条街道的名称都与三苏父子的名、字、号和诗词文赋有关,赋予了这些街道、建筑、景点以深刻的文化内涵。从全国其他一些城市来看,用东坡的名字、诗词给学校、广场、影院、餐馆、酒店、商店、商品、菜谱等命名的比比皆是。再如徐州10多年时间累计投资约12亿元,建设云龙山东坡风景文化带、金山苏公塔文化游览区、小南湖苏公岛文化游览区、云龙湖月亮岛婚庆园、故黄河风光带等5个组团组成的徐州苏轼文化游览区,成为全国苏轼文化内涵最为厚重的点睛之笔。这些景点和城内原有的“黄楼”、“快哉亭”、“逍遥堂”、“燕子楼”、“知春岛”、“苏姑阁”、“景苏堂”“霖雨山庄”“东坡生态公园”等景区景点连成一片,使徐州市东坡文化景点达到50多个,分布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大大地提升了徐州城市的文化品位。

运用研究成果,发展东坡文化产业。东坡文化旅游业发展迅速,苏轼遗址遗迹地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有眉山三苏祠、郪县三苏祠与墓、黄冈东坡赤壁、海口五公祠、儋县东坡书院等五处。东坡文化酒业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如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苏东坡系列酒——状元酒、八

方太守酒、兵礼尚书酒、皇帝恩师酒,负载苏东坡人文精神之魂,承载中国白酒自然基因之重,以其厚重的文化积淀受到消费者欢迎,其他如河北省中山松醪酒业有限公司、河北省味道府酒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东坡酒业有限公司等。其它东坡文化产业发展亦蔚为大观,十分可喜。

(三) 三十年重要影响

1.促进了对东坡文化的宣传。如眉山组织了“东坡足迹万里行”活动:2007年5-6月,考察团历时48天,行程万余公里,对东坡曾经为官的16个城市进行了学习考察,将活动情况拍成18集专题片、编辑成《千年英雄——苏东坡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评选1001至2000年世界杰出人物活动中,共评出12名杰出人物,称为“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的评论员文章。

中央电视台教育科学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在黄金时段播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主讲的专题讲座《康震评说苏东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电视剧及电影则有寥全京编剧的10集电视系列专题片《大江东去》,徐芬夫妇编剧的20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四川影视艺术制作中心录制),冷成金编剧的44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香港亚洲电视台拍摄的电影《骚东坡》,惠州创作了20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与王朝云》,定州秧歌剧代表剧目《安安送米》被确立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描写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纷纷出版,如东方龙吟的《万古风流苏东坡》(一二卷)已经完成并出版了前十卷,吉林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起连续出版;易照峰的《苏东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王中亚的《大宋文豪》第一部《但愿一识苏徐州》,凤凰出版社2010年出版。此外还有李时英的《苏东坡》、成宗田的《风流学士》、赵遵生的《西湖太守苏东坡》等。

在互联网开设东坡文化网页,使东坡文化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国学网有苏洵研究、苏轼研究、苏辙研究专栏。新华网眉山频道、眉山市政协、三苏文化研究网、三苏祠、中国苏轼文化研究网(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主办)等有东坡文化栏目或者是

专门的东坡文化栏目，随时发布东坡文化研究的信息。

2. 促进了对东坡文化的研究。学会联络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出版部门和苏轼遗址遗迹地的数百名苏学专家学者和爱好者，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凝聚力，其学术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30年来概括言之：

捍卫了苏轼的品德名誉。1980年9月苏轼研究会成立暨首届苏轼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在政治上如何评价苏轼的问题，摘掉了苏轼是大地主顽固派、投机派、两面派、保守派的帽子，大家从实际出发对苏轼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苏轼恢复了名誉。

推进了苏轼的文学研究。1-16届都有研究苏轼诗、词、文、赋、书、画的论文，结合研讨会所在地黄州、惠州、儋州、杭州、凤翔、密州、徐州的创作和思想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的研讨，把苏轼的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开拓了苏轼文化研究。由对苏轼晚年思想、葬郑原因、文化性格等的研究拓展开去，并逐步开展了对苏轼的全面研究，广泛涉及到诸如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养生、餐饮、建筑等领域。最近，又涉及东坡文化符号、东坡文化产业创意、东坡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四）三十年基本经验

1. 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如已经逝世的学会前期领导：首任会长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杨明照先生；首任副会长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胡国瑞先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廖永祥先生；前期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朱靖华先生；还有前期顾问、著名学者钱钟书、夏承焘、朱东润、王起、唐圭璋、陈迥冬等先生。依然健在的学会前期领导：四川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邱俊鹏先生、曾枣庄先生、张志烈先生，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王水照先生，山东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刘乃昌先生，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苏寰中先生，浙江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陆坚先生，海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唐玲玲先生。由于他们的参与大大地提高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能够得到苏轼遗址地党委、政府的积极支持。

2. 有苏轼遗址地的党委、政府的积极支持。30

年前由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眉山县文教局发起了全国首届苏轼学术讨论会。迄今，苏轼遗址地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广东惠州、河南平顶山、浙江杭州、陕西凤翔、山东烟台、海南儋州、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河北栾城、河南郟县、江苏江阴先后与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共同主办了16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和7次纪念活动暨苏轼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不仅解决了一些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宣传、普及、弘扬了东坡文化，推动了当地东坡遗址的保护，扶持了当地苏轼研究学者队伍。

3. 有国内外苏东坡爱好者的积极参与。由于在全国各地召开的苏轼学术研讨会的影响，吸引了国内外苏学爱好者的广泛参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苏轼研究热潮。

苏轼研究近来已成为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得到证明：一是有很多直接和间接涉及苏轼的著作和论文出版发表；二是地方性和全国性研讨会常以苏轼为讨论的主题之一；三是近25年来有好几篇博士论文以苏轼为题，最近几年，甚至有硕士论文也把苏轼作为研究的对象。去年，美国一所知名的大学还开设了专门讨论苏轼及其作品的一门课程。

西方学者的努力使苏轼日益成为国际性的人物，在这一点上，用西方语言出版著作的华人学者所作的贡献尤其值得重视。由于尊崇苏轼的创造性天才，他们已在翻译、介绍以及讲授这个重要中国人物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并将继续在此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和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日益增多，可以相信，在21世纪，苏轼的作品在西方将更加流行。苏轼作为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总是在不同时代里引起不同的论题，受到不同的强调，正因为每一代人都对苏轼研究提出新的论题，所以新的理解总会不断发生。苏轼的多面性将继续激发出各种独特的学术成果，因为从“散为百东坡”中不可能只捕捉到一副单一的面容。

二、今后五年主要活动

（一）学术研究方向

1. 应用研究

苏轼研究有从纯粹文学艺术研究向东坡文化

研究发展的趋向。从文艺的角度观照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很难有新的突破。从文化的角度观照东坡,加强与其它学科领域和社会现实需要的结合,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如眉山的课题研究遵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本地与外地结合的原则,已经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三苏文化与眉山现代化》(1999)、《三苏文化与中国诗书城》(2005)、《苏轼为官之道》(2009年)、《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2009年)和《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2010年)等,引人注目。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今年又申报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度规划项目《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选题。

2. 综合研究

随者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成果的质会提高,而量也会倍增,为苏学研究的某些方面集大成创造了条件,苏轼作品方面的如《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三苏全书》、《苏轼全集校注》等,苏轼研究史方面的如《苏轼研究史》等,苏轼研究资料方面如《百年(1911-2010)三苏研究资料索引》等。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会有更多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出现。

(二) 重大活动概要

2011年常州全国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苏轼逝世910周年纪念活动;2011年首届全国“东坡学校”联谊交流会;2012年苏轼逝世900周年纪念活动暨全国首届苏轼学术研讨会;2013年全国第18届苏轼学术研讨会;2015年全国第19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2014年开展什么纪念活动呢?集思广益之后再作定夺。

(三) 支持、保障问题

1. 苏轼研究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服务,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是今后工作的保障。

2. 队伍建设:学会的主要领导选拔、骨干力量培养、一般人才扶持和学会与地方学会关系问题,是学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和研究队伍是否梯度适宜的关键。要把苏轼后裔发展成为学会的重要力量,争取其中有实力的企业家对学会的支持。

3. 经费保障:财政每年安排每个课题3-5万元课题专项经费;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印刷、设计、稿费等涨幅较大,《苏轼研究》专项经费由7万元

增加至12万元。此两项均纳入眉山的财政预算。

各位朋友!从以上简单的回顾和说明中,可以大致了解学会工作的状况。2005年,学会会址迁回眉山以后,在眉山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共同协助下,学会工作步入了新境界。对外加强了联系、交流,对内各方面充实、完善,增强活力,组织、通联、研究能力均大大提高。几年前,我曾作了一首《蝶恋花》,用东坡“花褪残红青杏小”的韵:“中国眉山名不小,苏海汪洋,声浪全球绕。学会兴隆天下少,五湖四海连芳草。巨著同研扬大道,经济腾飞,故里人人笑。铁板铜琶何可悄,心弦处处无烦恼。”东坡是眉山的东坡、四川的东坡,也是中国的东坡、世界的东坡。我相信,在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的支持关注下,学会将以30年走过的历程为起点,发扬优势,弥补不足,更加适应时代和国情的需求,努力工作,为弘扬三苏文化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2010年8月18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清泉)

关于评选、奖励年度优秀稿件的

通 知

各位作者、读者:

为了弘扬东坡精神、推进苏轼研究、奖励优秀作者,经研究决定:每年在《苏轼研究》刊发的稿件中评出5篇优秀稿件,给予奖励。奖品是易志超先生提供的苏轼《黄州寒食诗贴》邮品(见下图)。特此通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编辑部

2010年9月8日



弘扬东坡创新精神 继续推进苏轼研究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总结讲话

苏 灿

尊敬的各位专家、教授，各位同志：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暨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天就要结束了，我受会长张志烈先生的委托，就这次纪念活动和研讨会作一个总结。

一、关于纪念苏轼研究会成立 30 年活动

这次纪念苏轼研究会成立 30 年活动，概括起来讲有五个特点：一是抓得早。在两年前，会长张志烈先生就提出要搞一次纪念活动，并明确就在眉山搞。随后学会秘书处和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经张会长原则同意后，送眉山市委宣传部，并报中共眉山市委常委会同意后即开始筹备。二是内容实。这次纪念活动既有 30 年来的工作总结，又有理论研讨活动，同时还补充了一批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和顾问，时间不长，内容丰富。三是主题新。这次研讨会确定的主题是苏东坡创新理念与实践，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苏轼研究的开创性。四是新人多。从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作者来看，年轻学者增多，特别是有一些大学在校学生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提交了论文，不少观点新颖，视角独特，见解不俗。五是范围宽。从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员来看，共有 70 多人，他们分别来自北京、江苏、海南、湖北、河南、河北、安徽、湖南、四川等九个省市，既有专家、教授、学者，也有党政机关干部和文博工作者。

这次会议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召开了中国苏轼研究会第 10 届理事会。昨天下午大家听取了会长张志烈先生所作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年总结报告》，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修改草案，审议通过了人事方案，中共眉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学会副会长周成仕先生代表中共眉山市委、市政府致词。第二阶段，召开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今天上午大家围绕会议

主题进行了交流，八位同志作了大会发言，使大家深受启发。总体来看，这次学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和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各项议题，取得了圆满成功。借此机会，我们谨向中共眉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市委宣传部、三苏文化研究院的各位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位专家、教授、学者和来宾以及论文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这次会议提供服务的宾馆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论文观点综述

从这次收到的 45 篇论文来看，涉及到苏轼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和养生等各个方面，大家围绕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这个主题，着重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苏轼文学艺术创作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二是苏轼从政为官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三是苏轼军事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四是苏轼养生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五是苏轼创新理念的形成原因探讨等。下面我分别从五个方面就这些论文的观点作一综述。

第一，苏轼文学艺术创作的创新理念与实践。

苏轼文学艺术创作的创新理念与实践，收到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多，大家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烈先生提交的《心心相应——简说东坡与少陵精神特质的契合》，文章提出，东坡与少陵这两位文化巨人的精神特质中有很重要的两点是相通的、契合的。其一，核心价值观相通。文章认为苏轼的核心价值观有四点：（1）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2）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独立思考，决不盲从，是其认识上的最大特点。（3）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4）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他内在有坚强的节操，不放弃，不

妥协，但外在有巨大的适应性。其二，苏轼具有超强的审美节律感悟能力。第一，他已有比较自觉的自然节律感应观念；第二，这个观念呈现于其审美活动、艺术创作中。

山东济宁学院教授陈慧君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试探苏轼的文赋对赋体的承传与创新》一文提出，苏轼主张文学创作应“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在赋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美学理论，突破了汉赋以来赋体的束缚，开辟了一片赋的新天地，后人名之“文赋”。苏轼继承了汉赋的一些形式和艺术手法，突破了汉赋形式的束缚，开创了一种浏亮优美的新赋体。从文体而言，二赋类似游记。但一般游记不用韵，而赋用韵，因此，作者以记为赋。或者说，以赋文体写记游散文。这正是苏轼文赋的创新之处。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题材一致，都是苏子与客人夜游赤壁，但具体内容不同，写法也不一样。苏轼不仅善于在与前辈作家相同体裁的作品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且，在本人同题材的赋作之中，也能别出“新意”，营造不同的意境，给读者以不同的审美享受。这就是苏轼对赋体的突破和创新。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陈立华提交的《清丽舒徐 出人意表——论苏轼婉约词的创新》一文提出，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打破了婉约词一统宋朝词坛的局面，是宋词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变革。然而，苏轼的婉约词对传统的婉约词既有继承又有所创新，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亦可谓“指出向上一路”，“自成一家”。具体表现在苏轼拓展了婉约词的题材领域，将大量咏物题材引入婉约词，将悼亡题材引入婉约词。苏轼婉约词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创新，从传统的“可歌性”到不受词律的限制，形式服从于内容。在句法、平仄、韵律诸方面都有所革新，而不拘于词律的规定。

琼州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李景新提交的《苏东坡晚年美学境界的新追求与指导文学创作的新思想》一文提出，晚年的苏东坡在美学上极力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审美境界。然而，苏东坡在指导年轻学者创作时，却主张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美学风格，即豪横纵放、绚烂峥嵘。“从峥嵘绚烂到平淡简远”的思想是苏东坡一生创造实践、理论思考与作为文坛领袖的强烈责任心相结合的

产物，凝聚着苏东坡独有的创新精神。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徐晓洪提交的《从“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看苏轼绘画的创新理念》一文提出，苏轼绘画理论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开创性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苏轼绘画论打破宋代以前重形的绘画风格，以表意为主的绘画开始跻身于中国传统绘画。二是苏轼主张以水墨为主的风格逐步独立于传统绘画的随类赋彩之外。三是率先使用士人画概念，与画工画、院体画鼎力而足。四是倡导简略的画风。并进而提出苏轼绘画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得神”，而“得神”的终极目的是“达意”。苏轼绘画创新核心理论是神似——传神达意，也就是把绘画本体转向了人本本体，把传统的从关注技法，提升到关注艺术家自身，做到了艺术家本身心灵的关注。

河北栾城县史志办公室张斌（珂雪石）提交的《学习苏轼书法的几个门槛》一文提出，苏轼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其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然而苏东坡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知法而变，勇于和善于创新，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学古人轻形求意，明确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极力称扬尚意书风。宋代崇尚的是“亚圣”颜真卿的书法，蔡襄、欧阳修、司马光等，都以颜真卿为宗，他们在继承与创新中，未能摆脱唐代书风。首开宋一代“尚意”书风的，就是苏轼。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刘丽姣提交的《苏轼涉梦诗词探析》一文，分析了苏轼创作的352首涉梦诗词，对真梦诗词进行了解析，对喻梦诗词也进行了分析，并对苏轼创作的大量涉梦诗词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安徽师范大学段梦云提交的《苏轼和陶之诗词文比较谈》一文认为，苏轼的和陶诗、词、文拥有诸多共同的性格，但又各具特色。也正因此，三种文化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它们是陶苏精神相交的产物，但反过来，也正是通过这些诗文载体，两个缱绻的诗魂得以更好更深地沟通，才写就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一页独具魅力的不朽篇章。

第二，苏轼从政为官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从收到的论文来看，大家对苏轼从政为官的研究颇有兴趣，尤其是对他的为官理念、为官业绩和为官作风，大家十分称道，不少论文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徐新民在《苏

轼民本思想札记三则》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苏轼民本思想的来源、内容和实践。提出苏轼的民本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概括了苏轼在凤翔、开封、杭州、密州、徐州、登州、颍州、扬州和定州等任上，践行民本思想付诸的行动，取得的功绩。

徐州的陆明德、彭振雷二位提交的《苏轼是真正爱民忧民的父母官》一文中，概括了苏轼为民做的十件好事，包括彭城抗洪、白土寻煤、登州榷盐、杭州救灾、扬州免欠、密州捕蝗、定州酿酒、惠州建桥、羊州引水、儋州劝农。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徐丽女士提交的《浅谈苏轼对凤翔衙前役的改革》。宋仁宗嘉祐六年（1062），苏轼在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他针对伐木运输这一差役，展开了走访和调查。发现了朝廷规定运送木材的日期恰好是黄河水暴涨的时候，而渭水和黄河涨水的时间前后长达半月之久，这时运送危险也是最大。为此，他提出了“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改革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疾苦。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蔡啸的《浅析苏轼的创新和实践》一文提出，元祐四年（1089），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出知杭州，创造性地提出并创建了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解决了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在疏浚杭州西湖过程中，苏轼创造性地提出修筑一条南北相通的长堤（后称苏堤），解决了大量葑草和淤泥堆放的难题，苏堤如今成了杭州西湖的著名美景之一。

第三，苏轼军事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从这次收到的论文来看，有的作者开拓了苏轼研究的领域，把视线触及到了苏轼军事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编审赖正和提交的《谈谈苏东坡兵制改革的主张》，从三个方面论述苏东坡的兵制改革主张，一是“以土兵渐代禁兵”。苏东坡大胆地提出逐渐减少禁兵以后，用郡县土兵逐渐代替禁兵来执行戍守、征战任务。二是“取消禁兵更戍制”。赵匡胤夺取政权后，将聚驻于京畿的并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禁兵每三年要轮换到各州郡戍守，带来了很多的弊端，使兵将分离，财政负担加重。苏东坡提出“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三是“取消职业兵终身制”。他提出了两项建议：（1）现有士兵在五

十岁以上的，“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这是我国兵史上最早提出建立复员制度的主张。（2）“自今以后，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苏东坡在这里明确提出，军队只收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入伍，并且只当十年兵，到期即复员。反映了苏东坡敢于改革过时的兵役制度，建立新的兵役制度的创新精神。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杨胜宽提交的《苏轼与司马光军事思想异同论》一文，把苏轼的军事思想与司马光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在军队的地位与作用、军事策略、军队建设与军事训练等重大问题上，既有许多相似或相近的见解，也有不少不同的观点主张，对研究苏轼的军事理念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四，苏轼养生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苏东坡把养生视为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深受中国古代宗教及其养生学的熏陶，而且厚自养炼，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他独特的养生理论新体系。从这次收到的论文来看，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苏轼养生方面的创新理念与实践经验。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广东佛山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饶晓明和湖北黄冈师院饶学刚合写的《东坡养生理论新体系及其时代意义——兼谈东坡在黄州的养生实践成就》，文章将苏东坡的养生理论归纳为两大理论或两大实践体系：即内丹术和外丹术。内丹术，指行气派方术。包括交游、劳作、气功（导引、吐纳、瑜伽）、斋居，通过调动、开发人体潜能而达到自我调摄、自我保健之目的。外丹术，指服食派方术。包括食丹、节食、药疗，通过增强、保护人的机体而达到身心全适、延年益寿之目的。可以说，对现代人借以调整心态、恢复元气、重振精神，养生健体，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文章还把东坡的养生之道概括为自然养生、劳动养生、气功养生、斋居养生、金丹养生、节慎养生、医药养生等七个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养生理论体系。苏东坡着力于自然调适、身体锻炼、动静结合、心理卫生、精神养炼，开创了熔强健身体、调剂心理、坚定精神信仰于一炉的综合养生新模式，充满了辩证法，文章提出大力弘扬东坡“厚自养炼”的养生精神。苏东坡的养生之道对现代人调整心态、恢复元气、重振精神、养生健体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周云容提交的《浅

谈苏轼的创新人生——以东坡美食为例》一文，以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发明创造的东坡美食为例，总结出了苏轼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创造出的东坡菜肴。一是黄州“三味”：“东坡羹”、“东坡肉”、“东坡鱼”。二是惠州羊脊骨。三是海南食蚝。对弘扬东坡饮食文化有积极意义。

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惠光启、徐州师范大学王新文二位提交的《试论佛禅茶道对苏轼文化创作的影响》一文，从苏轼对佛禅茶道的感悟入手，探讨了苏轼追寻佛禅茶道对其文化创作的启迪感悟和影响。

第五，苏轼创新理念的成因探讨。苏东坡的创新理念与实践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形成的？不少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赵军提交的论文《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奇迹——苏门的家庭教育初探》，着重从苏东坡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苏家教子的一些具体办法——诱导：天下第一术；赏识：成功的加油站；平等互动：提升境界的法宝；个性教育：家教的基石；刚柔相济：成才的土壤；方法：比知识更重要；遗愿：影响终身。苏门的家教经验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彭华提交的《博求“三通”：苏氏蜀学的形神与风骨》一文，把苏氏蜀学研究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提出三苏父子的创新理念，在于“打通古今”：通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融通百家”：陶冶诸子百家，各有取舍；“会通三教”：会通中古三教，以儒为宗。着重揭示了苏氏蜀学形神与风骨的三大层面，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编、副教授郭杏芳提交的《苏轼黄州词创新原因浅析》一文中，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苏轼创新理念形成的原因：一是身份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是苏轼黄州词创新的驱动力。二是“以诗为词”“诗词一体”的诗词观念是苏轼词作创新的原动力。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潘殊闲提交的《苏轼创新意识探微》一文，从七个方面总结了苏轼创新理念的成因：一是民族审美心理的潜移默化。二是四川地域文化的影响。三是家族门风的濡染。四是时代风会的熏陶。五是前辈名公的奖掖扶持。六是性格禀赋和后天造化的结晶。七是坎坷的人

生遭遇的结果。

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胡先酉提交的《谈谈苏轼的“疑”——由读〈石钟山记〉想到的》提出，苏东坡之所以具有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办法，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轼是一个对前人、名人的说法敢疑并会疑的人，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还表现在能够解疑上，苏轼通过存疑、质疑、释疑而获得真知，减少谬误，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刘清泉提交的《浅谈苏轼的创新粘合》一文，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苏轼创新的具体方法：一是文体意义上创新粘合。二是写作手法上的创新粘合。

由于时间关系和篇幅所限，还有不少论文的观点没有综合进来，好在会议已经汇编了论文集，可以弥补这个遗憾，请有关的论文作者见谅！

三、关于研究会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关于学会今后五年的学术研究方向和重大活动，张会长已在昨天的报告中讲得十分明确了。为了落实好会长提出的要求，我就下一步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以下五点具体建议：

第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定位是“省上登记、全国活动”。他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己任，组织广大专业和业余的苏轼研究者、爱好者，开展对东坡文化的研究，整理典籍，研究课题，开展合作，加强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苏东坡是一个全能的冠军，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宗教、养生等方面。研究会成立30年来，在整理古籍、研究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从研究的领域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这也是一些研究者的呼声。例如，海南日报林冠群在给大会提交的论文《深入研究历史，全面评价苏轼》中提出，应该把研究方向从“文学苏轼”向“政治苏轼”作适当的转移。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应该采纳。从苏轼为官40年的人生经历来

看，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多闪光的治国理念和为人称道的为官业绩，很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总结。这方面，应该说才刚开了一个头，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第三，进一步完善研究机制。昨天，张会长在报告中，总结了30年来的基本经验就是，我们这个学会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这就是学会主导、专家参与、党政支持。所谓学会主导，就是由学会成头，确定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人员和主题，并组织会员积极撰写论文。专家参与，是指国内外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积极提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党政支持，是指苏轼遗址遗迹地的党委政府，通过行政的力量，出钱出人出力，提供优质服务，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3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机制是成功的，要进一步完善和坚持下去。希望苏轼遗址遗迹地所在市的党委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研究会的工作，大家共同努力把东坡文化研究引向深入。

第四，进一步加强同会员的联系和对市级研究学会的指导。目前学会的会员从当初的56人，发展到了现在的268人，分布在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在苏轼研究会的影响下，苏轼遗址遗迹地的郟县、常州、江阴、栟城、徐州、黄州、儋州等七个市县，先后成立了市或县的苏轼研究学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作为一个全国活动的学术团体，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同会员的联系，定期给他们寄送研究会会刊《苏轼研究》，了解他们的研究选题和进展情况，积极帮助他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条件。其次要加强同已经建立了研究学会的市县学会的联系和指导，及时给他们通报总会的一些重大活动、研究成果和有关信息，以便大家成果共享，信息共用。

第五，进一步办好“苏轼研究”刊物。苏轼研究杂志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学术刊物，也是广大会员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阵地。创办五年来，受到了苏学专家、学者和爱好者的肯定和好评。下一步，要进一步把这个刊物办好，充分体现刊物的特色，努力做到“三性”，即学术性、理论性和权威性。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多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写的文章，特别是有新颖、有见地、有深度、有

影响的文章，当然，也要刊登一些苏轼遗址遗迹地的专家、学者和党政干部，研究苏轼曾经在当地活动的、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

各位专家、教授，各位同志！俗话说三十而立，我们这个学会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我们要以这次纪念学会成立30年为契机，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我们会长的领导下，在广大苏学专家和苏学爱好者的积极参与下，在苏轼遗址遗迹地各级党委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大力弘扬东坡创新精神，创造性地开展研究会工作，不断把苏轼研究引向深入，为各地弘扬传统文化服务，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2010年8月19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眉山市政协主席）

（责任编辑：刘清泉）

《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出版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杨胜宽的又一部学术研究专著《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2010年1月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由苏轼论、苏轼与苏门人生论及附录三部分组成，汇集了作者近10年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的主要成果，涉及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李之仪、米芾、赵令畤、道潜、毕仲游、李昭玘、苏过等十几位作家，是一部比较系统、深入研究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成员关系与活动特征的专门著作，一定意义上看，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该书责任编辑王定宇评价：“书稿整体质量很高，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均是我们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上乘的，对相关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有极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但凡苏门中与苏轼交往比较密切、且有一定成就与影响的作家，都纳入了该书的考察视野，尤其重视苏门人士与苏轼交游和共同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相关情况的考察分析，其中部分作家，是第一次被纳入研究视野的。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于研究者了解苏门文人集团的活动性质和群体特征等情况具有直接帮助，而且对于深入认识苏轼作为宋代文学的杰出代表的作用、贡献与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杨）

心心相印

——简说东坡与少陵精神特质的契合

张志烈

内容提要：杜甫与苏轼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东坡对少陵高度崇仰。他们在精神结构上有着深相契合的特质，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具有基本上相通合的核心价值观和超强的审美节律感应能力。这两点就内在地决定了杜诗和苏诗多层次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杜甫 苏轼 核心价值观 节律感应

杜甫和苏轼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伟大的先贤，他们对华夏文明的承传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影响及于全球。诚如丹纳所说：

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的英俊人物应运而生，几十个英俊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中心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①

对于唐宋两代而言，他们就是这样的中心天才人物，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②相邻两代的大作家之间，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常事，也是文学史上普遍注意研究的问题。对于杜甫和苏东坡的各自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现在也正处于新的高潮期。那末，他们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有没有在共同文化密码（或曰文化基因、文化本能）与时代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相通的精神特质呢？这是一个诱人而复杂的领域。杜甫是像莎士比亚一样“说不完的杜甫”，苏东坡也被当世学者称为“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苏东坡。笔者这里简谈浅见，希望在学习和思考中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历史的声音

少陵和东坡间的关系，是谈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一开始，甚至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出现另外的议论。王若虚曾指出过黄庭坚的看法：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东坡。^③

同时的陈师道也说过：

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谨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④

稍后的张戒是崇杜的，他在经过一番考究后，也只是说：

子瞻自言学陶渊明。

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⑤

他们看到苏轼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有转益多师广泛继承的一面，但论杜甫之影响后贤而不及于苏，谈苏轼之学习前修而不包含杜，确是不合事实的偏颇。好在历史不是少数人说了算，另一方面的议论，不仅早就存在，而且越到后来越深刻完备。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得不把自宋以来肯定杜苏关系的前人言论扼要引录。

《后山诗话》首有记载：

苏子瞻曰：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⑥

吴可记载东坡季子苏过的话：

苏叔党云：东坡尝语后辈，作古诗当以老杜《北征》为法。^⑦

朱弁记载他亲自听到的参寥的话：

或曰：“东坡诗始学刘梦得，不知此论诚然乎哉？”予应之曰：予建中靖国间在参寥座，见宗子士瞻以此问参寥，参寥曰：“此陈无己之论也。东坡天才无施不可，以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⑧

胡仔说：

苕溪渔隐曰：“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⑨

晦斋在《简斋诗外集引》中说：

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手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口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⑩

明人王世贞说：

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

^⑪

清人叶矫然说：

予欲合子美、子瞻七言古体，梓为一集。盖此体中之神通广大，无如二公，杜奇而壮，苏奇而秀，千古双绝。袁石公《读少陵集》云：

“仅有苏玉局，异代足相配！”知言哉！^⑫

徐乾学在《渔洋山人续集序》中说：

宋以诗名者，不过学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诗浑涵汪茫莫若苏、陆。合杜与韩而畅其旨者，子瞻也；合杜与白而伸其辞者，务观也。初未尝离唐人而别有所师。^⑬

翁方纲《读苏诗四首》其一云：

苏斋读苏诗，回复万古心。嗟此迈往途，敢以薄力任。

法自吾儒家，杜陵揆心箴。

真气真性情，均钟调瑟琴。

洞庭九奏响，勃发于讴吟。

庶惟杜韩后，山海量崇深。

非由读杜出，诞岸谁追寻。

所以星宿源，凭杜为指针。^⑭

类此的议论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列举。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后世学者在研读杜甫与东坡著作后，普遍认可苏轼在转益多师中自觉倡导学杜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接受中深入堂奥，开拓创新，足以相配。他们之间，有深度的关联和相通。不深研杜，就不能深入理解苏；不深研苏，就不足更深刻地理解杜。这里，我们可以用明清之际钱谦益的几句话来作结。钱氏在《薛行屋诗序》中说：

自宋以来，学诗者多师法少陵。……介甫谓子瞻雪诗有少陵气象。……石林谓苏、王追配少陵，许彦周谓子瞻南海诗、介甫钟山诗追逐少陵。……后山谓子瞻越海度岭后深入少陵堂奥。……其实形神俱肖少陵复生者，在宋惟子瞻。^⑮

东坡对少陵的理解与崇拜

苏轼《跋文与可纤竹》云：

纤竹生于陵阳守居之北崖，盖岐竹也。其一未脱箨为蝎所伤，其一困于嵌嵒，是以为此状也。吾亡友文与可为陵阳守，见而异之，以墨图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遗玉册官祁永，使刻之石，以为好事者动心骇目诡特之观，且以想见亡友之风节吗，其屈而不挠者盖如此。

又在《戒坛院文与可画竹赞》中云：

风梢雨箨，上傲冰雹；霜根雪节，下贯金铁。谁为此君？与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这两段短文非常重要，它使我们窥见了东坡艺术鉴赏的思维路径。作品体现的是作者的精神风节，鉴赏者的激赏与作家的意趣都是因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即所谓“认同”），所以“惟其有之，是以好之”。这八个字足以指导我们去看东坡对少陵的理解与崇拜。

东坡平生涉及学杜与评杜的文字甚多，这里也只能略举数例，以窥全豹。

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
 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
 展转更崩坏，纷纷阅俊髦。
 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
 粉黛迷真色，鱼虾易秦牢。
 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
 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尘暗人亡鹿，溟翻帝斩鳌。
 艰危思李牧，述作谢王褒。
 失意各千里，哀鸣闻九皋。
 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终袍。
 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
 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遨。
 简牍仪型在，儿童篆刻劳。
 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
 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
 般斤思郢质，鲋化陋儻濠。
 恨我无佳句，时蒙送白醪。
 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这里对杜甫作了历史的全面的评价，于其上继雅骚、齐名谪仙、掩盖众作、垂范后昆的屠龙巨笔，称颂备至。诗作于熙宁四年（1071）赴杭途中，其中“穷苦”、“奔逃”、“微官”、“迂疏”等句，都在同情杜甫中注入了自身的愤慨。整首诗义蕴丰富，情怀浩荡，精思健笔，一若少陵佳篇，可以说是两大诗人跨越三百年历史的神交之作。纪晓岚评之为“字字深稳，句句飞动”，概之为“句句似杜”，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这首诗充分体现了东坡对杜诗崇高思想内容极深的认识、理解、体会，对杜诗广博精湛的艺术表现的潜心静气的探究、学习和把握。

在苏轼集中，对杜甫的这种高度称颂，随处可见。如作于元丰四年（1081）的《书唐氏六家书后》说：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元丰八年（1085）所作《书吴道子画后》中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作于元祐末期的《书黄子思集后》中又说：

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这些称颂都是建筑在对杜诗精神实质的高度理解基础之上的。“惟其有之，是以好之”，只有“心有灵犀一点通”，才能有如此的激赏。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艺术的审美接受是一个情感体验和介入的过程，其核心体现为与作品中主人公的认同。接受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对作品加以体认，从而产生对主人公抱有的不同审美态度。对文学作品的所有认同中，道德价值的契合是最重要的。优秀文学所以具有永恒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其作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具有永恒生命力。像杜甫这样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其审美感应系统、认识尺度系统和价值尺度系统，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存在，而在接受中，道德伦理观念契合的价值认同是最重要的认同。

东坡在《评子美诗》中说：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

又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这两段话都涉及价值认同问题。东坡体会杜甫的“致君尧舜”的稷契之志，这好理解。但人们常常以突出宣扬杜甫忠君思想，倡“一饭不忘君”之说归咎东坡，这就应当仔细辨析了。首先，封建社会中文化人，特别是宋代人，开口论事，必须以忠孝等语当先，这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局限。其次，这是东坡与王定国特殊关系决定的。王定国因受苏轼乌台诗案之累，远谪宾州，五年不敢通消息，此时为其诗集作叙，而定国是王素之子、张安道之婿、大臣之后，故下文勉以遭贬斥不用，仍要不怨天、不尤人，时刻不忘朝廷，时刻想到报天子之恩。这两条决定东坡必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杜甫也好，苏轼也好，他们的“忠君”观念实质是与对国家、对现实、对人民的忧虑关联着的。那时候君王是国家的符号。杜甫的“致君尧舜”理念也应作如是理解。其实，王安石早就说清楚这个意思了。王安石《杜甫画像》中云：“吟哦当此时，

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杜甫的“不忘君”，更多的还是从“致君尧舜”、实现稷契伊周之志着眼，其中包藏着的是对国家、对现实、对人民的关心。

东坡还有一篇涉及评杜的短文也非常重要，就是有名的《荔枝似江瑶柱说》：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恍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这种敏捷的直觉感悟，如九方皋相马，在牝牡骊黄之外洞见事物的本质特征，用现代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话说，就是在不同事物之间看到其“力的图式”相同相近的“异质同构”关系，是超强的审美感应能力的表现。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这对我们理解东坡的意思很有帮助。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还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又说：“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这对我们理解东坡这段话就更有启发了。第一，说杜甫与司马迁相似，应从鲁迅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高度去理解。第二，“以万物为我”——就是能感受万物之间的“异质同构”的节律关系并用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换句话说，就是指敏捷的审美感悟能力。“惟其有之，是以好之”，东坡所崇仰的，也正是他所具有的。

从对以上所举材料的粗略分析中，我感到东坡与少陵这两位文化巨人的精神特质中有很重要的两点是相通的、契合的。其一，核心价值观相通；其二，都具有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下文就从这两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核心价值观相通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价值观支撑下生活！

核心价值观是指精神结构中居于基础的、中心的、贯穿其它一切方面的部分。价值，是指效用性

的尺度，是客观事物对主体所具有的肯定意义，是一种关系概念。价值的本质，是世界的人化，是以人的需求的标准来衡量世界的一切。人类正是通过创造价值来追求幸福、实现理想、达到自由境界的。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世界上文化之所以多元，就在于其内在的价值观不同。所谓文化冲突，其实质就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任何一种文化的全貌，都是为其核心价值观决定的。由于其共时性或历时性的条件差异，地球上人类社会各有不同文化，也各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但说到底，仍是不同物质生活存在所决定的观念存在，是一定社会经济活动秩序、政治活动秩序、道德伦理秩序等等在观念领域的提升与凝结。从生命个体的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人脑“计算机”功能中心的最高存储，它涵盖本我、自我、超我而从中提出的经自己反复确认过的主宰自己全人的、对外在事物和内在自我的总看法、总图式，是支撑其生命活动、生存意志的柱石。

要认识杜甫和苏轼核心价值观的相通，这里先简略举出各自的情况。

杜甫的核心价值观，亦即我们经常讲的杜甫精神，简切地说，就是他的以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为基础而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种美德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精神。可以分成三个要点来理解：

(1) 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情怀。(2) 自觉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3) 崇高热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完整体系。

这些观念贯穿和显现在他的全部著作和立身处世的行为中，凡接触过杜诗的人都知道，这里只简单提示一下。如第一点他的重民爱民思想，就集中表现在《奉先咏怀》等诗中。我曾经对学生说，假定你对杜甫的其他诗篇都没读，但只要精读《奉先咏怀》就可以看到杜甫的鲜活精神。在《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中说“邦以民为本”。在《三吏三别》等众多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仁”和“民本”已经化为他的灵魂。第二点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精神，即“致君尧舜上”的自觉理念。在行为上、创作上凡事必表态，从忧国忧民出发关心现实反映时事，从《兵车》、《丽人》以至后来众多的诗作都体现出无论穷达都心怀天下的良知正气。《凤凰台》中以深情幻化的意象，表现出愿用自己的心血来喂养象征国家民族“中兴”的凤凰，这跟后来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一样，

就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奉献自己的鲜血，这与西方普罗米修斯偷火的神话有着同样的伟大和不可朽。第三点是讲仁爱胸怀的崇高表现。《朱凤行》中也以幻化的意象写朱凤爱悯在“世网”中受苦受难的百鸟，直至底层的黄雀，要解救他们，不怕与凶恶的鸱鸢为敌，这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样都是杜甫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

下面简谈一下苏轼的情况。

从苏轼的全部著作和立身行事来看，我认为贯穿他全部思想精神的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可以简略地概括出四点：（1）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2）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3）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4）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苏轼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他毕生坚持、维护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生活信念。这些追求和信念或显或隐地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包括《易传》、《书传》、《论语说》及所有诗、文、词）中。从这四点出发去体会苏轼的作品，可以说处处皆通。然而东坡的精神世界太丰富、太复杂了！这里无法详引材料，只好挂一漏万地略微提示。如第一点是他爱国爱民，担当社会责任的生活信念，苏辙为他写的《墓志铭》就记载他从少年时起，就“奋厉有当世志”，又记载他平生作《易传》、《书传》、《论语说》的情况。东坡北归时《与苏伯固》书云：“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所论，其他何足道。”东坡临终前又以这三书付钱世雄。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他的基本思想。他在《书传》中多处发挥这一思想。如解释《五子之歌》时说：“民可近者，言民可亲近而不可疏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贱。若自贤而愚人，以愚视天下，则一夫可以胜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则失天，失天则失国也。”在解释《多士》时说：“天命之所不与，即民心之所秉为，民心之所秉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以见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这种重民爱民思想感情，在他的各种文章中、涉及民生的诗歌中，有很多表现。尤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为官的实践中，处处为人民做好事：在凤翔，改革“衙前”役法。在密州，拿出库粮收养弃儿。在徐州，为保护人民而奋勇抗洪救灾。在杭州，整治西湖，便生产，便民生；还捐钱设免费病坊。在扬州，废除生事扰民的“万花会”。贬到惠州，还捐钱为当地修桥，帮助地方官建成广州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

工程，等等。第二点是他求真务实的认识追求。独立思考，绝不盲从，是其认识上最大特点。在《上曾丞相书》中说：“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这个观点贯穿他一生。早年的《议学校贡举状》一文，通篇就以“责实”为中心。《谢馆职启》说：“性任己以直前，学师心而无法。”《徐州谢上表》说：“岂有意于为异，盖笃信其所闻。”都强调这个精神。他的名作《日喻》、《石钟山记》、《黄荃画雀》、《戴嵩画牛》等等，都贯穿这个基本观点。他在政治实践上，先后与王安石、司马光的争论，也缘于他的这种认识追求。第三点是他坚持正确认识独立不惧的生活原则。在《徐州谢上表》中说：“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体现这个精神最重要的材料，是他元祐二年（1087）所写《与杨元素书》：“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这封短信，是东坡人格、灵魂的投影。明乎此，则诗文中流露的许多不惧困难、坚持独立人格尊严的意象都可贯通了。如在黄州的咏海棠、咏红梅等诗，在守杭州时抒写独立人格孤愤的许多词，短文《三国名臣赞序》等文字中，都是流露的这种精神。第四点，是他内在有坚强的节操，不放弃，不妥协，但外在有巨大的适应性，乐天知命，随遇而安。面对任何矛盾任何困难，都能以高超的智慧，自我调适，达到从容自在的境界。有名的《超然台记》，主旨就是写他超然物外、随遇而安、无往不乐的生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顶级的诙谐幽默大师。在《题杨朴妻诗》中记述：“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魄贪杯酒，更没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一子就养。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在《记游松

风亭》中说：“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总之，在任何困厄面前，都坚守节操，智慧解脱，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潇洒生活。在诗、文、词中到处都有所显现。

比较，是最基本的认识手段。从上文简单罗列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和苏轼的核心价值观总体是相通的，而在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担当天下国家的社会良知、求实求真的浩然正气、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诸方面几乎完全一致。

他们的这些观念之所以形成，和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文化熏陶、诚恳朴直的个性都有重要关系，这里只就思想渊源说几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然其基本精神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精神，即以人为中心的重人生、重人的责任与义务、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社会关怀精神。第二，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天人合一”精神，也就是把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的综合趋同思维，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协调与和谐。第三，“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精神，也就是各文化要素多样统一、交融互动、充满活力的和合文化精神。杜甫和苏轼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完全合拍，可以说它们是民族文化基因与时代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精神花朵。

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

少陵和东坡都具有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这是他们精神特质相契合的又一个方面。我在上文提到的东坡《荔枝似江瑶柱说》中，毕仲游回答东坡的问题，说杜甫“似司马迁”，就是东坡对少陵的超强审美能力的感悟和激赏。

审美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一个极重要、极普遍而又似乎极难说清楚的领域。研究这个领域的所谓美学，迄今为止流派纷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探析，都各有所得，各有所守。就中感应论美学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

《管子·戒》中说：“闻一言以贯万物，是谓知道。”程伊川甚至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

而已。”^⑩这类说法与我们传统的比兴说、物感说在致思途径上是相通的。《礼记·乐记》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又说：“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特别是下面这段话很值得注意：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中的这段话皆本于《荀子·乐论》，而“荀子”原话是“倡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礼记》和《史记》则增多了“万物之理，以类相动”等语，这是中国人自己的节律感应观念描述。

西方格式塔心理学派与感应论美学关系最密切。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世间所有事物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力的图式”。当某一特定的外部事物在大脑电力场中造成的结构与伴随某种情感生活的力的结构达到同形（异质同构）时，这种外部事物看上去就具有了这种情感性质，就可以作为表现同一种情感的符号。其代表人物之一阿恩·海姆说：

这种力的模式处处可见，不管是精神活动、身体活动、机器活动，亦或是社会和观念的结构，都有着自己特别的力的作用式样。^⑪

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还说：

不仅我们心目中那些有意识的有机体具有表现性，就是那些不具意识的事物——一块陡峭的岩石、一棵垂柳、落日的余晖、墙上的裂缝、飘零的落叶、一汪清泉，甚至一条抽象的线条、一片孤立的色彩或是银幕上起舞的抽象形状——都和人体具有同样的表现性，在艺术家眼睛里也都具有和人体一样的表现价值，有时候甚至比人体还更加有用。^⑫

现代脑神经科学已认识到：声音、色彩、气味、食味、手感等运动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进入大脑时，神经线路中发生的实际是生物电力图式的传递与储存。如果它们之间有“异质同构”关系，则可以互相引起。心理现象中的知觉、表象、想象、情感、思维等，都在大脑中形成其各自的电力图式，与各类感觉之间均可能发生异质同构关系。因此，借助“脑电力图式异质同构”这个

中介，它们之间可产生相互引起的节律感应现象。

友人成都大学教授曾永成先生，长期从事感应论审美观的研究，所著《感应与生成》、《文艺的绿色之思》诸书中对审美活动的原生特性——节律感应有很好的论述，兹引录如下：

既然万事万物都具有节律形式，人也当然不能例外。这样，以普遍存在的节律形式为中介，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就产生了，这就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活动方式，即节律感应活动。

一方面是对象的节律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主体的节律活动。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事物运动规律的作用，对象的节律形式会激发并调节和引导主体的节律活动，使其与之和谐一致。这两种节律相激相荡、相生相感、相应相和的运动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节律感应。我们在审美活动中就是在进行着这种特殊的活动，美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生命活动方式中获得的享受和满足。^⑩

我们说少陵和东坡具有超强的审美感悟能力，也就是指其超强的节律感应能力。

先谈杜甫的情况。

运用我们上文所述的学理观念去读杜诗，就会发现到处都呈现强烈的节律感应能力。这里也只能略举数端，以推知全体。

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说：“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昔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浏漓顿挫”是公孙舞姿的节律形式给童年杜甫留下的深刻感受。张旭因被这类舞姿节律形式强烈震动，取其气势贯之于草书，可见其经历了“豪荡感激”的审美感应过程。诗中描绘舞姿的四句：“火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以远古神话和大自然形态中与舞姿“异质同构”的“力的图式”为表现符号，写出了这场独舞的光明热烈、矫健奔腾、雄伟激荡、庄严壮丽的情感境界，可以推知少陵在下笔时脑中经历的强烈鲜明的节律感应过程。

又如《义鹘行》，从这个选题就知道少陵写作前就经历了激烈的节律感应心理活动。他听樵夫讲一个异事：苍鹰养子在柏树上，被一条白蛇偷吃了，

雄鹰悲痛地飞去求鹘，鹘飞来杀死白蛇。这个“动物世界”的故事具有的“力的图式”引起了与人间侠义情怀之间的节律感应，因而写了这首诗。诗末云：“近经滴水涓，此事樵夫传。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永激壮士肝。”杨伦评云：“记异之作，愤世之篇，便是《聂政》《荆轲》诸传一样笔墨，故足与太史公争雄千古。得之韵言，尤为空前绝后。”^⑪

再如《房兵曹胡马》，这是家喻户晓的名篇。短短八句，句句写马，然而从马的形态、气韵中，处处展现由“力的图式”“异质同构”而呈露的人的情怀，我们在这里看到骏马，看到忠肝义胆，看到良友挚诚，看到大将风度，也看到青年杜甫驰驱万里的胸怀，甚至看到硬瘦通神的美学观。

还有《古柏行》，可谓体现杜甫超强节律感应能力的典型作品。这首诗挖掘自然物“柏”的“力的图式”所具有的表现性，寻找其与自己主观情感“异质同构”的特点而突出之。以古柏命题，由柏发兴，柏树的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特点都化作人的情感意态，即柏即人，相互衬托。写树实写人，写古实写今，咏物所以咏诸葛，咏诸葛所以咏怀，在对柏树的吟唱中寄托了对孔明的崇仰向往，抒发了自己理想不能实现、抱负无由施展的沉郁悲壮情怀。

例多不再举。下面略说几点总体意见：

第一，咏物诗是最能显现作家节律感应能力的领域。杜集中严格意义上的咏物诗即达六十多首。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客观物象的情意化和主观精神的物态化是咏物诗的根本表现原则。物象不只见其“形”而必要负载“神”，成为人的情意的“符号”；情意，不是游离物外而必要寓托于“形”，具有样态，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性灵。要做到这点，就要“以万物为我”，能够感受到客观物象的“力的图式”与某种主观情感的“力的图式”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就要求有强烈的节律感应能力。这能力的形成是生活实践、世界观、人品和文化艺术修养共同决定的。一匹瘦马，普通人看来就只是一匹瘦马，杜甫却从中观照出自己罢官拾遗后的复杂心态，写出《瘦马行》。江边景物，人人可见，杜甫却取以写出《江头五咏》。清人顾宸评《江头五咏》云：“《丁香》，立晚节也；《丽春》，守坚操也；《栀子》，适幽性也；《鸂鶒》，遣留滞也；《花鸭》，戒多言也。此虽咏物，实自咏耳。”评点极准确。其他如写动物之《孤雁》、《鹿》，写植物之《桔槔》、

《枯杙》等，皆同类名篇。

第二，写日常生活中至小至微的题材，但因有超强节律感应能力的照射，也富含深意，如《种苜蓿》。诗序中说：“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苜蓿，向二旬矣，而苜不甲拆，独野苜青青。伤时君子，或晚得微禄，轆轳不进，因作此诗。”前注指出此诗中苜蓿乃是自喻，是准确的。

第三，杜集中鸿篇巨制，飞动混茫，千汇万状，处处呈现节律感应眼光主导的敏锐笔力。这里举其“用典”一端，以见其余。“用典”，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锤炼，在最少的话语中压缩进丰富的内容，扩大形容，加深刻画，使得句中有余味，弦外有余音。可以说，用典的实质是在历史事实、历史观念与主观情意之间挖掘其“异质同构”关系，用特殊的“历史的物象”来作表达主观情意的符号。可见这个能力的背后，仍然是节律感应能力。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后半部分：“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鵬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写对李白遭永王璘事后的生活境况的同情，几乎句句用典，而精切流畅，表达出丰富的意蕴。

下面谈苏轼的情况。

说到东坡的审美感悟能力，前人的许多议论实质上都触到了这点。《冷斋夜话》曾记载东坡自己的话：“无物不可比类。”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载：

参寥在诗僧中独无蔬笋气，又善议论。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鞴，他人岂可学耶？”座客无不以为然。

清人叶燮《原诗》卷三云：

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苏轼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镕铸，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窥其涯涘？

清人沈德潜《说诗碎语》卷下云：

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

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羈。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

苏轼胸中这副融宇宙之万物的“洪炉”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他在传统文化熏陶和毕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超强的节律感应能力。第一，他已有比较自觉的自然节律感应观念；第二，这个观念呈现于其审美活动、艺术创作中。下面就从这两方面略作说明。

体现其鲜明自然节律观念的诗，就是他在凤翔为官时，于治平元年（1064）所写的《授经台》：

剑舞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琴工。

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

诗的前两句是对前人艺术活动节律感应现象的认同和引证，后两句是对自己此时产生的节律感应心理的体会与描述。剑舞、草圣事我们上文谈杜甫时已说过，兹不重复。第二句所用事，出自《乐府解题》中言《水仙操》条：

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成连云：

“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水、项洞崩坼之声，山林杳冥，群鸟悲号，怆然而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矣。

这个故事乃是最标准的自然节律感应的例证，东坡平生对此有极强的感受和极深的理解，其著作引用和发挥的地方很多。

较集中地阐述其自然节律观念的文字，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北归过韶州时所写的《九成台铭》，节录如下：

自秦并天下，灭礼乐，韶之不作，盖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则韶既已隐矣，而况于人器两亡而不传。虽然，韶则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盖常与日月寒暑晦明风雨并行于天地之间。世无南郭子綦，则耳未尝闻地籁也，而况得闻于天。使耳闻天籁，则凡有形有声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尝试与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苍梧之眇莽，九疑之联绵，览观江山之吞吐，草木之俯仰，鸟兽之鸣号，众窍之呼吸，往来唱和，非有度数而均

节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

大自然的一切形、色、声、动，在他此时此地特定的感觉中，化成了一部韶乐。《庄子》的“天籁”说是其思想渊源，但这里呈现的是东坡自己的节律感应能力。因为有这种能力，才能敏感地捕捉、感应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事物的“力的图式”而唤起、体验相应的情感认识活动。

节律感应能力在苏诗中超凡呈现比比皆是，下面略举数例：

有一首人人皆赏的美妙小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清人王文诰评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论者多赏其精妙的比喻中浓缩了丰厚内容。这个精妙的比喻是从何而来呢？我认为这是东坡以超强的节律感应能力敏悟到晴日西湖鲜艳明丽、温暖柔媚的气韵与浓妆美女的神韵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也敏悟到雨中西湖空淡秀婉、朦胧迷人的气韵与淡妆美女的神韵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因而才产生这个比喻。

又如在赴黄州途中所作《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诗人在奔赴贬所途中，度越关山，看到幽谷清梅被风吹落，亦洒落关山道上。客观景物触动情怀，也就是梅花的自然形态的“力的图式”，与自己主观情感的“力的图式”异质同构，产生节律感应，于是悲伤断魂，不能自己，思绪飞腾，发而为诗。写梅花即自写身世，怜梅花即自怜遭遇，而用笔化尽痕迹，意兴若有若无，语短情浓，使人百读不厌。

再如，最普通平常的诗作《次韵刘景文见寄》前四句云：

淮上东来双鲤鱼，巧将诗信渡江湖。细看落墨皆松瘦，想见掀髯正鹤孤。

展读来书，瘦硬的笔迹与友人品质气节的松柏坚贞之间，有力量气度的异质同构关系；想象中友人掀髯昂立的身影，与白鹤卓然独立的清高资质之间，有力度气势的异质同构关系。作者具有敏锐地感受这些“力的图式”及其关系的节律感应能力，于是就出现了上引诗句中意象的构建。

集中名篇如《百步洪二首并叙》、《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等都是最好例证，因限于篇幅，就不再细说了。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我认为这里“悟性”所指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审美感悟能力，而且不止在文中，在诗中词中也有同样的呈现。

总起来讲，少陵和东坡，作为唐宋时代顶峰上的文化巨人，他们在精神结构上有着相契合的特质，就是具有基本上相通合的核心价值观，都有超强的审美节律感应能力。这两点特质的契合，内在决定了他们诗歌之间的必然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前人已有不少研究，特别是苏诗的查评、纪评，有许多很好的意见，本文这里也就不赘说了。

论文注释：

①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②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编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

③《淳南诗话》卷下。

④《后山诗话》。

⑤《岁寒堂诗话》卷上。

⑥《后山诗话》。

⑦《藏海诗话》。

⑧《曲洧旧闻》卷九。

⑨《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一。

⑩《简斋诗外集》卷首。

⑪王世贞《读书后》卷五。

⑫《龙性堂诗话》初集。

⑬《檐园文集》卷二十一。

⑭《复初斋诗集》卷六十七。

⑮《牧斋外集》卷五。

⑯《二程遗书》十五《伊川先生语一》。

⑰《视觉思维》第451页。

⑱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23页。

⑲曾永成《感应与生成》，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⑳《杜诗镜铨》卷四。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刘清泉）

谈谈苏轼的“疑”

——由读《石钟山记》想到的

胡先西

内容提要：苏轼对前人的说法敢疑，无论是权威先贤，还是经典著作，他都敢疑。苏轼不仅敢疑，而且会疑。苏轼的疑是经过思考分析后的有依据的疑，这体现了一种严谨治学的态度。不仅如此，苏轼还能解疑。苏轼这种敢疑、会疑且能解疑的严谨治学态度，不仅对我们做学问有获得真知，减少谬误的好处，而且对我们的教育也大有帮助，它能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不唯书、不唯师，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勤于动脑来获得尽可能正确的知识，为成为科学大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敢疑 会疑 解疑 育人

《石钟山记》是苏轼散文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开头有一段话，现实录如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酈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这段话里，苏轼对前人石钟山得名的解说一而再地表示了怀疑。首先是怀疑酈元的说法。酈元即酈道元，北魏地理学家，其地理学专著《水经注》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中学课本里选过《水经注》里的《三峡》一文，凡读过的都会在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可对于这位地理学家其权威巨著《水经注》中对石钟山得名是“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的说法，苏轼用“人常疑之”来表示怀疑。“人常疑之”，其中隐含的意

思是不仅我苏轼怀疑，别的人常常也怀疑，那你酈元的说法真是很有问题。为什么呢？你酈元说石钟山得名是因为山下是深潭，微风鼓动波浪，与山下的石头撞击，从而发出洪钟般的声音。可现在就是拿发音很好的钟与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们发出鸣响，更何况是实心而发音不好的石头，怎能发出大钟般的声音呢？所以你酈元的说法值得怀疑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是对唐人李渤说法的怀疑。李渤看来也是对酈元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所以他才亲临石钟山查看，并写下了《辨石钟山记》一文，表示了对酈元说法的不认同，并发表了自己对石钟山得名的看法。李渤的行为，印证了苏轼文中对酈元说法是“人常疑之”这点。但苏轼认为，李渤的说法，更有问题，苏轼用“余尤疑之”来表达自己对李渤说法的根本不认同。尽管你李渤亲身到了石钟山，可仅仅凭在山上拣了两块石头，敲击它们发出声音来，就以此说石钟山的得名是因为山上的石头敲击后可以发出钟声来，这一说法更是站不着脚的。因为敲击后能发出声音的石头，这世上所有的山上都是有的，为什么所有的山都没有叫石钟山，偏偏这里名为石钟山呢？所以我对李渤的说法更为怀疑。

从《石钟山记》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对前人说法敢疑并会疑的人。说他敢疑，是他对酈道元这位大学问家的权威著作里的说法都敢怀疑；说他会疑，是他所提出的可疑之处是经过思考分析后的有依据的疑，而绝非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不分青红皂白的狂妄的“怀疑一切”的“疑”。这种敢疑并会疑的严谨治学态度在苏轼的著作里还有不少，现再举几例。

《东坡志林》卷四中有《元帝诏与〈论语〉〈孝

经》小异》这篇短文：

楚孝王器疾，成帝诏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东平王不得于太后，元帝诏曰：“诸侯在位不骄，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离，附离也，今作“不离于身”，疑为俗儒所增也。

苏轼在文中说西汉成帝、元帝的诏书与“今（指宋当时）《论语》、《孝经》”在谈同样的问题时，其说法有小小的不同，并对《孝经》中把“离”说成“不离”这一“小异”，怀疑是“俗儒”（即知识浅薄之人）所增加上去的。为了使大家能更清楚了解苏轼在文中所说的事，笔者现将“今《论语》《孝经》”中与成帝、元帝在诏书所说同类问题的文字拿来作一比较。汉成帝在诏书里对楚孝王刘嚣得了重病的事说的是“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而“今《论语》”中《雍也篇》里说孔子的弟子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去看他而这样写道：“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成帝诏书与“今《论语》”在表达对生病者的痛心心情时，说的话基本一样，其中只是成帝诏书里用的是“蔑之”，“今《论语》”中用的是“亡之”，“蔑”与“亡”说法不同，但这点小异无关紧要，因为“蔑”与“亡”都可以作为“无”讲，表达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可“今《孝经》”在谈到当权者在位不骄便可以富贵在身、社稷可保这一问题时，与元帝诏书中的小异却有大问题。元帝诏书里说：“诸侯在位不骄，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今《孝经》”里则说的是：“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两相比较，都谈当权者在位不骄的好处，但唯独不同的是对可以富贵在身这点元帝诏书里说的是“富贵离其身”，而“今《孝经》”里则说的是“富贵不离其身”，一为“离”，一为“不离”，却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等于是说“离”就是“不离”，这岂不自相矛盾么？苏轼通过比较，觉得应该相信元帝诏书里的“离”就是“在”的意思，即苏轼在文中说的“离，附离也”，从而怀疑“今《孝经》”里的“不离”的“不”是“俗儒”增加的。怀疑的依据就是元帝的诏书里所说的相关的话。

苏轼不仅对“今《论语》《孝经》”敢疑会疑，而且对古代著名思想家的名言也敢疑。《东坡志林》

卷四还有一篇短文是《辨荀卿言青出于蓝》：

荀卿云：“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世之言弟子胜师者，辄以此为口实，此无异梦中语。青即蓝也，冰即水也。酿米为酒，杀羊豕以为膳羞，曰“酒甘于米，膳羞美于羊”，虽儿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为辨，信其醉梦颠倒之言！以至论人之性，皆此类也。

“青出于蓝而青于蓝”这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其著名的文章《劝学》中的名句，后世乃至包括今天，人们基本上也将其作为学生超过老师的一种习惯说法。苏轼并不是否认学生超过老师这点，而是怀疑荀子用来说这个道理的比喻本身有问题。苏轼说青与蓝、冰与水本为同一事物，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怎么可以将青与蓝、冰与水当成两个不同的事物来进行比较呢？弟子胜过老师，毕竟弟子与老师那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而非同一个体。荀子拿同一个体的东西来比喻两个不同的个体，那简直是说梦话。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怀疑得对，苏轼又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反驳荀子。荀子不是爱用打比方来说理么？我苏轼也用打比方来反驳你。把米拿来酿成酒，杀了猪羊做出佳肴，然后说酒比米甘，羊比膳羞美，即使是儿童都会笑你。你说你说的是不是“醉梦颠倒之言”。而你所谈论人性的那些话，大多也是打胡乱说。

笔者在读《辨荀卿言青出于蓝》一文时，虽然也不很认同苏轼对荀子此说的怀疑否定，但从敢疑会疑，疑得有理这点看，苏轼是做到了的，在这方面是可以作为范例的。不过我揣想，苏轼对荀子不满意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荀子主张性恶论吧，而苏轼则提倡的是仁爱慈善的人性，二者水火不容，所以苏轼说荀子是打胡乱说也就不奇怪了。

苏轼不仅疑作品中的言语辞句，而且对名著中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疑，《东坡手泽》中有《宰我非叛臣》一文：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作乱夷其族，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而天下所通祀者，乃容叛臣其间，岂非千载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儿子过考阅经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不叛，左验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负冤千岁，而吾师与蒙其诟，自兹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宰我也叫宰予，孔子的学生，尽管孔子说“朽木不可雕”的白日睡觉者就是他，但宰我却是孔子

十大门徒之一，其善于言辞可与子贡相比肩，而且在孔子的学生中他是经常向老师提问并表明不同看法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相传宰我在齐国为官时，参与齐国大臣田常杀齐简公的叛乱行动，最后被诛杀乃至一族人都被株连。司马迁（即太史公）在《史记》《弟子传》中也作如是之记载。但苏轼却对此存疑，疑的依据是既然宰我是叛臣，可天下在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其门徒时，宰我也是被祭祀者之一，这岂不是千年不白之疑惑么？苏轼这一疑，也是疑得有依据的。

苏轼除了对作品本身表疑外，对评议作品的一些看法也有自己不同的观点，《仇池笔记》卷上有《白乐天诗》一文：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为幸祸，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矣。

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当权者，以僭越言事的罪名贬出朝廷。他本被贬为江表刺史，即江表这一郡的行政一把手，但作为当时朝中大臣的王涯却说白居易不宜治郡，于是追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这一地方政府的属官。唐文宗大和九年

（835），即白居易被贬二十年后，宰相李训与郑注谋划除掉宦官仇士良等，假称甘露降祥，诱使仇士良等前去看并将其诛杀。结果，事情败露，李训等受诛。世称“甘露之变”。此时作为几朝老臣且身居宰相位置的王涯尽管没有参与其事，但因涉嫌而被抓起来后，受不了牢狱中的酷刑，便自称同谋也被诛死。二十年前，白居易因王涯所谗被追贬为江州司马，二十年后，王涯却落得如此下场。白居易知道这事后写的诗中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两句。已年过六旬的白居易此时在洛阳履道里山中闲居，自号香山居士，优哉游哉！所以此诗句流传出来后，不少人都认为白居易在借诗表达幸灾乐祸之情。可苏轼则说这些人是“不知者”，白居易不是表乐祸之情，而是为王涯受祸表同情。因为白居易本身就蒙受过这种被诬之冤。而白居易的这种诗情，也只有自己也蒙受被诬之冤的苏轼才体会得到的。苏轼在《白乐天诗》中尽管没有用“疑”或“惑”这样的字眼，似乎是在谈作品本身的真正情意，但从不赞同“不知者”的看法这点看，也把他作为一种另类的“疑”。

笔者说苏轼敢疑会疑，还表现在苏轼能解决“疑”这点上。如果只是敢疑并能提出怀疑的依据，但最终没有解决“疑”，那还谈不上你有本事。就像说你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那你是算不上有本事的。而苏轼在这方面是做得不错的。

苏轼解决疑问通常用两种方式：一是查引相关的文献资料来解决问题，二是用亲自调查或结合亲身体会来解决问题。

《宰我非叛臣》《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就属于第一种解决“疑”的方式。在《宰我非叛臣》中，苏轼说为了解决宰我是否为叛臣这个疑问，便叫自己的儿子苏过去“考阅经书”，通过查阅资料分析宰我被杀的原因，证明了宰我并非因叛被杀，从而洗清了宰我背了千年的叛臣之名，也洗清了宰我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读书人的先师孔子所蒙受的责备。这真是“古今之快也”！但细心的人一定会问，苏轼在这里所说的“令儿子过考阅经书”是“考阅”的什么“经书”，里面为什么又能证明宰我不是叛臣。为解决这一疑问，笔者再给大家呈上《东坡志林》卷三中《宰我不叛》一文：

李斯上书谏二世，其略曰：“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宰我不从田常，为常所杀也。《弟子传》乃云：宰我与田常作乱而灭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弟子传》妄也。

从这篇短文不难看出，苏轼叫儿子苏过查阅经书，查到秦李斯谏二世胡亥的奏书里有关田常叛齐简公的一段文字，大致的意思是田常叛齐时，杀了宰我，这表明宰我没有跟随田常叛乱，才被田常所杀。由此看出，宰我不仅不是叛臣，反而是忠臣。所以太史公司马迁在《弟子传》中所说的“宰我与田常作乱而灭其族，孔子耻之”是不正确的，李斯是先秦时的人，离孔子生活的年代不远，应该是了解那段历史的。所以在李斯之后近百年的司马迁所写的《弟子传》中关于宰我为叛臣的说法是“妄也”。

《元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中，用以证明《孝经》中的“富贵不离其身”中的“不”字是“俗儒”增添的依据，就是元帝诏书里关于“东平王不得于太后”的几句话。当然，如果苏轼还有别的佐证材料，那说服力会更强。

而《石神山记》则是苏轼用亲身实践经历来解

决“疑问”的典范。为了证明自己对酈道元、李渤之说“疑”得正确，并能解决“疑”而找到石钟山得名的真实原因，苏轼竟不顾危险，在“莫夜月明”的情况下，独与儿子苏迈乘小船到石钟山的绝壁下，经过一番充满惊险的探访，终发现了石钟山得名的真实原因。他在文章中说，石钟山下有很多深浅不一的洞窟，微波进入里面，在洞窟里激荡发出了“噌吰”“噌吰”的钟鼓声，接着又在江心发现一块可坐上百个人的大石头，这大石中心是空的，有不少小洞，风浪涌进涌出这些小洞，便发出了“窾坎镗鞳”如钟般的声音。而且这声音与石钟山下的“噌吰”“噌吰”的声响应和，好像在演奏一段殿堂钟鼓乐一样。为此，苏轼认为自己找到了古人为石钟石命名的真正原因，他高兴地对儿子苏迈说：“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当然，对于苏轼对石钟山得名的说法，后世之人也有不赞同的，认为石钟山得名另有其因。但我们在这里并不探究谁的正确，我们要肯定的是苏轼用亲身实践经历来解决“疑”的这认真负责的严谨治学的精神。尽管唐人李渤也亲临石钟山，但他那种走马观花的探访与苏轼深入险地的探访相比，那是不值一提的。

此外，《白乐天诗》一文应属于苏轼用亲身体验来解决“疑”这一类。之所以苏轼认为白居易的“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两句诗不是“不知者”所认为的“幸祸”之情，那是因为苏轼自己也经历过像“乌台诗案”那样所蒙的不白之冤。没有如白居易、苏轼那种蒙冤经历的“不知者”，只能从表面现象来作一般的世俗的推断，而经历过蒙冤之痛的如白居易、苏轼等，彼此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这里借用白居易江州司马任上写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诗来证明苏轼尽管在白居易之后二百多年，无法相识，但由于彼此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彼此的心是能相通的。

苏轼这种敢疑、会疑、解疑的严谨治学精神在我们求学、做学问的人当中是应大力倡导的。这种严谨治学态度的好处在于能使我们在学习、做学问的过程中通过质疑、存疑、释疑从而获得真知，减少谬误。不仅如此，笔者觉得在教育人方面，也应大力倡导这种敢疑、会疑的精神，因为它能使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唯书、不唯师，并通

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勤于动脑来获取知识，这样获得的知识就会正确得多，在脑子里也就扎得牢固得多。这是成为学问大家必不可少的途径。苏轼的这种“疑”的精神也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他在儿童时上学就有这样的事。他在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先生那里受教之时，刘先生把他自己的得意诗作《鹭鸶诗》念给孩子们听，其中尤其得意于“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两句。可小小年龄的苏轼听完后说先生“雪片逐风斜”中的“逐风斜”没有写出鹭鸶的归宿，不如用“落蒹葭”好。刘先生听后，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认为苏轼改得好，称许他敢疑敢动脑敢说不，说：“吾非若师也！”在这个小故事中，笔者尤其佩服的是刘微之这位老师，小小年纪的苏轼的敢疑精神在刘老师的手里没有扼杀，而是被刘老师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肯定，苏轼以后能成为学问大家，刘老师功不可没，所以刘老师去世时，翰林学士范镇的悼亡诗里有“案头曾立两贤良（指苏轼、苏轼兄弟）”词来赞扬刘先生。

可是刘先生这种育人态度从古至今，在教育界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并不多。古的不说，对于当今的教育界，笔者从教几十年，个中情况了解不少，在这方面有点发言权。我们有不少老师，其中也包括笔者在内，总觉得自己给学生讲的教的都是正确的，在课堂上习惯以自己的教授讲解为主，尽管有时也要设计一些问题，但主要作用是把学生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知识上引。一般来说，极少有考虑到要学生对讲的东西说“不”，甚至不少老师容不得学生质疑自己教授的东西。因为这些老师认为，自己讲的教的都是正确的，怎么能容许你说“不”呢？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不否认，我们教给学生的书，我们在课堂上讲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但因此而不引导学生质疑，甚至扼杀学生的质疑，那就很不应该了。且不说书上说的或你讲的并不是百分百的正确（因为这里也的确存在需要质疑的不正确的东西），即便是你讲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知识，如果你不引导受教育者去思考，去提为什么，去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而是囫圇地教给学生，那受教育者接受的所谓正确知识也是没有经过消化后得到的。这样得来的知识是掌握不牢的，是无法去应用而产生效果的。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会培养一大批不动脑或懒动脑的人。

（下转 31 页）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试探苏轼的文赋对赋体的承传与创新

陈慧君

内容提要：赋体的一般特点；赋体文学的演变及其主要成就；从前后《赤壁赋》看苏轼对赋体的承传与创新。

关键词：汉赋 夸张铺陈 新意 妙理 文赋

苏轼的赋在其作品中所占的分量很小，现存只有 25 篇。然而，仅仅两篇前后《赤壁赋》，就使他在我国古典文学的赋体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主张文学创作应“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在赋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美学理论，突破了汉赋以来赋体的束缚，开辟了一片赋的新天地，后人名之“文赋”。

“赋”是一种介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从楚辞中脱胎而出。主要特征是夸张铺陈，以状物为主，抒情为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云：“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于外。”这里的“赋之迹”是指赋的表现与形式，讲究文采辞藻。“赋家之心”是指构思、内容，要求“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范围极其广泛。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所谓‘写物图貌，蔚以雕画’，就是赋在文学上的作用。”

赋得名于战国时期荀卿的《赋篇》，由此起始至西汉达到高潮，发展成为文学的主流之一，称之为汉赋。前期成就较高的是贾谊，其代表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有明显的楚辞痕迹。如果说贾谊的赋是楚辞向汉赋的过渡，那么，枚乘的赋，

特别是其代表作《七发》，则是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奠定了汉赋的基础。作品虚构了吴客为患病的楚太子诊治之事。吴客讲述了七件事启发太子，最后以战国时代众多思想家的“妙言要道”，使太子“霍然病已”。实际上吴客治疗的是太子的心病，运用的是心理治疗法。此赋的主要特征是：虚构的故事框架和问答的形式；通篇叙事，语言散文化，但夸张藻饰的文风未变；题材进一步扩展，除狩猎、宴游的场面外，增加了观涛、奏乐等场景的描写；内容上强化了“劝百讽一”的道德说教。

毋庸置疑，汉赋的最高成就是司马相如，其代表作《子虚赋》和《上林赋》最享盛名。此二赋并非同时所作，但人物相同，故事相承，题材一致，可以说是姐妹篇。其内容也是在虚构的框架中、采用人物问答的方式展开。《子虚赋》中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大臣乌有先生夸说楚国的云梦泽以及楚王在此游猎的盛举；乌有先生不服气，也夸赞齐国山海之宏大以及齐王出猎之盛举。《上林赋》中的亡是公向子虚和乌有先生夸赞天子苑林气派之恢弘壮丽，天子游猎场面之盛大奢华，由此证明，天子远胜于诸侯。二赋的内容都是侈陈王侯间“争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赋家之意图在于抑诸侯而尊天子，不过，《上林赋》的这几句评论倒是很贴切地揭示了二赋的主要内容。作品呈现出极其广阔的人物活动空间，渲染了诸侯、天子豪奢的生活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繁荣兴旺的大汉气象。

二赋在结构上都分三大部分，前后两部分为散文，分量较小；中心部分为韵文，主要的内容集中

于此。前部分交代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最后部分“曲终奏雅”,进行道德说教。《子虚赋》中,乌有先生批评子虚不称颂楚王之厚德,而盛赞云梦,奢言淫乐,然而,接着自己也对齐王的游猎场面竭尽夸赞之能事,自相矛盾。《上林赋》由游猎联系到文治之盛:“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由天子猎禽兽进而以仁义猎取民心,由天子的游猎之乐升华为万民受益之圣德,凸现了颂扬大汉王朝的题旨,但不免牵强附会。

二赋在艺术形式上突出的特点是,描绘事物极度的铺张扬厉,辞藻极尽华丽雕琢。《上林赋》以四千余字的篇幅,铺写游猎一件事,规模空前。作品以游猎为中心叙事状物,山丘河海、宫殿囿苑、奇花异卉、珍林佳木、飞禽走兽、音乐歌舞、服饰器具、骑射宴饮……无所不包,而且从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各个方位进行扫描。二赋创立了汉代大型颂赋的格式,成为此类作品的范本。司马相如本是曳裾裾于侯门的“辩泛之士”,由于向天子献赋而得官的文人,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史记·司马相如传》),因此,他创作这种大型的颂赋,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赋的缺陷非常明显,由于赋家追求的艺术效果是赋文所谓的“巨丽”,因而内容“夸张失实、文字艰深、罗列过度、呆板滞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扬雄评司马相如的赋“极百靡之辞”,班固评“侈丽宏衍”,王充评“文丽而务巨”……总之极尽夸饰之能事。如《上林赋》形容天子的林苑南北温差之大如同南极、北极:“其南则隆冬生长……其北则盛夏含冻裂也”。南部即使隆冬季节也树木茂盛;北部即使盛夏之时,也寒冷冰冻,极言天子苑林之广阔。形容苑内的宫殿观阁分布之广:“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形容离宫之高伸手可摸天,星辰簇拥于四周:“仰攀橑而扞天;奔星更于闾闑……”写天子猎兽的行动:“追怪物,出宇宙”,“乘虚无,与神俱”……如同神魔斗法一样神奇。

大汉中期国势逐渐衰落,赋的创作也出现了变化。歌功颂德的鸿篇巨制明显减少,出现了反映世俗生活的抒情小赋,尖锐的社会批判代替了道德说教。蔡邕的《述行赋》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当时朝廷昏暗、宦官专权,皇帝听说蔡邕善琴,便召他进京述职,他行至半途便托病返回故里。此赋名为作

者途中见闻的记叙,实则借此抒发对朝廷的愤懑情绪。《述行赋》篇幅短小,抒情性强,批判尖锐。“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以便辟兮,纠忠谏其駸急。”贵族们的居所精巧华丽,而百姓的房屋潮湿漏水;贵族用精粮喂养鸟兽,而穷人只能以糠粃充饥;皇上对奸佞谄媚者非常宽容,对忠臣进谏者极其苛刻。作品以鲜明对照的手法,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侈和下层社会的贫困,以及朝政的昏乱。

六朝时期的“俳赋”,由于受到骈文的影响,将句法的对偶、辞藻的华丽与用典推崇至极点,以至走入了赋体的死胡同,日趋衰落。直到唐宋时期,由于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赋体才获得新生。以散文代替骈文,句式参差,押韵比较自由,称之文赋。

苏轼是古文大家,他在其父苏洵的影响下,大力推崇韩愈、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认为骈体文及其后的“时文”造成了“文教衰落,风俗靡靡”的不良后果,因此完全赞同“……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古”(《谢欧阳内翰书》)。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充分加以实践,在《谢梅龙图书》中,自云:“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苏轼的赋即是“文赋”的典范。他继承了汉赋的一些形式和艺术手法,又突破了汉赋形式的束缚,开创了一种浏亮优美的新赋体。其前后《赤壁赋》就是杰出代表。

苏轼的“二赋”如同汉赋一样,采用了主客问答的框架,韵文与散文兼用,行文之中常使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具备了赋体的基本特征。但它又不拘泥于汉赋的写法,展开活动的场景并非虚拟,而是真实的;句式变化多端,时而规划整齐、时而错落有致,韵文、散文巧妙结合,摆脱了汉赋呆滞的形式;语言风格摒弃了过分夸张、雕琢的弊病,晓畅而生动;全文以散文为主,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于一炉,“新意”盎然。

前《赤壁赋》的场景是黄州赤壁下的江面上,时间为七月十五的夜间,正是初秋江水浩荡之时节。全文在水天一色的浩瀚空间里,在江水、清风、明月三种自然景象的烘托之中,通过主客对话,展开了苏子与客人的整个游览过程。由饮酒歌咏,到对历史人物的凭吊,其间客人情绪有所起伏,最后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苏子一番关于水、风、月等大自然变与不变的哲理性议论。

全文共分三部分,游人的情绪经历了由乐——

悲——乐的发展变化过程，作品脉络清晰而又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第一段，七月中旬，苏子与客人泛舟夜游赤壁之下的大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众人饮酒吟诗，游兴很浓。不一会儿，皓月东升。月光照耀下的江面，呈现出别一番自然景象：“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他们那如苇叶一般的小舟飘荡在浩瀚而苍茫的宇宙空间里，更显得渺小而轻盈，引发出了船上人们的一种特殊感受：“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作品将游人在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无拘无束的情怀充分敞开，领略到一种凌空飞翔、飘飘欲仙的感觉，完全是一种超脱尘世的心理享受。于是众人“饮酒乐甚，扣舷而歌”，把欢乐的情绪推向高潮。然后，由客人吹奏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声，使氛围出现了一个突变，由兴高采烈变为悲叹哀怨。

第二段，通过吹洞箫客人的答话，交代了心情变化的原因。黄州赤壁相传是三国时代著名的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客人由此联想到当年曹操破荆州时不可一世的盛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枭雄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引发了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叹。

最后一段，苏子的回答，以大自然中最常见的水、月和风为例，发表了一番议论：“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番关于大自然“变”与“不变”的辩证哲理，不仅解开了客人的愁结，也使读者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不必为人生的短暂而忧愁，只要应顺自然发展规律，就会生活得轻松愉快。于是，“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全文在欢乐尽兴之中结束。

《赤壁赋》的写景、抒情也运用了汉赋常用的对偶、排比等句式，但绝不给人以雕琢不实的感觉。

景物描绘清新而又形象，例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寥寥数语，就在读者面前铺开了一幅寥廓的大自然画轴，令人心旷神怡。

前赋最突出的特点是深邃的哲理性，这即是作者所推崇的“妙理”。苏轼以澄澈的心怀，透过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观照自然，感悟人生，因此，能参透宇宙万物的生存法则。这跟苏轼深受老庄哲学“乘物以游心”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庄子·人间世》云：“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一养中，至矣。”认为只有超脱了世俗的名缰利锁的羁绊，才能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尽管苏轼身处罪官谪居的境地，却无丝毫悲观颓唐的情绪，充分表现了他旷达超凡的博大胸襟。此赋使读者感到一股浩然之气扑面而来，心胸为之豁然开朗，产生出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这就是苏轼在文中的“妙理”所产生的审美力量。

后人对苏轼的前《赤壁赋》有许多美誉。如宋代谢枋得在《文章轨范》中云：“此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似。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如乘云御风而立乎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挂之齿牙，亦不足入其灵台丹府也。”又云：“余尝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与天地合而为一，始知此赋之妙。”宋代王正德在《余师录》中云：“贾谊、宋玉赋，皆天成自然。张华《鹪鹩赋》，亦佳妙。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清代张伯行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云：“以文为赋，藏叶韵于不觉，此坡公工笔也。凭吊江山，恨人生之如寄；流连风月，喜造物之无私。一难一解，悠然旷然。”

后《赤壁赋》同样写赤壁夜游，但在内容与写法上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此赋的时间推移到了“十月之望”，即初冬季节，活动场所主要在江岸上。

全文分两个层次展开主客夜游赤壁长江的活动。

前一层写主人同二客月夜出游之前的准备活动。场景自雪堂至临皋亭的路途中。此时的季节景象：“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一幅宁静清朗的初冬夜景。人们的心情也很愉快，大家“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如此良夜，引发了众人的游兴。况且，客人有美味的松江鲈鱼，主人有美酒，更增添了游兴。于是，自然而然地得

出了夜游赤壁势在必行的结论。

后一层是全文中心，直接记叙赤壁的夜游活动。由于季节的变迁，赤壁长江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前赤壁游的景象：“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在这幅初冬季节的山水图景上，突出了矗立于江中的赤鼻矶，由于江水低落，分外显得峥嵘险峻。接着，作品着重描写了作者独自攀登赤鼻矶的行动：“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然后，笔触随着场景的转移，叙写了夜半中流放舟江上的奇景。正当人们处于“四顾寂寥”的冷清的境况之中时，“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嘎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孤鹤的出现打破了静谧的境界。最后，夜游结束，主客各自回家就寝，在主人的鹤变道士的梦境中结束。

后赋以写实为主，着重记叙了夜游赤鼻矶的准备，描写了作者独自攀登赤壁矶时披荆斩棘的情景。人物矫健的动作，洒脱的身姿，给人以逼真形象的视觉。同时，作品对江上萧瑟而又带点震慑的氛围的渲染，以及作者江上所见孤鹤变成了梦境中“羽衣蹁跹”的道士，意境高远，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正当作者登上赤鼻矶之时，江面上突然：“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凜乎不可久留也。”于是他返回小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接着，出现了一只横江而来的孤鹤，引出后面的梦境。此乃庄子“羽化而登仙”的意境，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作品真实的场景与虚幻的梦境融为一体，转化非常自然，意象引人遐想。

此赋以记叙性散文为主，攀登赤鼻矶的动作及其意境的描述则用韵文，赋的味道比较浓。

后世的学者们也给予后《赤壁赋》以很高的评价。明杨慎云：“《后赋》尤精于体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鹤之事，尤其出人意表。”（《三苏文范》）

从文体而言，二赋类似游记。但一般游记不用韵，而赋用韵，因此，作者以记为赋。或者说，以赋文体写记游散文。这正是苏轼文赋的创新之处。

在艺术风格上，既有苏轼散文行云流水般的飘逸豪放，又表现出赋的华采优美，给读者以超凡脱俗的美感。

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题材一致，都是苏子与

客人夜游赤壁，但具体内容不同，写法也不一样。明李贽评论后赋时云：“前赋说道理时，有头巾气，此则空灵奇幻，笔笔欲仙。”（《三苏文范》）前赋哲理深邃，后赋浪漫色彩浓郁，二者各有千秋。司马相如的二赋，不仅题材完全一致，而且写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上林赋》的铺陈夸饰更甚于《子虚赋》而已。由此可见，苏轼不仅仅善于在与前辈作家相同体裁的作品中，“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且，在本人同题材的赋作之中，也能别出“新意”，营造不同的意境，给读者以不同的审美享受。这就是苏轼对赋体的突破和创新。

2010年8月1日

（山东济宁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清泉）

（上接27页）

这种人只知道人云亦云，只懂得存在就是合理正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主要由这样的人组成，那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前进，就无从谈起。在中国的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国，都有一个让大家长久困惑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近百年以来，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大陆本土的中国人获得过诺贝尔这一让世界羡慕且能体现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奖呢？我不知道像杨振宁、李政道之类移居他国却获得了这一殊荣的人是如何来看待困扰中国人的问题。但笔者揣测，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在自己专攻的领域中取得了对人类的科学文明有巨大创新成就的人。而创新成就的取得，首先在于创新者善于通过独立思考而对现存的东西说“不”说“不完善”“不美好”，他们才有可能去创新。这在一个大多是不动脑的人群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不少有识之士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中的弊端，现正在大力提倡各种教育改革，积极倡导并通过课改来培养学生勤于动脑、敢于质疑的精神。笔者也用《谈谈苏轼的疑》这篇拙作，为教育界的同仁们提供一个借鉴。我和大家都满心期待，苏轼一千年后的今天能出现更多苏轼这样的大家，那诺贝尔奖花落中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清泉）

苏东坡晚年美学境界的新追求 与指导文学创作的新思想

李景新

内容提要:作为一代文坛宗主的苏东坡,对培养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指导年轻学者的写作也就成为他长期进行的工作。晚年的苏东坡在美学上极力追求着一种平淡简远的审美境界,然而在指导年轻学者创作时,却并不主张自己所极力推崇的平淡简远之风,而是张扬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美学风格,即豪横纵放、绚烂峥嵘。他认为平淡简远应有豪纵绚烂作基础,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才是高境界的平淡。这是苏东坡晚年指导年轻学者文学创作的具有特色的方略。苏东坡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又是一位由豪横绚烂型向平淡简远型过度的大诗人,他深知个中三昧,所以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实践基础,至今仍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 苏东坡 晚年美学境界 文学指导思想 绚烂 平淡

苏东坡乃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上影响最大的领袖式人物。成为领袖的苏东坡对于文学事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曾经对门生说:“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欧阳修当年在发现年轻的苏轼时大喜过望,对苏东坡给予厚望,之后的苏东坡也同样把厚望寄托在门生身上。作为一代宗主,苏东坡在文学上的关心不仅仅局限于正式登堂入室的门人,他时时不忘在文章事业上对更多的年轻人进行引导,对年轻学者的请教,他总是用他特有的智慧的方式加以指教,让人获益。他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几

乎无与伦比的贡献。

苏东坡在诗文创作方面对年轻学者的指导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发人深思的事情是,他晚年对平淡的风格和审美境界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在创作上也达到非常高的境界,但是在指导年轻人创作时却极力主张要从峥嵘绚烂的风格入手。一方面追求平淡,一方面又提倡豪灿,这看似一种矛盾,其实却蕴含着非常深刻道理在,体现着苏东坡的个人特色。

晚年的苏东坡在美学上极力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审美境界。作为一种艺术境界,在书法上,他推崇王羲之的“萧散简远”,在诗歌上,他推崇“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这种境界要求在创作上完全处于自然状态,其结果便是审美上的平淡。同时他强调,平淡不能淡如白水,而要淡中有味、淡而且远,简古之间含纤秣,所以他又说:“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应“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见《书黄子思诗集后》、《评韩柳诗》)而能够达到这种诗美最高境界者唯有陶渊明。他在儋州完成文学史上的一大壮举“和陶诗”之后写信给弟弟苏子由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被公认为是对陶渊明诗最经典的评论,也代表着苏东坡晚年审美的终极追求。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在指导年轻学者创作时,却并不主张自己所极力推崇的平淡简远之风,而是张扬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美学风格,即豪横纵放、绚烂峥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晚年贬居儋耳期间,琼州学者姜唐佐前来请教,

他把自己平日的习作呈给先生，苏东坡看完后，在上面题了这段话：

云兴天际，焱若车盖。凝目未瞬，弥漫霏对。
惊雷出火，乔木靡碎。殷地爇空，万夫皆废。
雷霆四坠，日中见昧。移晷而收，野无完块。

这段话并非苏轼本人所作，而是刘禹锡《楚望赋》中的一段。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刘禹锡的一段文字题在姜唐佐的课册上呢？姜唐佐是聪明人，他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感到莫名奇妙，他很快领略了先生的意思，但他没有说明，一如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一切都在心灵中接受。这一层，南宋的葛立方没有参透，他认为苏东坡当时是戏题刘梦得的文句给姜唐佐，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解。到了清代的苏学巨匠王文诰才点破个中奥秘，他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指出：“公诋文之法，尽于此矣。是时不欲出所语，故书刘句。葛立方以为戏者，妄也。”他说苏东坡教导年轻人作文的方法，全都包含在这里了，此话说得极是。苏东坡以文字获罪，故对文字每怀忧惧，在贬琼期间，他曾屡次流露出不愿作文以示人之意，他经常书写前人的作品以遣怀明志。这段题在姜唐佐课册上的文字，绝非“戏书”，其深意恰在于借他人之语来启发姜唐佐，暗示作文之法。《总案》所引查注，把苏东坡所题这段文字与其他人的论文方法进行了比较：“李德裕《文章论》云：文章当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黄梦升《题兄子庠文》云：子之文章，电击雷震，雨泡忽止，闾然泯灭。欧阳公《祭苏子美文》云：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斥，霹雳轰车，须臾霁止而四顾，山川草木，开发萌芽。东坡题姜君弼（唐佐字）课册，亦同此一机括也。”可见，苏东坡是用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方法在指点姜唐佐。那么，这段文字代表着苏东坡怎样的文学观呢？这段文字描绘楚天，绚烂峥嵘，气象豪纵，变化多端，惊心动魄。我们再与查注所引李、黄、欧的评论文字所描绘的境界相比较，就不难看出，苏东坡要告诉姜唐佐的，正是对这种豪横放纵、峥嵘绚烂风格的张扬。我们可以感到，他主张年轻人作文，要辞采和声情并重，要富有气势，要焕发奇丽的壮美，要放开眼界和胸怀，而不可有所局促，气弱无骨。另外，苏东坡主张文学创作要处于自然状态，触兴而发，兴尽而止，不择地而出，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纹理自然，姿态横生。所书《楚望赋》这一段，云兴天际者，即不择地而出也，移晷而收

者，即止于所不可不止也，期间变化，一任造化，姿态横生也。

至此可以明了，苏东坡一方面自己在极力追求着萧散简远、平淡超然的美学境界，另一方面在指导年轻学者时却张扬着豪横放纵、峥嵘绚烂的作风。那么，其中奥秘何在？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的一段话可以为人们揭开答案：

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丽之极也。”

原来，这之中包含着苏东坡关于诗人作家创作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宏观指导策略，即应从豪横纵放、峥嵘绚烂入手，渐次向萧散简远、平淡超然过度。当然，“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是一种策略，对于一个人整体而言，并非意味着是单向的线型变化，也就是说，当绚烂之风达到成熟时可以追求平淡，而到达平淡之时却并不是要放弃绚烂，绚烂和平淡可以并存，既可以创作辞采飞扬、绮丽壮观的作品，也可以创造平淡自然、简古萧散的作品，随兴所发，随意所之，达于大美。事实上，苏东坡晚年在思想上极其推崇平淡简远的审美境界的同时，在创作上仍是多种风格并存，许多作品正如他的弟弟苏子由所说“不带老人衰惫之气”，雄阔奇伟的豪纵之作也时时有之。

苏东坡的这种指导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现实针对性。

豪横纵放、峥嵘绚烂审美追求是外向的，它包含才学、气势、文辞上的含义，要求才学的张扬、气势的纵横、力度的豪健、文辞的丰灿，这是与年轻人意气风发、志向高远的人生特点相统一的。而萧散简远、平淡超然的审美境界是内向的，它的精要是简约，是淡泊，是超然，是悠远。它不是仅靠才学可以达到的，而是要有深厚的人生阅历之后，从纷繁之中超脱出来，升华为超然澹泊的人生智慧，与个人秉赋的情性相融合，并且语言技巧高度优化、净化，然后豪华落尽，最终表现为淡而且远。苏东坡晚年虽然本人把淡远美作为诗学最高境界的终极追求，但他同时也非常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于这种美学风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即使有人适合并有达到如此境界的禀性条件，也必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并经过豪横纵放、峥嵘绚烂型美学风范创作的训练才有可能实现。因为豪横绚烂作风的创作锻炼，使创作主体潜

在的才情得到激发，然后随着人生经验及艺术经验的丰富，再渐造平淡，才会达到“淡远”的审美境界。如果一开始便走平淡一路，便会制约才情的张扬、气度的开张、方法的拓广、文辞的丰赡，甚至于消减个人的雄心壮志。本无“豪华”，何谈“落尽”？非“豪华落尽”之“淡”，只能是起点上的“淡”，是低水平的“淡”，也只能是“淡”而不“远”，更谈不上“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了。东坡的这一理论，葛立方领会得深刻，他在《韵语阳秋》中就东坡的思想发挥道：“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绚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正符合苏东坡的理论思想。

苏东坡自身便是由豪横纵放型向平淡简远型过渡的诗人。苏东坡才高性豪，早年即形成豪横放纵、峥嵘绚烂的作风，并成为他一生诗文创造的主流风格。即使他的许多作品在这种雄放之中糅合了“清”的特点，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那显然仍然以“雄”为基调。随着对人生体验的不断加深，尤其是政治上屡遭打击，他在人生观上不断吸收老、释精要，把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空净之心对待一切色相的观点，与孔子“道不行而将乘桴浮于海”的境界有机结合起来，以对抗、淡化和消解人生的种种困苦。这种心态又使他在陶渊明身上看到了一种至高的生存智慧和最佳的生活方式。于是，陶渊明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乃至艺术风格，就成为他晚年不懈追求的境界。晚年贬居惠、儋之时，他虽然在创作上并没有放弃豪横峥嵘之风，但主观上更醉心于陶渊明式的淡远境界。他晚年大量的“和陶”之作，便是其晚年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的高度融合。他把经过长期张扬而达到化境的艺术才华和艺术技巧淡化到超然简远之中，把一生的“绮”浓缩到“质”之中，把一生的“腴”浓缩到“癯”之中，豪华落尽，遂使诗平淡而悠远，其中佳作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不愧渊明”，而臻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境界。有了这样成功的创作实践道路作基础，他那“从峥嵘绚烂到平淡简远”的指导思想方显得那么实在，而不是漂浮于空中的虚想理论。

据启功先生的弟子张海明教授的研究，冲淡的风格早已有之，“冲淡”审美范畴始见于唐代的司空图，而“冲淡美的鼎盛时期”则在宋、元时代。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们多推崇并提倡平淡之风，梅

尧臣说“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欧阳修则极力推崇梅尧臣诗的“闲远古淡”、“深远闲淡”。在这种时代风尚之下，北宋文坛崇尚平易之风大盛。这一方面为形成宋代诗文自己的风貌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可能也无意中给予年轻学者以误导。很多人一味追求风尚，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淡远之境，其结果只能是无味之淡、不远之淡、拙易之淡。正如葛立方批评的那样：“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别目雕琢者所为了。……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也。”作为文坛宗主的苏东坡，显然对这种局面不能视而不见。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具有现实针对性，且对扭转弊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可以说，“从峥嵘绚烂到平淡简远”的思想是其一生创造实践、理论思考和作为文坛领袖的强烈责任心相结合的产物，凝聚着苏东坡独有的创新精神。“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是其晚年所醉心的最高审美境界，“从峥嵘绚烂到平淡简远”则凝聚着他高度智慧而富有责任心的指导思想。这是苏东坡晚年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遗产，九百多年后的今世之人，如果有耐心细玩其味，亦当会有大收获也。

（琼州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

（责任编辑：刘清泉）



王文龙著《苏轼研究论稿》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定价：36.00 元

（欲购此书，请与作者或《苏轼研究》编辑部联系）

苏东坡如何适应谪居的黄州环境

——兼述其黄州诗文中的环境信息

陈 弼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从以下两方面论述苏东坡能正确看待与适应黄州环境，使东坡文化获得惊人发展：一、随缘自适，触景生情，歌吟大自然所赐予的生态美；二、勤俭旷达，儒释道相融，逐步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同时阐述了东坡黄州诗文中诸多环境信息，包括引导热爱大自然生态环境、赞美“鸣鸟百族”景象、注意改善居所环境、呼吁重视绿化环境等方面。从中可感受东坡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意识与现代意识。

关键词：苏东坡 黄州诗文 环境信息

在 1982 年举行的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上，饶学刚先生宣读了他的题为《苏东坡文艺创作高峰在黄州》^①的论文。论文指出：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的成就，以贬居黄州期间为最高；贬居黄州期间的文艺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这篇求真务实、颇具新见的论文，曾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并赢得众多专家学者的赞赏。时隔 26 年，饶先生又撰《再论苏东坡文艺创作的高峰在黄州》（《中国苏轼研究》第四辑，学苑出版社 2008 年版），继续就“黄州高峰说”作更深入的阐述与研讨。综观这两篇论文，见解新颖，论据充分，说理透彻，笔者表示赞同。本文仅就苏东坡如何看待与适应黄州环境方面，作些探讨。愚以为，能调整心态，逐步适应黄州环境，对东坡文化在黄州的惊人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一、随缘自适，触景生情，歌吟大自然所赐予的生态美

经受了“乌台诗案”的重创，东坡于元丰二年

（1079）年底被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实质是流放罪人。他于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其时黄州是一座偏僻荒凉的小城，东坡因不得入住官府，只能寓居破寺定惠院。“黄州真在井底”（《与王元直》），信息闭塞。他进入如此令人难堪的境地，心境不免凄惶，曾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和《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以“孤鸿”和幽独的“海棠”自喻，表达此时孤寂而高洁的心态。

乍到黄州的那些日子，东坡往往白天“昏昏觉还卧”（《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意思殊昏昏也》），晚上才悄悄出门。一天夜晚，他在溶溶月色中独自散步，自然界的美妙景象，触发他吟出《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此刻，东坡借梅抒怀，深切地体味到了生态环境赐予的一种安宁与和悦。此后，他常常月夜散步，纯朴美好的大自然给他带来最亲切的抚慰，内心的郁闷与余悸得以稍稍消解。加上他本就有超然自得的涵养，所以尽管处境艰难，还是能较快地自适心态，随遇而安。且看他写的《初到黄州》诗，开头以自嘲口吻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接着写“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感受，流露了对黄州生态大环境的由衷赞赏之情。同年二月下旬，东坡还曾撰《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诗，云：“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这俨然是一幅大自然的早春雨霁图，多么美妙动人！

东坡被贬黄州四年多，他在《答李端叔书》中

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曾遍游黄州及周边各地，包括鄂东大地，长江南北，许多山丘、溪谷、名胜、古迹、寺观、园林、酒楼、民居等等，留下了他的踪迹，“山水穷绝处，往往有轼题字。”（《答陈师仲主簿书》）每到一处，有所思、有所感，写下了大量赞颂自然风光、花鸟虫鱼等生态环境特别是长江的诗文（含书简小品）佳作。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老友、鄂州知州朱寿昌的帮助下，东坡由定惠院迁居临皋亭。这里原是水上驿站，并不宽敞，但自然景观怡人。“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风雨雪月，阴晴早暮，状态千万。”（《与上官彝书》）大江“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与司马温公书》）乍居临皋亭，东坡欣然作词《南乡子》（晚景落琼杯）以志，词的上片“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葡萄涨绿醅。”和下片中“……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生动地描绘了临皋亭旁暮春傍晚的山光水色及雨过天晴后充满诗情画意的夕照美景；词中还抒发了怀乡情思，渲染了纯真情操，寄寓着东坡随缘自适、超然物外的恬淡心境。

贬谪黄州期间，东坡的许多名篇佳作往往在赞美大自然山水景物的同时，寄寓对人生以至宇宙的感慨与深刻思考。赤壁诸胜他前后游览了数十次，作诗文多篇。面对“大江东去”、“江山如画”，“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赤壁怀古》），或“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前赤壁赋》）及“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等奇丽景观，不禁心潮起伏，俯仰古今，感慨万端，哲思联翩，从而在元丰五年七月、八月、十月，先后诞生了《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这“两赋一词”，是东坡人生思考步入新境界的艺术总结，是东坡文艺创作高峰在黄州的标志性力作。在这些流传千古的名篇里，大自然的景色描写、作者的真挚情感与具有哲学意味的对话，完美结合，浑然一体，“在我们眼底心上，织成了一个诗味十足、含意深远、声色俱佳的崇高而美丽的境界”（臧克家语）②，予人以艺术上的美好享受与思想上的有益启迪。

二、勤俭旷达，儒释道相融，逐步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

元丰五年，东坡在致堂兄子明的信中，透露了贬黄后旷达自娱的“奥秘”：“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他还曾风趣地和李常谈及家庭经济的窘况。他说自己快50岁了才知道盘算着度日，“大要是慳（吝啬）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何况人欲无穷，故“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并说这样在意金钱，看起来很俗气，却是益处多多的生活良策，因此“不敢独用”，奉献出来与朋友们共享。元丰三年十一月，东坡在《答秦太虚》函中，也曾谈及他“初到黄，廩入既绝”时的适应对策：“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大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元丰六年八月，东坡又作《节饮食说》，提出了著名的养生之道：“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元丰四年二月，挚友马正卿为缓解东坡生活困匮，特为他请故营地数十亩，东坡得以躬耕其中。他沿引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的先例，将这片新垦荒地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曾致函杨元素等多位好友，津津乐道躬耕东坡之情趣，并作“东坡八首”等诗，生动地描述了东坡及其家人、乡亲参加劳动的感受和尊重、同情劳动人民的诚挚心态。从此，躬耕东坡，加上此前就展开的游览交友，三五日去安国寺“焚香默坐”和天庆观“斋居”等身心活动，成为东坡贬居黄州期间的主要生活内容。

为求心态沉静、平衡，超然物外，以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东坡在思想上特别注重儒释道相融。他“杜门深居，驰骋翰墨”，贬黄期间作《易传》（即《东坡易传》，又名《毗陵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旨在坚持儒家积极用世、忠君爱国忧民的政治抱负，“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书》）他常去安国寺焚香、默坐、沐浴，深夜披览佛经，“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安国寺浴》）他杜门谢客，“厚自养炼”，蓄服丹砂，药膳保健。“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想

当有深益也”(《与王定国书》)。儒释道学说精华融汇、统一于一身,而儒家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居士集叙》)元丰三年三月,东坡到黄州不久,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公择寄诗相慰,东坡作报书,中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可见其浩然之气不减当年。此时,寓居武昌的殿直王天麟来访,得知黄鄂间溺婴严重,东坡即致函鄂州太守朱寿昌,促其依法制止,并作《黄鄂之风》以志。东坡贬黄时期,著述成果非常丰硕,从内容来说,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于发现和培养文坛杰出新秀,即苏门四学士,也是东坡这时期坚持儒学用世的功业之一。元丰五年二月,东坡在给李昭玘的信中说:“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当然,这时期释道思想对东坡摆脱烦恼、修炼养生、随缘放旷、适应艰苦环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行文至此,顿有所悟:贬黄四年多,当是东坡一生中儒释道融会贯通、身心力行、成效最显著的时期。儒家入世,佛家出世,道家遁世,三者基本精神原为相斥,而东坡此时能将儒家推己及人的思想,与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道家注重养生的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释道相融,兼采并用,一般说有两个缘由,一是主观上的迫切需要,二是客观上具有一定条件。黄州是东坡最早的流放地,他由高官成为流放罪人,主观上急需寻找精神武器,以调整心态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而客观上,黄州有几处佛院和道观,有利于结交僧道;这里交通、邮路比惠州、儋州方便,故友新交,来信、来访日渐增多,交游广泛,与地方官吏、士大夫、僧道、名医、药师、樵民、渔翁等各种地位、志趣不同的人士百余人交往、切磋;无案牍劳形,著书立说以期有补于世和修炼、养生的时间比较充裕;贬黄四年零两个月,流放时间比在惠州、儋州都长。以上种种,应是东坡儒释道相融的有利条件,也是他能在黄州创建功业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突出特点,而儒释道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东坡贬黄时期融汇儒释道精华为己所用、形成自己鲜明特征的成功实践,我们不难窥见中华优秀文化对于人们战胜困难,发奋图强,适应与改造环境以至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的伟大作用。

三、千年诗文,珍藏并流传了大量鲜活的环境信息

人的生存离不开环境。环境有大小之分,如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地理环境是大环境,而个人或家庭居所、工作单位,则是小环境。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东坡贬黄四年多,留下了大量的各种文体的作品。据饶学刚统计,东坡一生写了约 6000 篇(首)文章(诗词),文艺作品约占总篇目的 5/6。而在黄州时期的创作,诗占总数(约 2900 多首)的 1/13,词占总数(约 400 多首)的 1/4,文占总数(约 2500 多篇)的 1/3。东坡一生的大量作品中,蕴含着极其丰富、难以计数的环境信息。这类信息反映了近千年前他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真实情况,是弥足珍贵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东坡的“两赋一词”、《初到黄州》等名篇佳作,黄州赤壁与长江等这些大环境在那个时代的动人景观,谁能说得那么清楚?而黄州赤壁连同杭州西湖、九江庐山、镇江金山、阳羡洞穴、岭南荔枝、湖口石钟山,以及眉山远景楼、密州超然台、徐州放鹤亭、惠州六如亭(即朝云亭)、儋州载酒亭、常州舣舟亭等等,如果没有东坡的审美观照,留下诗文名篇,这些山川、名胜、特产、奇景也不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和人文内涵而驰名中外,吸引一批又一批、世代不绝的国内外游人。

当然,文艺作品不同于摄影,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东坡的许多名篇佳作,在描绘自然景物或社会生活时,往往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或思维意象(有的二者兼有),但毕竟大都源于当时大自然或社会的现实生活,其中保存着大量近千年前包括环境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东坡黄州诗文中的环境信息,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引导热爱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东坡赞美大自然生态美的佳作、名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们读后顿觉心旷神怡,会油然而引起共鸣,激发起热爱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纯真情感。这方面的佳作、名句,不胜枚举。除前述“两赋一词”等名篇中所引“大江东去”、“惊涛拍岸”、“江山如画”等外,如《满庭芳》(归去来兮):“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

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注）平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元丰四年二月，东坡《答秦太虚》云：“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柑桔棓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同年五月，东坡作《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绝壁寒溪吼”，“离离见吴宫”，“空传孙郎石”。此行到樊口，喜食鳊鱼，赞其味美，欣作《鳊鱼》。同年十一月，东坡作《四时词》，展现四时美丽风光。元丰五年三月，东坡前往蕲水县访友，途中在桥柱上题下《西江月》一首：“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东坡借助宁静和悦的生态美景，充分表达了自己物我两忘、超凡脱俗、空灵淡泊的心境。元丰五年六月，东坡与友人往游武昌樊山。“步出西门，浮寒溪，迤迤步上。凡两寺，在山中，景致幽远。下寺有观音泉，澄澈可爱。”（《与范子丰书》）元丰六年六月，东坡作《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描绘了初夏雨后乡间的怡人景色。此时古耕道修葺嘉观，东坡作《书赠古氏》：“古氏南陂修竹数千竿，大者皆七寸围，盛夏不见日，蝉鸣鸟呼，有山谷气象。”元丰七年四月，东坡过程氏山居观瀑，盛赞绝妙壮观的瀑布流泉：“出两山间，落于堂后。如布悬，如风中雪，如群鹤舞。”

以上选录了东坡黄州部分作品或其引句。这里大都未涉及原作的主旨与寓意，从中可以窥见：近千年前，这一带山明水秀，清溪无底，花木繁茂，禽鸟欢唱，泉水澄澈，巨瀑奔泻，鱼虾味美，果蔬新鲜，污染江河、乱伐林木、滥杀动物的行为少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是多么好啊！

（二）赞美野生动物聚居地区“鸣鸟百族”的景象

元丰三年五月，东坡住定惠院时作《五禽言五首》。他在诗叙中说：“梅圣俞尝作《四禽言》。余谪黄州，寓居定惠院。绕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苇。

春夏之交，鸣鸟百族，土人多以其声之似者名之，遂用圣俞体作《五禽言》。”东坡贬黄初期，住进破陋、冷落的寺院，不免感到郁闷，但周围的自然环境生机盎然，春光明媚，百鸟和鸣，令人欣慰，并触发灵感，写下名篇《五禽言五首》。此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于大自然的崇尚、热爱，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对于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并显示了不拘陈规、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这五种野禽“土人多以其声之似者名之”。其名为：“蕲州鬼”、“脱却破裤”、“麦饭熟”即“快活”、“蚕丝一百箔”、“姑恶”。五种鸟，共写五首，每一种鸟写一首。第二首东坡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裤。”由此可知“脱却破裤”即布谷鸟，这首诗云：“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裤。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布谷叫声清脆嘹亮，非常动听，当地农民依声称它为“脱却破裤”，既风趣，又辛酸，而东坡这首诗写得十分生动有趣，最后一句“水中照见催租瘢”，抒发了诗人一贯的忧民怜民之情。布谷鸟在江苏也常见，常州一带人们仿其鸣声谓之“阿哥归家（“家”的常州方言音“瓜”），快刀割麦。”其余四首，东坡未注明鸟的本名，这些鸟（除布谷外）现在是否存在？笔者非本地人，说不清楚。读了《五禽言五首》，耳边仿佛听到坡公的忠告：这里的生态环境多好，“鸣鸟百族”，你们要重视保护呵！

（三）注意改善居所环境

东坡贬黄躬耕期间，为便于著述和接待友人，曾于东坡荒地筑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间，无空隙也。”（《与钱世雄书》）为了因陋就简改善环境，方便生活，东坡在堂前植柳，浚井（西有微泉）；堂下种大冶长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丛桔，“不令寸地闲”；四周种松柏、枣栗、桑榆；还于堂侧手植梅一株，大红千叶，一花三实。环境美化，曾得四邻农户相助，东坡十分感激。元丰五年二月，雪堂落成，东坡喜雨，作《雪堂记》、《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和《陈季常见过三首》等诗词以庆：“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东坡有奇事，已种十亩麦”。

由于居处环境改善，有接待场所，友人也乐于来访。元丰五年三月，鄱阳董毅夫游雪堂，有卜邻思归意。东坡作《哨遍》（为米折腰），将陶渊明《归去来辞》的词句重新组合，并令家僮扣牛角而歌，

乐趣横生。是年三月三日，东坡作《书渊明〈乞食诗〉后》，提出著名的“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的士大夫人生周期率。不久，画家米芾来访，于东坡雪堂，同观吴道子画释迦佛。米问画竹法，东坡使贴观音纸于壁上，即起作竹两枝，补以枯树怪石相赠。是年四月，杨绘来访，谈及东坡旧日赠词：天涯同是伤流落；且感六客同集湖州，作和诗答杨绘。同月徐君猷来雪堂，同去民家饮酒食肉，东坡作《煮猪头颂》和《二红饭》。

元丰五年六月，东坡作《跋钱君倚书遗教经》，提出了“书如其人”的著名观点。他说：“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紊乱、混杂）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仪人也。”寄常州好友、公辅子钱世雄。七月十六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东坡与道人杨世昌泛舟赤壁湖，回雪堂，作《赤壁赋》。是年八月，游赤壁矶，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年十月十五日，与道人杨世昌携酒与鱼，出雪堂，到临皋，再游赤壁，作《后赤壁赋》，并帖赠杨世昌。是年十一月，书雪堂四戒。元丰六年十月，作《记承天寺夜游》。

以上是东坡雪堂筑成后部分活动的简况。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东坡雪堂这样低标准的环境条件以便会友、写作，东坡黄州时期的多次艺苑雅集、文坛佳话和许多名篇佳作，也许不会这么顺利产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科学合理地改善居所环境的重要和必要。

（四）呼吁重视绿化环境

东坡贬黄期间，曾留墨五祖寺。五祖寺坐落于黄梅县东山之上，与九江仅一水之隔。五祖寺弘忍大师，系黄梅县人，曾为破额山（四祖寺所在之山）栽植松道，东坡非常敬仰，游后留下遗墨“流响”二字，予以表彰。后人刻于石山上，影响深远，迄今苏风犹存。

元丰三年一月二十日，东坡赴黄州贬所途中，度关山，过位于麻城县界的万松亭，见万松多凋谢，感赋《万松亭》与《戏作种松》诗。《万松亭》诗叙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东坡有感于“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而撰此诗。诗的前四句说：“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诗的首句，东坡自注：“古语云：

‘一年之计，树之以谷；十年之计，树之以木；百年之计，来之以德’。”这充分反映了东坡竭力倡导植树与呼吁保护环境绿化的拳拳之心。

东坡不仅重视绿化环境，而且着意美化环境。为了欣赏奇石，点缀、美化室内环境，东坡悉心收集沙滩上的小石头，或因形状，或由色泽。黄州收获颇丰，共计 298 枚“细石”。他还琢磨两处私家园林，不厌其烦地给人家提意见。③武昌西山半山腰古木参天，羊肠九曲小道旁，有一废亭曰九曲亭，传说始建于东吴，东坡曾多次游览，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后废亭被雷雨暴风拔去。东坡惜亭弃失，为美化环境，特与西山寺僧与社会同仁商议，重建九曲亭。元丰五年五月，东坡兴致勃勃，与弟子由同游新九曲亭，并嘱子由撰《武昌九曲亭记》，自己作跋。从此，武昌西山又增添了一处人文名胜，千古流芳。

大自然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的家园。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已成共识。林语堂说，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我想，东坡公如果生活在今天，中国作家协会定会送他一顶“环保诗人”的桂冠。如果有关方面聘请他当环保顾问，亦会颌首同意的吧！

论文注释：

①此论文收入饶学刚著《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臧克家赏析《前赤壁赋》，引自《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此处泛喻“二赋一词”。

③刘小川著《眉山苏轼》第 15 章第 110 页，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2007 年 10 月。

参考书目：

饶学刚《苏东坡在黄州》，京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孙开中）

清丽舒徐 出人意表

——论苏轼婉约词的创新

陈立华

内容提要：苏轼的婉约词在继承传统婉约词的基础上，有相当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拓展了婉约词的题材和采用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本文试从这两方面论述之。

关键词：婉约词 创新 题材 艺术表现手法

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打破了婉约词一统宋朝词坛的局面，是宋词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变革。然而，据《东坡乐府》辑录，在现存的340余首词中，豪放词还不及其全部词作的1/10，较多数的词仍属明丽、雅致的婉约词或接近婉约词。苏轼的婉约词对传统的婉约词既有继承又有所创新，无论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亦可谓“向上一路”、“自成一家”。

一、传统婉约词之特点

词是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唐代，民间的词大多反映爱情相思的题材，被传统文人视为诗余小道，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辑录的《花间集》奠定了婉约词的基本风格，被宋人尊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所谓婉约，乃婉转含蓄之意。婉即和顺柔美，约即委曲、隐微、含蓄和风格的柔美清丽。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可见，晚唐五代的词人那些华美婉约的清词丽句，都是用来在花前月下，酒席宴上，供乐妓演唱，以飨达官贵人、文人学士，故多男女相思、倚红偎翠、闺中幽怨、伤离惜别的艳情之作，因而缺乏高雅的格调。宋代词坛承袭晚唐五代“花间派”词风，习惯上将词视为“艳科”、“小道”，甚至

将其发展到歌筵舞席上娱宾遣兴的工具这种狭窄的道路上去，连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也未能跳出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的格套，吟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①之类的华艳闺情。北宋初期的词家，就是用这种艳词伤春悲秋，哀叹时光之易逝；恨别愁离，慨叹最难相聚易别离；惜花赏月，抒写男女相思怨慕之情，尽呈“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②。

二、苏轼婉约词拓展了词的题材领域

苏轼婉约词的问世，打破了传统婉约词在题材领域仅限于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的格套，摆脱了词为艳科的羁绊，拓宽了婉约词的题材范围，诸如咏物言情，写景记游，怀古感旧，酬赠留别，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

将大量咏物题材引入婉约词。在以前，言情词的格调较低，有不少寄情声色的作品，咏物词较为稀少。苏轼成功地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创作了一些高水平的咏物词。在苏轼的笔下，有“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的梅花；凌霜傲雪，催人奋发的青松；令人赏心悦目，梦回酒醒的白芙蓉；“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的荔枝；“斗赢一水，功敌千盅，觉凉生两腋清风”的清茶，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③，风格呈空灵隽永、质朴简淡的风姿，或具明快疏宕、秀丽妩媚的神韵。通过咏物，含蓄地将自己的品格、理想和情趣融入了松、梅等物的精神之中，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咏物极境。例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此词作于被贬黄州之际。此刻经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其苦闷、抑郁、悲愤之情可

想而知。词中残缺的月牙，枝叶稀疏的桐树，寂寞的旅人，孤单的鸿雁，沉寂的沙滩等一组令人感伤的事物构成了一种孤寂清冷的意境。词人借助这种意境表达了自己仕途失意、世事无常、饱受恐惧煎熬的悲凉之感。然而，在这极度冷清的意境中，并非消极沉沦。“捡尽寒枝不肯栖”一句，表达了在政敌的残酷打击面前，不屈不挠，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依然坚持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乡村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在婉约词中大量出现。词一贯在儿女情长、感时伤怀间徘徊。孤寂的乡村，却在苏轼的笔下，成为了词的一种特殊题材。在苏轼的农村词中渗透着对农村农民生活的关注，这就提高了词的格调和意蕴，吟咏农村的词便具有了极强的生命力。例如他在徐州任上的《浣溪沙》五首，描写农村田园风光，就写得情真意切、柔美动人。此词是为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而作。全词以清新明丽之笔，描写农村的秀丽风光，讴歌农民繁忙的劳作和雨后喜悦的心情。在苏轼笔下，有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者等勤劳、质朴的农民形象；有春末夏初，麦收在望的农村风光；还有缫丝、赛神、观使君等农村风情。《浣溪沙（其四）》尤为典型。全词如下：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词中的枣花、缫车、黄瓜等农村特有的景物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尤其是最末句“敲门试问野人家”，将路人的“敲门”与野人家的孤寂形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幽境。乡村生活的恬淡闲适在词人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整首词一如风物画那样令人神往，也如抒情乐曲般沁人心脾。词中含蓄、蕴藉之处，颇能诱发读者的遐思与想象。乡村词的引入，大大地拓展了婉约词的题材范围，是婉约词走出“艳科”藩篱的有力证明。

悼亡之类的题材一般为诗所独有，是诗的题材之一，苏轼将悼亡题材引入婉约词。苏轼的悼亡词，情真意切，于凄清中而不悲伤，于落寞中而不寂寞。最为著名的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全词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然相见应不识，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为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由杭州调任密州时而作。熙宁变法年间，苏轼针对变法中的弊端，直言进谏，为力主推行变法的王安石所不容。王安石、谢景温制造“贩卖私盐、苏木案”以诬陷、排挤和打击苏轼。苏轼被迫自请“外放”。先是调任杭州通判，后知密州，远离了权力中枢。此刻的苏轼仕途坎坷、政治抱负难以施展，苦闷郁结于心。在此心境下，苏轼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倘若王弗仍在人世的话，她会在此刻体贴入微地安慰自己，可是两人已是阴阳两隔，只能梦中相见。因而全词充满着苏轼对亡妻的深厚怀念之情，显得凄婉动人，情真意切。这种久积于胸的哀愤之情，通过梦境潮水般宣泄出来。比之潘岳、元稹之诗，感情更为真挚，忧愤尤为深广，遂成千古绝唱。这首词之所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它带有浓重的“怀人”成分。亲人的死亡对生者来说是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和摧残，因为死者不能复生，绝了生者与之再见之望。但苏轼却执着地不肯绝此再见之望，亡妻在他心里依然是十年前正在小轩窗前化妆的娇妻。他是以“怀人”的心思来写悼亡的，总企盼有一天能与妻子相聚，向她诉说这几年的凄凉。但死者不能复生，相聚已成绝望，满怀凄凉更无处诉说。这样，期望与无望，希冀与失望构成了尖锐的矛盾，把词人推向了无可自拔的痛苦深渊。他在这尖锐而不能缓解的矛盾中煎熬，伤痛沉积心中，日积月累，长达十年之久，一旦发而为词，情感的抒发自然深挚、凄恻、哀婉、缠绵。可见，苏轼以悼亡为词，同样可以表达出生者对于死者的哀悼和怀念之情，是苏轼婉约词在题材上的又一创新之处。

不仅如此，苏轼的言情词还把传统的男女之情扩大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而且常于其中饱含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寄子由》。唱和酬答，互通友情之作，在诗来说，并不罕见，但在苏轼以前的词坛，却几呈空白状态，苏轼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的友情词，一般来说，具有语新意浓，一扫陈词浮调的特点，如《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尤应称道的是，他在赠别词中还以政事国事相勉，如“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

④，这实际上已开南宋爱国词人以词唱和、相互激励的先河。

三、苏轼婉约词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苏轼婉约词不仅大大拓展了其题材领域，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不拘传统，表现出相当的创新性。传统的婉约词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可歌性”。《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一曲新词酒一杯”，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这类“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往往使闻者销魂。婉约词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唐五代词早具有这一特点。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这种严格按照音律作的词，不能充分表现词人的真情实感。而苏轼作词，往往情感突发，一如泉水喷涌而出，往往突破了音律的束缚。正如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词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不受词律的限制，形式服从于内容。苏轼的婉约词亦不例外，往往给人一种情真意切、自然通畅之感。在句法、平仄、韵律诸方面都有所革新，而不拘于词律的规定。例如，词韵一般要比律诗韵宽些，但上声字与去声字通常不能互押。苏轼为了反映特定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增加词的表现力，常把口语乃至俚语引入婉约词中，这就出现了上声、去声互押的现象。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就将上声字“小”、“绕”、“少”、“草”、“道”、“恼”等与去声字“笑”互押了。苏轼的《归朝欢·和苏坚伯固》与柳永词同属一体，但平仄却有微异处，也是为了音律之清浊与内容相合。再如，词的断句，在词律中也有明确规定。但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最后三句的点断就与词律不合。章质夫原词最后三句的断句是合词律的：“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若按此点断，苏词应断为：“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显然不合苏词之意。于是，苏轼就打破词律，点断成：“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⑤这样一改，不仅词意畅达，语气

明快有力，而且词人不忍惜别、怜爱之情也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苏轼婉约词的格调要高于传统婉约词。传统婉约词一度沉迷在花前月下，儿女情长之中，在表达男女之情时喜用香艳浓抹的语句，而苏轼却往往用白描的手法，表达热烈、真挚、纯洁的爱情。同时他也善于用典比附，长于借喻夸张；他经常化用前贤诗词佳句，也能将口语、谚语入词，雅俗共赏。他有刻意的铺陈、迂曲的抒情，也有质朴的白描、清新的造型。例如《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全词用白描手法，语言平易而警句叠出，平铺直叙而真情感人，即有传统婉约的柔情似水，但意境瑰丽，朴实无华，令人耳目一新。此词作于绍圣二年（1095）春末夏初，当时苏轼在“元祐党争”中失利，贬居惠州，因而全词呈现出一种由伤春到伤情的失漠之感。

上片伤春。百花纷谢，残红零落，青杏初结，柳绵又少，燕子低飞，绿水环绕，只剩下无所不在的满目芳草。皆为春去夏来的景象。尤其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渗透着春天已逝的悲凉，但春虽已远去，芳草却仍然能够寻觅，既伤春又自我安慰的惜春的情感表现得十分细腻、真挚。因而，此句成为了历来人们争相传颂的伤春、惜春、怀春的佳句。

下片伤情。墙里佳人，墙外行人，一墙之隔，各有所思。佳人荡秋千，喜气洋洋，笑逐颜开。行人正赶路，忽闻笑声，扰动情思。佳人浑然不觉，笑声渐止，渐渐离去。行人恋恋不舍，枉自多情，更添惆怅。词人善于捕捉颇具喜剧色彩的生活小片段而描述得声趣盎然。佳人无情，行人多情，单思之情跃然其间。此属伤情。“多情却被无情恼”亦极有理趣，金人元好问袭用全句，补以“今夜还如昨夜长”的对偶，收入《鹧鸪天》词中，可见苏词影响之深远。

元朝伊士珍《瑯嬛记》卷中引《林下词谈》评述云：

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杯，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大笑曰：“是吾正悲秋，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卒，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

（下转 54 页）

论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与超越

——兼论苏轼贬寓黄州后人生思想的重大转变

王启鹏

内容提要：苏轼自幼“奋厉有当世志”，尚未踏上仕途之前，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踏上仕途后，努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并对王安石变法提出批评，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歌。结果被投进了监狱，结案后被贬谪到黄州。在黄州，苏轼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陶渊明，东坡敬仰其真诚的为人和平淡自然的诗风，但苏东坡不仅为人真诚，而且为百姓做了大量好事；写出了大量平淡自然的诗歌，并在理论上进行阐释。对白居易，东坡敬仰其为民请命的精神和晚年的“中隐”思想，但东坡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把“兼济”与“独善”统一起来，这是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和超越。

关键词：苏东坡 陶渊明 白居易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继承 超越

据宋史记载，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立志要做一个“范滂”式的人物，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在他还没有踏入仕途之前，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当时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①并劝神宗皇帝进行改革：“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②苏轼在《思治论》中还特别指出：“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的“无财、无兵、无吏”这三大困境。^③所以，苏轼在他入仕之前，就写了《进论》、《策论》共50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思想，并把它们上交给朝廷，这就充分展示了苏轼年轻时的伟大抱负。

苏轼踏入仕途的第一站便是以大理评事的官职差遣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是知府的助理官。在短短的三年任上，苏轼为老百姓做了三件好事：改革“衙前役”；准许百姓经营茶、盐、酒等；免除积欠，并释放了225名因积欠而关进监狱的“囚犯”。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称他为“苏贤良”。

凤翔任职期满后返回京城，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妻子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去世，只得扶灵归蜀，在川居丧。免丧还朝后，正值朝廷大肆推行王安石变法。由于苏轼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十分了解，便对变法的弊端提出了批评。但都不为神宗皇帝接受，反而引起了王安石的愤怒。“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④

在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怎么办呢？“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墓志铭》）^⑤“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墓志铭》）^⑥苏轼是否真的想利用诗歌来反映民间的疾苦，希望给皇帝知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在《乞郡札子》中就明确地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⑦所以，《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讽刺诗歌就是写于这段时间的。

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主要为民做了两件实事：一是组织民众灭蝗；二是组织民众治理六井。熙宁七年，改知密州，苏轼又带领百姓灭蝗，求雨救灾，适当减轻老百姓赋税，收养弃儿，

等。熙宁十年改知徐州，最为突出的就是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徐州军民抗洪，保全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苏轼就是这样一位忠于职守，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敢于抗争的好官。可是，王安石等人便指使御史李定等人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把苏轼投进了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乌台诗案”。结案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贬寓黄州后的苏轼，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给朋友李端叔的信中总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痛切地认识到“才华外露”是做人的一大毛病。他说：“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⑧但是，他的这个“今我”并不是对“故我”的所作所为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对自我、人生、现实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正如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确立了“超然于物外”的思想一样，并没有影响他积极“入世”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他在给好友李公择的信中说到：“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⑨还说：“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与千之侄二首》）^⑩可见他这个“今我”还是以“独立不惧”和“直道而行”为主要特征的。

可以说，自从苏轼贬寓黄州之后，在人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政治上除了保持固有的“刚”性外，还多了一些“柔”性。具体来说，苏轼在贬寓黄州以后，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用于调节自己思想和行为。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学习陶渊明和白居易的为人，把传统的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统一起来，不管自己是“达”还是“穷”，都能够做到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从而形成了鲜明的东坡性格，达到了对我国历代士大夫传统思想的超越。

苏轼在贬寓黄州期间，是否真正羡慕陶渊明和白居易？是否真正学习陶渊明和白居易？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只要我们从他在东坡开垦荒地耕种的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苏轼贬寓黄州后取号为“东坡”，并不仅仅是

因为他在东坡那块地上耕种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前代诗人白居易的敬仰。他对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十分赞同，在通判杭州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⑪所以，他就取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写的《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为依据，取号为“东坡居士”。所谓“居士”者，原是对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的称呼。这里是指追求清高，对世事淡泊的人。这亦反映出苏轼思想上的转变。

陶渊明，他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躬耕于南山下。而苏轼躬耕于东坡，正好与陶渊明的情景吻合。所以，苏轼常将东坡比作陶渊明的斜川，在《江城子》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⑫还写信给王巩说：“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麀糟陂里陶靖节，如何？”^⑬言下之意是说自己还是一个不合格的“陶渊明”。尔后，他还把陶渊明那著名的《归去来辞》赋进行改写，“稍加隐括，使就声律”，写成《哨遍》一词，说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并使家僮在田间地头“歌之”。可见苏轼贬寓黄州后开始羡慕和学习陶渊明、白居易。事实上，苏东坡不仅继承了陶、白的思想，而且还超越了他们的思想，从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

对于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继承和超越的文化现象，宋人王直方在其《诗话》中把苏轼《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诗中“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⑭改为“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在这两句诗中，显然有5个字是不同的。但，绝对不是误笔，而是代表了后人对苏东坡与陶渊明、白居易比较研究的基本看法，是有深刻含义的。

先从苏诗本身说起。“渊明形神自我”，这个“形神”，既有指其形体和神态之义外，应该更侧重于渊明的精神来说的。因为陶渊明曾经写有由《形赠影》、《影答形》、《神释》组成的《形影神》诗，并在诗序中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⑮三诗写超脱物累，委运纵

浪，不喜不惧之意。而“乐天身心相物”，这个“身心相物”亦是有来历的。白乐天亦写有《自戏三绝句》：《心问身》、《身报心》、《心重答身》。他在诗序中说：“闲卧独吟，无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戏，往复偶成三章。”^④白诗写疏仕远君之自由闲适之感。归纳起来理解，“形神自我”，则是指陶渊明超脱了外物的牵累，达到了在生命、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而“身心相物”，则是指人格独立后的闲适与快乐。这是苏东坡对陶渊明和白居易两人在人格上的认识和赞同。

王直方却把苏诗改为：“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这又成了另一个意思了，成为后人对苏东坡的评价了。意思是说：苏东坡在形体和人格上似陶，而在思想上则似白。这一提法是有深意的，值得研究。

一、苏东坡对陶渊明的仰慕

陶渊明，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一说名潜，字渊明。晋宋之际的大诗人。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孙，但到陶渊明时家道已衰落。他少年时在家闲居。29岁时，家贫，入仕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不久就自动解职回乡。此后又曾先后做过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但时间都不长。41岁时，为彭泽令，但仅做了80余日，即辞归。从此隐居躬耕20余年，不再出仕。

陶渊明隐居不仕、洁身自好的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陶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写了一篇《陶征士诔》，对他的品行操守作了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美。沈约撰《宋书》，将陶渊明收入《隐逸传》，说他“少有高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昭明太子萧统，他在《陶渊明传》中说陶“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在《陶渊明集序》中说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⑤对陶渊明的思想品格作了高度的认同。

苏轼对于陶渊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在贬谪黄州期间，便对陶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甚至说出了“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的话。贬谪岭南后，又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还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携手葛

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

究竟是陶渊明的什么品德令苏东坡如此敬仰呢？苏东坡在贬谪海南时托付他弟弟苏辙为他编辑出版《和陶诗集》的信中就说得十分清楚：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⑥

在这段话中，苏东坡就明确地说出，他赞美陶渊明的诗歌和为人。需要补充的是，对于渊明之为人，除了“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之外，陶渊明思想上的“真淳”亦使东坡非常感动。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⑦由此可见，苏东坡是敬仰陶渊明为人的刚直与真淳，敬仰陶诗的“质而实绮”的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

二、苏东坡对陶渊明的继承和超越

苏东坡是一个很重感情，见贤思齐的人。他说得出，做得到。他晚年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他确实是这样做的。现就从他对陶渊明称赞的两个方面来谈他对陶的继承和超越。

先说他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继承和超越。苏东坡认为，陶诗的艺术特点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或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意思是说，陶诗从表面看来，很质朴，好像没有什么内容和艺术技巧。其实，在平淡自然的文字里面，却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他曾经说过：“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⑧还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⑨足以证明苏东坡对陶诗是很赞赏的。

说苏东坡对陶诗的继承，就是说苏诗继承了陶

诗平淡自然的风格。黄庭坚诗云：“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②说东坡对陶诗的超越，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陶渊明只是写出了平淡自然的诗作，但未能够从理论上加以阐释。而苏东坡除了写出了平淡自然的诗歌外，还从理论上加以阐发，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活动。他不仅指出了平淡自然的本质是“外枯而中膏”，而且还提出了要用“常言”，甚至是用艺术化了的“街谈市语”来写，做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这样才能写出平淡自然的诗歌来。如他在《发广州》诗中写的“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轼就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诗中的“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其中“牛粪”、“懒残残”，都属于方言俗语。

再说苏东坡对陶渊明在为人上的继承和超越。东坡对渊明最为欣赏的就是“真”。这种“真情”，就是庄子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衰；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庄子·渔夫》）^③所以，“真”，就是人的“天性”的自然表露。苏东坡继承了陶渊明“真淳”的性格，他在抄录陶渊明的《饮酒》诗之九时有感地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④他在《思堂记》和《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都说过类似的话，恕不多举。

东坡不仅为人真情、正直，而且把这种“任真”的性格用于处理政务上，这是东坡对渊明在为人上的超越。面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社会现实，东坡主张改革，劝说神宗皇帝要有作为，要进行改革。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改革中的激进做法以及变法措施中的某些偏差。对于变法中的弊端，东坡敢于在朝廷中，在皇帝面前，在广大朝廷重臣面前进行争论。他说：“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忧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⑤但，神宗皇帝没有接受他的批评和建议。东坡就不得不用诗歌的形式来反映变法的弊端，以至遭受到政敌的攻击，先后被贬谪到黄州、惠州和儋州。

苏东坡在政治上的原则性是很强的，有不同的看法，他就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不管是对自己有多大的危害。而对于他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不管是亲友，还是政敌，他都能够真诚地对待，绝对不会耍滑头。最为明显的就是对待章惇，东坡再贬惠州和海南，均是他一手策划的，结果把东坡弄到家破人亡，可谓是血海深仇。可是，当苏东坡在海南遇赦北归到江苏时，舆论说东坡有可能重返朝廷。这时，章惇的儿子章援怕东坡报复，于是就以师生的名义写信给东坡，并说他的父亲被贬谪到雷州，现正在路上。东坡这时重病在身，当他一清醒过来之后，就马上回信给章援，劝他不要担心，并告诉他御瘴的药物和方法。这种“眼前所见无一个不是好人”的佛家以“慈悲为怀”和“普渡众生”的思想，显然是对陶渊明“真诚”人格的超越。

再说，陶渊明和苏东坡都可以说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物。陶渊明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弃官隐居去了，而苏东坡却不是这样。东坡不回避社会，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遭受贬谪，都能一如既往地老百姓办些好事和实事。这也是苏东坡在思想和人格上对陶渊明的超越。

三、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景仰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⑥短短的一句话，就向我们提供了2个重要的信息。但，为什么宋代士大夫会多慕乐天？苏轼为什么又会特别仰慕乐天？对这2个问题要作些具体的分析。

宋代，在政治文明方面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开明的时代。统治者为了鼓励士人议政，还特别在制科考试中增加了“策论”一科，用来考察举子们的议政能力。这样，宋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比较关心政治。“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的写照。可是，封建皇权是不能随便得罪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皇权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触犯了皇权的利益，做臣子的就会遭到贬谪。正如王夫之在《宋论》卷二中说的那样：宋最高统治者以防“大臣之持权……行不测之威福”，而使士人“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

已离矣”，致使他们“浮沉于一日之荣宠”，即使“欲有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⑤因此，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要建立不朽之功勋，是不太现实的了。再说，宋代又是一个讲究物质享受的社会。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夺取了后周的政权之后，担心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老将也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的政权夺去，于是便在酒席上劝老将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不要再弄什么刀枪了。这样，就轻易地把他们的兵权夺去。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典故。在统治方法上，除了实行文人执政外，还对官吏实行优俸政策，鼓励官员尽情享受。所以，在位的官员普遍待遇很高，还可以享受到声色之欢。而一旦遭受贬谪，就失去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就十分潦倒了。所以，白居易提出的“中隐”思想最适合宋朝官员的实际。因为“中隐”最实惠：“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白居易《中隐》）宋人对白居易的这种高明的处世艺术十分赞赏。如苏辙就说过：

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之二）^⑥

仁宗朝大臣孙可久，刚过50岁就请求“致仕”（退休），并按照白居易晚年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美自适。”而历相仁、英、神三朝的名臣韩琦，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建了一座“醉白堂”。“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于乐天而不及者。”^⑦孙奭以太子少傅致仕，亦自比于曾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白居易。由此可见，宋代士大夫多慕乐天，是企图找到既能解决依附皇权，又能够保持独立人格这一矛盾的有效药方，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为什么又说“东坡尤甚”呢？这原因大致是：

其一，苏轼“出处依稀似乐天”。苏轼曾在诗中4次说到自己似乐天。“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迓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在《赠善相程杰》中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尝遍洛阳春。”在《次京师韵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中说：

“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在《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中更是说：“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老较前贤。”从苏白两人的经历来说，“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说法是成立的。白居易44岁贬江州，48岁任忠州刺史，49岁还朝，51岁自请外任杭州刺史，54岁除苏州刺史，55岁以眼病归洛阳，56岁复入朝至刑部侍郎。58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75岁去世。而苏轼44岁贬谪黄州，50岁起知登州，旋入朝任礼部郎中，51岁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53岁兼侍读，权知礼部贡举，54岁自请出守杭州，56岁知颍州。^⑧因此可以说，在白居易没有退休之前，苏东坡与他的出处相似。尤其是两人都在杭州任过地方官的最高长官，更感到亲切。所以，苏轼便对白居易产生了异代认同感。

其二，苏东坡仰慕白居易之为人。白居易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和父皆以明经出身。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11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经常是受冻挨饿。贫困的生活使他接近了劳动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走上现实主义道路有着重要作用。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道释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⑨可见儒家的“兼济”和“独善”思想是他的人生主导思想。

35岁前的白居易，是春风得意的。他曾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再说，当时的皇帝唐宪宗是一个“纳谏思理，渴闻谏言”的求治之君，而他被授予翰林学士、左拾遗又是唐宪宗的“非次拔擢”，所以他对宪宗感恩不尽，思以图报。况且，社会现实和个人见闻又使白居易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于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讽喻诗。在他任校书郎秩满时，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写成《策林》75篇，提出了改革的意见。在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身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如请降系囚，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来配合斗争，著名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就是在这时写的。

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的“国耻”,首先上书请求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结果被贬为江州司马。江州之贬对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初到江州之时,他还有些激情,写出了《琵琶行》和《与元九书》这些著名的篇章。可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日愈险恶,佛道思想逐渐滋长起来。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从此,他缄默了,不过问政治了。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8年“似出复似处”的“中隐”生活。但,当他见到洛阳龙门潭之南航道艰险,船夫艰难的时候,便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楫。

白居易为人正直,能够为民请命,尤其是在杭州任刺史时疏浚了西湖,还修筑了“白堤”,还敢于向朝廷提出了改革的建议。白居易还运用通俗的语言,写出了大量的讽喻诗歌,用于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这些都是令苏东坡敬佩的;晚年白居易在洛阳香山过着“中隐”的生活,终于找到了既依附于王权又保持了个性的独立的平衡点。这种高明的处世艺术,令宋代文人敬佩不已,而苏轼就更甚。

四、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

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可以从下面这2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在为民众做好事来说。白居易虽有“为民请命”的思想和行动,但主要是局限在文字上,写了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讽喻诗”,并写成了75篇《策林》向皇帝反映民众的疾苦和提出对社会改革的意见。但真正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并不多。比较著名的就是在杭州带领百姓疏浚了西湖,并修筑了一道堤坝,后人称之为“白堤”。而苏东坡在这方面却比白居易强得多。他每到一地为地方官,或是被贬谪到地方,都为当地百姓做些好事和实事。如在密州带领百姓捕灭蝗虫;在徐州带领百姓抗洪卫城恢复生产;在杭州疏浚西湖和修筑堤坝(后人称之为苏堤)。在贬谪地惠州捐犀带修桥,推广先进农具——秧马;在海南传播文化教育,等。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

象:凡是苏东坡到过的地方,后人都建有永久性的建筑物来纪念他,都津津乐道他敢于“为民请命”的东坡精神。这是苏东坡对白居易的超越。

其二,在思想上来说。两人都有浓厚的儒道释三家思想,都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思想。但两人对三家思想的吸取和运用大不相同。白居易是典型的唐代知识分子,完全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行事,走两个极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顺畅时,就尽力为朝廷和百姓做事;遇到挫折了,就想办法保存自己。尤其是晚年,他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的时候,过着“似出复似处”的“多蓄声妓,娱乐亲友”的优游自得的生活,已经是百事不关心了。这是他“中隐”思想的典型表现。而苏东坡却不是这样,不管他是“达”,还是“穷”,他都能够把“兼济”和“独善”很好地统一起来,做到既能为百姓做好事,又能够在为百姓做好事中纯洁和提升自己的思想。如上面所提到的,不管他是在地方为官,还是被贬谪到地方,都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而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观念却始终如一,不会因自己的地位改变而改变。在朝廷为官,甚至是为高官时,敢于在朝廷中争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为民请命。遭受贬谪后,照样为百姓做好事,照样写诗作文抨击时政,如晚年在惠州写的《荔支叹》。苏东坡的这些表现,是白居易无法相比的。这亦是东坡对白居易在思想上的超越。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人格上确实与陶渊明很相似,而在思想上则与白居易相似。所以,《王直方诗话》中说的“渊明形神似我(东坡),乐天心相似我(东坡)”是十分恰当的,说出了苏东坡对陶渊明在人格上和对白居易在思想上的继承和超越。事实上,苏轼的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黄州之后,是他认真地反思了前30年的所为,改变了一味进取的结果。所以说,他在贬寓黄州后,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227、115、829、1432、1500、1840、1520、2514、2148、2091、2092、2111、935、344页。

(下转58页)

共享为义 适度即尊

——论北宋黄州酒业与苏东坡酒趣

周金平 童 菁

内容提要：苏东坡诗酒文章，墨香中浸透着醇厚的酒香。半数以上文必涉酒，酒趣之特、酒器之博为历代文豪之中罕见，蕴含并散发着“与众共享为义，饮酒适度即尊”的酒文化。让我们透过北宋酒政与黄州酒业概况，了解苏东坡酿酒、品酒、调酒之趣，解读苏东坡文章中的酒趣，从另一个侧面认识苏东坡的人文思想。

关键词：北宋酒政与黄州酒业 瓮生香东坡蜜酒 雪堂义尊 黄州茅柴酒

在黄州，我们对东坡文化思想精髓的研究，无论是宏观上与地方经济的契合，还是具体到物化东坡文化上，都是比较滞后的。作为东坡文化发祥地之一的黄州，对东坡文化及其思想了解的社会层面依然很窄，其受众只是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政务人员。如何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让大众感受与品味他，才是我们弘扬东坡文化推陈出新的根本。有鉴于此，笔者从东坡文章中流芳千载的墨香与酒香中，寻觅到苏东坡独特的酒文化之趣，从另一个侧面再现物化的东坡文化之神韵。

苏东坡出生乃至步入仕途的北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大抵可以十二个字来形容①：“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积弱”。宋朝按路、府、州、军设置庞杂的机构，配备的政府官职和军队士卒数量之多、耗费之巨古之罕有。为抵御辽金的进犯和满足巨大的财政支出，强征暴敛，转赋于民，国力渐弱。对烟、酒、茶及金属矿产等资源，沿用唐五代的征榷②（即专卖）制度，为缓解宋朝的财政压力起到了阶段性的作用。王安石等力推的新法中就包括维护并实施严格的酒类专卖制度的告赏法、赏格法。严酷的告赏辑私活动，无度地以追逐酒利为目的的赏格法，带来了较严重的民生问题。在苏辙后来《和子瞻蜜酒歌》中“城中禁酒如禁盗”，③欧阳修《食糟民》：“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就是当时社会

的最好写照。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新法与旧法的不同政见，形成了北宋时期特有的“党争”，也是苏轼自嘲“难以追陪新进”和奸党小人污蔑为“讥笑时政”的社会根源。

一、官监酒务——北宋时期的榷酒制度

北宋的榷酒制度大抵有三种形式④：“王城之中征其榷，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取其税，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有常榷”。即：一是京城（包括四京），对“曲”实行专卖，允许酿造、买卖。二是对人口不甚密集，产销量不大的四川、福建等地，允许民间酿造，只征收酒税。三是对上述地区以外的各路、府、州、军实行“官酤”，在榷曲的基础上实行官酿专卖。受苏轼“乌台诗案”连累的苏辙，当时被贬至“筠州监酒务”，就是在江西高安担任这一角色。

根据《宋史》⑤、《宋会要辑稿》⑥、赵珣《熙宁酒课》⑦、《文献通考》⑧等史料记载，严格酒类专卖制度下的酒课收益，支撑起宋朝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庆历年间的酒课收入高达1700万贯，占货币总收入的比例高达38.9%。至熙宁年间，为满足酒课的征榷，宋朝廷在各地设官监酒务。以熙宁十年（1077）为例：全国共设监酒务1861处，实现酒课收益1310万贯。当时的黄州属淮南西路，旧时在府城及久长镇（旧街）、团风镇、阳罗镇、麻城镇、岐亭镇、故县镇、黄陂县共设酒务8处，熙宁十年前收酒课为32881贯。自熙宁十年起，黄州治以上8处酒务，确立祖额（即下达酒课任务）为41000贯。与黄州一江之隔的鄂州，当时属荆湖北路，同设8处监酒务，酒课收入与确立祖额均为黄州的一倍。笔者尚无法考证：41000贯酒课任务，在黄州持续了多少年。北宋的榷酒制度，从景德、庆历、熙宁到元祐、宣和、绍兴、靖康的123年间，酒课收入占年度货币收入的20%以上，其中庆历、绍兴年间超过了30%的比例。

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担任黄州监酒务的是另

一位贬官，曾任著作佐郎的荆南人乐京，人称乐著作。

二、酒酿并存——北宋时期的黄州酒业概况

酒的起源有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李时珍关于酒起源于元代之说被后来的唐、宋说所替代。根据七十年代的考古发现和史料的研究记载，笔者赞成酒的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观点。这里的“酒”指蒸馏白酒，“酿”指酒酿，也称酒醅、春酒、浊酒。多指滤去醪糟的乳白色酒液，属未完全成熟的半成品黄酒。

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到黄州的苏东坡，寄住安国寺，研读易经和楚辞^⑨，“寂莫闭窗《易》粗通”，“夜就寒光读《楚辞》。”曾任著作佐郎而时任黄州监酒务的乐京，送酒给苏东坡，《次韵乐著作送酒》中：“万斛羁愁都似雪，一壶春酒若为汤。”在这里，苏东坡不明言身为监酒务的乐京送酒给他，而是说将冬酝春熟的一壶酒煮沸如汤，恰如浇在似雪所羁万斛之愁上。

元丰三年（1080）三月，刚到黄州的苏东坡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中写道：“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不仅记叙了苏东坡独吟自和的孤寂，多难畏事的心态，而且以“浮浮大甑……溜溜小槽”的纪实手法，记录了北宋时期作为蒸馏酒即白酒业和村酒（即私酒）在黄州的存在。苏东坡《十拍子》中“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说明黄州白酒开酿及制曲在重阳时节。苏东坡被重新启用后，以翰林学士知制造的身份，在与驸马都尉王晋卿的交往中回忆道：“予昔在黄州，邻近四五郡皆送酒。”这些都是北宋时期黄州及其周边地区酿酒的印证。

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苏东坡第4次往岐亭访友陈季常，在《岐亭五首》之四中，记录了他在黄州的3年中，几次想饮一种叫“压茅柴”的酒而未能遂愿的憾事：“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几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西邻推瓮盎，醉倒猪与鸭。君家大如掌，破屋无遮罟。何从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应好事人，千石供李白。为君三日醉，蓬发不暇帻。夜深欲逾垣，卧想春瓮泣。”有学者称之为“黄州压茅柴”，还有人认为亦即茅台酒。经考证，北宋时期的黄州城内，确有一种著名的白酒叫“压茅柴”，亦或“茅香酒”。这里的“茅柴”实为一种茅香草，简称“香茅”。以镇江茅山香草为佳，亦称茅山香草，又叫柠檬香草。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茅香草有青、白二种之分，无毒、性温、入药。吴津《观林诗话》：“东坡几

思压茅柴，禁网日夜急，盖世号市沽为茅柴，以其易著易过。”由此可见，黄州茅香酒，当时的市场认可度较高，“盖市号市沽”为茅柴。因其易于贮藏且不上头而受欢迎，是在尚无现代生物技术条件下，以植物（茅香草）浸提增香的绿色环保酒体。难怪苏东坡如此青睐：“三年黄州城，几思压茅柴。何从得此酒，千石供李白。”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史料还是从苏东坡诗酒文章的记载来看，北宋榷酒制度下的黄州酒业已有一定规模，并纳入了官监酒务的范畴。宋朝廷派驻了监管酒类生产、流通、税务方面的专职官员，下达了酒课征榷任务，市面上的白酒、黄酒、配制酒和非商品酒即村酒，在黄州历史上是客观并存的。

三、酿酒之趣——传承中华佳酿文化

大凡了解苏东坡的人，莫不是对其“一词二赋”和众多的文学作品大加赞叹，而作者试图通过介绍苏东坡酿酒之趣、品酒之趣、调酒之趣和酒器之趣，让读者了解另一个苏东坡。

（一）《东坡酒经》——传承至今的佳酿技艺。苏东坡酿酒有六、七种之多。他可根据宦游或贬谪之地的不同资源而因材施教。如在岭南酿造桂酒、真一酒；在河北酿造中山松醪，用黄桔酿过洞庭春色酒；在黄州东坡雪堂他酿过蜜酒，调制过义尊酒；在海南他酿制过天门冬酒。他不仅亲自动手酿，而且还将实际作法及细致入微的观察体会，用曲、用粮及工艺流程整理成文，即《东坡酒经》：^⑩

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取足以解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始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簋，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簋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搅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

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簍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东坡酒经》成文时间早于我国历史上酿酒专著《北山酒经》，全文共374字，对选粮、用水、制曲、投料、粮醅及配曲之比，加浆、酿造期限和出酒率等均作了描述。

(二) 瓮中生香——东坡蜜酒与传世之酿。初到黄州的苏东坡生活困顿，由于跟随他二十年的故友马正卿出面说情，黄州太守将一片废弃的营地划归他。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开始了自给自足的耕作。《东坡八首》真实地记录了他与民同乐、同劳作的情形，“东坡居士”由此闻名。元丰五年(1082)五月，躬耕东坡之上，小有收成的苏轼，得绵竹道士杨世昌酿法，将蜜酒酿制过程作《蜜酒歌·并叙》：“西蜀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醪。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遗之。”^⑪“六月田夫汗流沬，真珠为醴玉为浆。蜂为耕耘花作米，不如春瓮自生香。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拔。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从苏东坡在黄州酿制蜜酒的记述中，人们除了了解他躬耕东坡之上的辛苦耕耘，揭示蜜酒用粮、用曲的要求外，还证实了以下几个鲜为人知的事实：(1) 黄州北宋时期与其它地方一样，白酒、黄(米)酒是同时存在的，“……瓮……生香”反映的是固态与液态发酵相融的早期传统工艺。(2) 记录了当时的黄州酒价：“百(文)钱一斗”。(3) 东坡酿制蜜酒并非外传以蜂蜜酿造，而是在主粮发酵过程中加料加曲以恢复、反复发酵，用于延长发酵周期以增酒力。我们看看苏轼在《东坡志林》^⑫中是怎样记录东坡蜜酒的酿制过程的：

予作蜜酒格，与真水乱。每米一斗，用蒸饼面二两半，饼子一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若甜软，则每投更入曲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

不难看出：(1) 东坡蜜酒之酿制用的是“真水”即摊凉后的熟开水；(2) 用“面”“饼”作曲，并取“醅液”作酒母，以增加更多的生物菌种参与发酵；(3) 加饭投料则“曲”与“饼”减半，可见他掌握了曲多则酒苦的酿造原理；(4)

《东坡志林》中记载的这些，已经是趋于成熟的黄酒工艺与作法，“全在酿者斟酌增损”的深刻体会与凭经验酿制，至今仍在绝大部分尚未实行机械化、标准化酿造的黄酒企业中沿用。在江苏

与浙江这些黄酒集中产区，所延用至今的“善酿”和“加饭”法亦是如此^⑬。

他在岭南，给建安徐得之的信中记述了“真一酒”酿法：“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每米一斗，炊熟，急水淘过，控干，候令人捣细白曲末三两，拌匀入瓮中，使有力者以手拍实，按中为井子，上广下锐。如绰面尖底碗状，于三两曲末中，预留少许掺盖醅面，以夹幕覆之，候浆水满井中，以刀划破，仍更炊新饭投之。每斗投三升，令入井子中，以醅盖合，每斗入熟水两碗，更三五日熟，可得好酒六升。”由此可见，真一酒与蜜酒相似，属黄酒之类。酿法中涉及的(用曲、洗米、蒸饭、淋饭、摊饭、拌料、搭窝、加浆、开耙、喂饭、再加浆等)黄酒酿制工艺被延用至今。

(三) 甜酸甘苦何足追计——随适达观的人生态度。元丰四年(1081)十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在《饮酒说》中云：“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酝。曲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耳，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

很显然：苏东坡对酿酒之“甜酸甘苦”表明了“何足追计”之达观态度。如果我们用现代生物科学与酿酒业的标准去衡量近千年前苏东坡酿酒的成败，是不符合历史、科学和客观实际的。笔者在这里要释疑两个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的问题：一是苏东坡违禁酿私酒问题；二是苏东坡酿酒酸败，喝了拉肚子，更有甚者评说为“泻药”的不实之词。前者是不了解北宋时期的酒政所至，而后者有哗众取宠或戏说之嫌。

北宋时期的官酿专卖制度下，私酒和非商品酒的生产是客观存在的。所谓非商品酒即未进入市场流通的酒^⑭：一是官府酿造的自用酒，如法酒、御酒、公使酒等，具有督促地方官吏廉政意义。二是由宗室、戚里和品官之家酿造的自用酒。是政府“恩逮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同时防止他们凭借权势参与市场，影响酒课征榷的一种措施。三是允许广大乡村酿造非商品酒，即“村酒”，以自酿自饮或自给自足。苏东坡在黄州时，只是“城中禁酒如禁盗”，而城外乡村是可自酿自饮非商品酒的。“田中黍穗处处黄，瓮头新绿家家有”能自酿待客多是农家大户，可见他几次逾城外，穿花踏月饮村酒，闭门自酿是不违法的！

黄酒的酿造过程中，像苏东坡“曲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的实践经历古今有之。曲为酒之骨，粮为酒之肉，水为酒之血。现代生物技术表明，酸败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其本

质是乳酸菌失控。尽管苏轼《饮酒说》文中反映了“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以及好友潘邠老家造逡巡酒，苏东坡饮后云：“莫作醋，错著水来否？”这是他本人作品中分别记载自己和他入酿酒酸败的情况。至于因苏东坡酿酒酸败后拉肚子，还有一说在他去世后，有人向其子寻苏东坡酿酒秘方一问一答等说法，本人均持怀疑态度，事实上苏东坡将酿酒作法已经公开。无论是正常黄酒或酸败至醋，饮后即使有拉肚子的情况，当属“吃”的问题，而绝非“饮”的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吃腐乳不至拉肚子，喝了醋更不至于拉肚子。这是不同的生物菌群、菌种所决定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拉肚子是大肠杆菌作祟，因为乳酸菌并非大肠杆菌，断不会有拉肚子一说。

在《百家讲坛》康震教授评说苏东坡，以及《文化中国》黄玉峰说苏轼等节目和出版物中，涉及苏东坡在黄州违法酿私酒，饮之酒后拉肚子等说法，既缺乏史料佐证，又与生物科学悖悖，以至后来被许多苏学专家、学者所抨击。

四、弄酒之趣——共享为义，适度为尊的人文精神

从苏东坡的酿酒情结之中，不难看出他已达到可著书立说传世的高度，殊不知其饮酒、调酒、藏酒之趣，更是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评价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

（一）饮酒之趣：苏东坡饮酒有三习，即“适”、“义”、“随”。东坡好酒：“予虽饮酒不多，然日欲把盞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书东皋子传后》）

可见苏东坡酒量小而酒瘾大，他不像李白、刘伶那样狂饮，大醉。他讲求的是一个“酣适”之度，即度的把握。如同病者得药，他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他为之酣适。适人、适己、适事：适度为尊。

在《浊醪有妙理赋》⑮中写道：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卧梦，信妙理之凝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瞰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铺。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煖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在《右调〈巢生〉一首》⑯中：“我有一樽酒，独饮良不仁。”于是乎：与友饮，与渔樵、田夫、乡邻饮，与道、与僧、与名士饮，与弟、与子、与妇饮，是他与众共享的酒习，即“义”：共享为义。

元丰五年（1082）九月，苏东坡在黄州雪堂夜饮，《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小舟从此过，江海寄余生。”次日，黄州传出苏东坡已得道云游出海的消息，太守徐君猷大惊！苏轼在黄州虽是贬官，但自己亦有监管之责，急去临皋亭查看，此时的苏东坡正在酣睡之中。

《渔父》：“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说的是与渔夫一起去酒家饮，以鱼蟹与酒进行互易而不论钱数，以醉为限不论饮酒多少。

元丰五年（1082）三月，苏轼的《西江月》文载“顷在黄州，春夜行至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在政治受挫、生活困顿中的苏东坡，其随遇而安的人生境界，在其酒习中亦不例外。

苏东坡的这种以适为度、与众共享、随遇而饮的酒习，与黄州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仆去黄州五周岁矣，饮食梦寐，未尝忘之。”以致于后来他在惠州梦中说黄州。这些酒习，不仅调适、抚慰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创造、奠定了“共享为义，适度即尊”的酒文化。

（二）调酒、藏酒之趣：常人饮酒多是单一一种酒，少有混饮。苏东坡却早将多种风味的酒调合而饮，开中国式鸡尾酒之先河。在黄州雪堂时，邻近四五郡皆送酒。他不仅酿制蜜酒，还藏酒、调酒，他将各地送来的酒合置一器中，并亲书“雪堂义樽”交夫人王闰之斗藏。在这里：（1）苏东

坡将友人送来的不同风格的酒合置一器中，器为何物？（2）苏东坡与杨世昌等友人泛舟赤壁，怀古作赋，饮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饮的什么酒？只要考察一下雪堂的修筑和“一词二赋”成文的时间，即可找到答案。

元丰五年二月苏轼《雪堂记》载：“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右左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顾顾……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从苏东坡《雪堂记》对自然环境和自己避世心态的描写，可看出：（1）苏轼在黄州雪堂，过着自甘恬静、与世无争的生活。（2）雪堂里确有一酿酒或贮酒之器，“瓮”即酒器。（3）苏东坡于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从定惠院迁居临皋亭，而临皋亭靠近长江，“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东坡志林》，地势较低，属于朝廷官员莅临之居所，即水上“官驿”。①“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半山坡）“筑而垣之”，作茅屋五间。相对临皋亭而言，雪堂是苏轼躬耕休息，偃仰起居，受赠待客等相对僻静而独立的主要场所，才有“夜饮雪堂归于临皋”“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之说，更是东坡酿制蜜酒、贮集瓮藏“雪堂义尊”唯一合适之地。东坡酿制蜜酒，“蜂为耕耘花作米，不如春瓮自生香……三日开瓮香满城”，显然使用的是“瓮”作为酿酒器具。接受邻郡赠酒，合置一器并亲书“雪堂义樽”的贮藏之酒器，亦是令其抱而忘机的“瓮”。雪堂修建于元丰五年（1082）正月，《雪堂记》成文于元丰五年（1082）二月，《蜜酒歌·并叙》（不如春瓮自生香）作于同年五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写于同年七月和十月。

综上所述，苏东坡夜饮雪堂归于临皋，携酒与鱼泛舟赤壁，与杨世昌、潘大临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一樽还酹江月所用之酒，皆出于他自己合置一器（瓮）中，调和、融合、贮集且经夫人王闰之斗藏之酒——雪堂义樽。

东坡在雪堂之中，何取“义尊”之名？据《容斋随笔》：与众共之曰义。樽同尊，其义有三：一为酒器。二为尊称，尊长。三是量词，一樽；即小中之大，大中之小为樽。然而，东坡之“义樽”，聚诸味调和互补于一瓮中，取共享为义，适度即尊之喻意。这无论是他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以适为度的酒习乃至与王安石相左的（渐进、适度）执政理念，亦或与现代人推崇的酒（桌）文化是多么的妥帖！

（三）酒器之趣：酒趣即酒习，酒器即酒具，“趣”与“器”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苏轼的诗酒文章中浑然天成，“器”、“趣”难分。苏

轼酒趣与酒器在其文章中出现频率之高，让人很难分清是器中之趣还是趣中之器。诗、词、赋、书、札、杂文中半数以上无不涉酒，涉酒必带“器”，而“器”之博，“趣”之特，堪称“人间不可无一，而难能有二”（林语堂语）。据查：苏轼使用过的大量酒器，在后来谪居海南前变卖。一个既饮酒又酿酒的文人，尽卖酒器，可想而知其内心的痛楚与无奈。

在他的酒具酒器中有：

瓮：《雪堂记》中“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中的“瓮”属于贮藏之器，也是雪堂义尊酒被合置之器。《蜜酒歌·并叙》中的“不如春瓮自生香”、“三日开瓮香满城”，《东坡酒经》中的“酿者必瓮按而并泓之”（搭窝），多指苏东坡酿酒之器。黄州地区及周边农家如今常见到这种口小容量大的陶质家什，大小不一，如坛各异者即是。

盏、三焦叶：即具典型宋代风格，似碗称杯的荷叶边口饮酒之器。有豆青陶瓷质地，亦称“玉盏”，形似浅焦叶或荷叶，还有荷叶上置一小龟，供寿诞酒席之用。“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焦叶矣。”②（《题子明诗后》）

榼：应属最小的一种饮酒器具，在《浊醪有妙理赋》中“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明清直至建国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州及周边地区一直在使用。

爵：自汉代延用的三脚立式酒具，多为金属材质。电视剧《三国》煮酒论英雄之场景中，掩面而饮的三脚两柱之酒器。苏轼《节饮食说》云：“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

瓶：元丰三年（1082）二月二十日，苏轼与潘、郭、古等友人寻春禹王，“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这里的“瓶”显然是用以烫饮的酒器，还有外部“镀”铝、锡后称之为“银瓶”，“快泻银瓶不须拔”。

觥：青铜制的酒器。元丰四年（1081）十月二十日，“谒王文父齐万于江南岸。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如其类似的还有：“觥”、“觚”、“斛”、“壶”。

樽：是苏轼文章中使用较多的酒器，包括“义樽”、“清樽”、“匏樽”。“元丰五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清阴微过酒樽凉”。这里的樽，显然是被烫过用于热饮的酒器。苏东坡使用的酒器之中，档次较高或质地较好的酒器当属“银瓶”、“觥”，分属“镀”铝和青铜器具。“玉盏”和“三焦叶”则是一种豆青宋瓷酒杯。“匏樽”：即割开后掏空用以盛酒的葫芦。《赤壁赋》

中“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的“匏樽”，并非是说东坡酒量大以瓢饮酒，而是指舟中饮酒器具之简陋。《赤壁怀古》中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当属千古传颂的江月之樽。

尽管东坡酒器中“樽”的形式各异，内涵十分丰富，其本质还是一个“适”字。正如他自己所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苏东坡诗酒文章中，酒趣之特、酒器之博、酒气之浓，是历代文人墨客所不及的。蕴含并散发着“与共享为义，饮酒适度即尊”的酒文化。除此之外，他的许多趣事反映了民本思想理念。

元祐年间的苏东坡，曾被重新启用，汝阴久雪，苏轼将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以解救缺少柴火的人。^{①⑨}

元祐七年八月，苏东坡在颍州太守任上，以兵部尚书被召回后，奏请圣谕罢停了元丰年间开始实行的赏格法。^{②⑩}当然，到绍圣元年又得以恢复是后话。

当我们透过北宋时期的酒政与黄州酒业概况，来品味、解读苏东坡之酒趣，认识其诗酒文章中的各种酒器，不难了解苏东坡所处北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苏轼民本思想，在当时条件下很难付诸实践。

黄州有幸！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苏东坡这位旷世奇才，遂为名邦。东坡有幸！墨香中浓郁的酒香，伴他渡过了四年又四个月的黄州生活，东坡之名盛于黄州。如今的黄州，瓮生香东坡蜜酒、雪堂义尊、黄州茅香酒均已由黄冈瓮生香公司注册研发并推出。东坡千载无憾事，黄州茅柴酒亦香。

参考书目

- ①苏灿、张忠全编著《苏轼为官之道》，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 ②、⑩、⑭李华瑞著《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③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栟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 ④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校《曾巩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辑佚·议酒”。
- ⑤、⑳陈振著《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 ⑥清徐松编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 1957 年版，“食货十七”。
- ⑦宋赵珙《熙宁酒课》，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⑧马瑞临著《文献通考》，浙江古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⑨梅大圣、丁永淮、张社教编著《苏东坡黄州作品全编》，武汉出版社 1996 年版。

⑪吴有元著《千古风流——苏东坡在黄州》，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⑫苏轼撰、赵学智校注《东坡志林》，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⑬胡文浪著《黄酒工艺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8 年版。

⑭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⑮苏轼撰，扬守敬、杨寿昌选编《景苏园贴》，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7 年版。

⑯王琳祥著《黄冈赤壁》黄冈东坡赤壁风景区管理处发行 2008 年 11 月。

⑰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4 年版，“东坡自述”。

⑱赵令畤著《侯鯖录》卷四，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员、黄冈市瓮生香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孙开中）

（上接 42 页）

这首词，确实曾是与之朝夕相处、心心相印的朝云的最爱。朝云的情不自胜，大约是她体味到词句的弦外之音。“天涯何处无芳草”是化用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其中寄托了故国之思，是贬谪生涯悲情处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不甘孤寂执著追求的精神赞歌。

苏轼的豪放词开创了一代文风，影响深远，但他的婉约词亦毫不逊色。可以说，苏轼的婉约词无论从其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上均达到了宋词史上的高峰。

论文注释：

- ①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74 页欧阳修《蝶恋花》。
- ②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8 页南宋胡寅著《酒边词序》。
- ③刘熙著《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74 页。
- ④毛德富、王晓东《苏东坡全集》（第三册），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91 页《浣溪沙·有赠》。
- ⑤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90 页。
-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 （责任编辑：刘清泉）

苏轼与禅师的交游

彭印川

内容提要：就苏轼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而言，他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一直是颇为密切的。苏轼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不少禅师与他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苏轼在苏杭及其它地方结识的僧侣（主要是禅师），有慧辩、辩才、梵臻、怀琰、契嵩、清顺、守诠、仲殊、守钦、佛印、道潜、常总、玉泉、佛慧、可久、垂云、思聪、惠勤、惠思、宗本、道荣等。本文选取前十四人，略述其与苏轼之交游。

关键词：苏轼 禅师 交游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父苏洵（1009—1066），弟苏辙（1039—1112），父子三人均荣登“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才华丰茂、笔力雄健，是北宋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文、赋、诗、词、书法、绘画均傲然而为一代大家，故蔚然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就苏轼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而言，他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一直是颇为密切的。苏轼之接触佛教，至少可以上溯至他十来岁之时。据苏轼《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载：“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①另，《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亦云：“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②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今陕西凤翔）任签判，习佛于同事王彭（字大年），自是大好之，“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③。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起，苏轼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因此而博览释典、深究佛理。苏辙所作墓志铭云：“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④苏轼坦

然自陈：“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⑤据不完全统计，苏轼所阅读的佛经有《楞伽经》、《金刚经》、《华严经》、《莲华经》等。

苏轼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不少禅师与他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苏杭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他在苏杭的时间前后有七八年之久；苏杭不但风光旖旎，经济发达，而且高人云集，禅师辈出，苏轼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苏杭亦处处留有苏轼之足迹。苏轼自述云：“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⑥苏辙回忆其兄时亦云：“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⑦揆理度情、比勘事实，此二语并非夸夸其谈之辞。

苏轼在苏杭及其它地方结识的僧侣（主要是禅师），有慧辩、辩才、梵臻、怀琰、契嵩、清顺、守诠、仲殊、守钦、佛印、道潜、常总、玉泉、佛慧、可久、垂云、思聪、惠勤、惠思、宗本、道荣等。

海月法师慧辩（1014—1073），字讷翁，时为杭州都僧正。慧辩系天台宗僧人，在杭州前后讲教二十五年，学徒达千余人。慧辩“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缙素悦服”，故苏轼“喜从之游”⑧。苏轼“敬之如师友”⑨，曾为作《海月辩公真赞》和《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分别见《东坡后集》卷二十和《东坡集》卷五）。

辩才法师元净（1011—1091），字无象，天台宗僧人。先住杭州天竺观音道场，后退居龙井圣寿院。对于辩才，苏轼亦“敬之如师友”，经常与之往来并听其说法，并作有《赠上天竺辩才师》诗和《龙井辩才法师塔铭》（分别见《东坡集》卷六和《栾城后集》卷二十四）。

梵臻（生卒年不详），又称“宝相法师”，天台知礼高足。先住上天竺，继迁金山寺，后住持南屏山兴教寺。苏轼初至杭州之时，“与师最厚”（《佛

祖统纪》卷十二)。

大觉禅师怀琏(1009—1090),漳州龙溪人,出生于蜀地,尝师事名僧圆通居讷(1010—1071)。苏洵与怀琏和居讷均有交往,故怀琏与苏轼属世交。在京师期间,苏轼曾经多次聆听怀琏说法。治平二年(1065),怀琏离开京师,渡江而南,其后两人的交往以书信往来为主。苏轼曾为之作《宸奎阁碑》,又有《与大觉禅师琏公书》(分别见《东坡集》卷三十三和《东坡续集》卷四)。怀琏圆寂后,苏轼作铭以志(《大觉鼎铭》),并作祭文(《祭大觉禅师文》)。

契嵩(1007—1072),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禅宗云门宗僧人,赐号“明教大师”,在禅宗史上有较大影响。庆历间(1041—1048)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居灵隐寺永安精舍;其后一度驻锡开封,晚年仍退居灵隐寺永安精舍。契嵩曾校定《六祖坛经》,著有《原教》、《孝论》、《辅教编》等,后人结集为《镡津文集》二十卷行世。契嵩主张融合儒教与佛教,认为佛教“五戒”可与儒教“五伦”相会通,以此反驳排佛者。契嵩死于苏轼到杭州半年之后,苏轼在《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中曾经提起过契嵩,“予在钱塘,亲见二人”(《东坡后集》卷二十)。

以上五人,即苏轼《祭龙井辩才文》所说“五公”,“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东坡后集》卷十六)。

清顺(生卒年不详),字颐然,是当时杭州的有名诗僧。苏轼之结识清顺,实由缘分使然。熙宁五年(1072),苏轼在仁和县汤村镇开运河,有一天即兴游览西湖,“于僧舍壁间见小诗(印川案:即清顺《题西湖僧舍壁》),问谁所作?或告以钱塘僧清顺,即日求得之,一见甚喜,而顺之名出矣”(《宋诗纪事》卷九十一)。当时清顺所题诗为以下四句:“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之后,二人交游唱酬,互相往来。苏轼曾写过两首诗赠给清顺:

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
拾薪煮药怜僧病,扫地焚香净客魂。
农事未休侵小雪,佛灯初上报黄昏。
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

长嫌钟鼓聒湖山,此境萧条却自然。
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

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

遥想后身穷贾岛,夜寒应耸作诗肩。

——(《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

守诠(生卒年不详),一作惠诠,也是吴地名僧。《冷斋夜话》说他“佯狂垢污”,但“诗句清婉”。有一次外出游玩山水,他诗兴大发,就在一座山寺的墙壁上挥毫写下了一首禅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一作松)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屐。唯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题梵天寺》,见《宋诗纪事》卷九十一)。周紫芝《竹坡诗话》说此诗“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苏轼上山见此诗,细细把玩,觉得颇有意蕴,一时技痒难耐,遂和诗一首于后,“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屨。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不料“竟以此诗知名”⑩。

仲殊,俗姓张,名挥,字师利,安州(今湖北安陆)人。本为文士,后中举为进士。其妻投毒欲加害于他,遂弃家为僧,住苏州承天寺、杭州宝月寺;因喜食蜜,人称“蜜殊”。苏轼说他“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又喜他“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⑪。有一年刘涇(字巨济)赴任时路过钱塘,苏轼留他在中和堂饮酒,仲殊也荣属其列;苏轼见屏风上有幅《西湖图》,遂索纸笔作《减字木兰花》:“凭谁妙笔,横扫素缣三百尺,天下应无,此是钱塘湖上图”,付嘱刘涇续作后叠,但刘涇只是再三谦辞而不肯动笔,苏轼只好请仲殊续作;仲殊挥毫续出后叠:“一般奇妙,云淡天高秋月里;费尽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苏轼大加称赞。苏轼另有《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中一首是⑫:

夜半幽梦觉,梢闻竹苇声。
起续冻折弦,为鼓一再行。
曲终天自明,玉楼已峥嵘。
有怀二三子,落笔先飞英。
共为竹林会,身与孤鸿轻。
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
禅老何复为,笑指孤烟生。
我独念粲者,谁与予目成。

苏州定慧长老守钦(生卒年不详),也是吴地著名的诗僧,但苏轼在苏杭时并未与守钦有往来交游。苏轼贬谪惠州后,守钦派侍者卓契顺至惠州向苏轼问安,并寄赠诗作十首。苏轼见诗大惊,题词

于后：“此僧清逸绝俗，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并自付：“予往来吴中久矣，而不识此僧，何也？”^⑬恐是守钦避攀比炫耀之嫌。

了元（1032—1098），字觉老，神宗赐号“佛印”，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佛印本出身于富庶之家，后因皇帝说他若肯出家为僧，可以赐他一个度牒，进退维谷的佛印只好答应出家。苏轼移居湖州（今浙江吴兴），过润州金山（今江苏镇江）时，结识了佛印。苏轼因斗机锋落于下风，只好留下玉带^⑭。元丰二年（1079），苏轼贬谪黄州，开始大量阅读佛教典籍，与佛印了元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有一年苏轼到江西去看望佛印，久候未至。于是手书一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放于佛印处，返回家中。佛印回来看到偈子，略一思索，便提笔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放屁！放屁！”差人送给苏轼。苏轼见到这粗俗透顶的批语，大为愤怒，径直过江找佛印理论，指斥佛印对他虔诚护法的怀疑和不恭，不料佛印从容笑道：“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弄得苏轼哭笑不得。佛印喜欢收藏图画尺牍，苏轼与其交情甚笃，经常一同游山玩水，品茗吟诗。

苏轼在黄州时，还有幸结识了道潜，两人保持着二十余年的诚挚交情，无愧于“生死之交”四字，令时人和后人感动莫名。道潜（1043—？），俗姓何，本名昙潜，苏轼为之改名道潜，号参寥子，后得赐号“妙总大师”，浙江临安（今属杭州）人。道潜自幼出家，于内外典无所不窥，能文善诗，与苏轼、秦观（1049—1100）结为文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僧。苏轼特爱其诗，说它“无一点蔬笋气，体制绝似储光羲，非近诗僧可比”（《梦梁录》卷十七）；又谓其诗清绝，与林逋相当。苏轼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时，参寥专程自余杭往谒苏轼。一日，宾朋同僚聚会，苏轼当众说：“今天参寥不留下点笔墨，令人不可不恼。”遂遣官妓马盼盼持纸笔就近参寥求诗。参寥意走神驰，一挥而就，口占一绝：“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苏轼见之大喜：“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收拾，遂为此老所先。”^⑮其中“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二句，传为一时名句。除此二名句外，参寥的“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亦为世人所传诵。另据《宋诗纪事》卷九十一载，苏轼曾以彩笺作墨竹赠官妓，参寥因之而作《题东坡墨

竹赠官妓》：

小凤团笺已自奇，谪仙重扫岁寒枝。

梢头余墨犹含润，恰似梳风洗雨时。

苏轼从参寥处获益不少。元丰六年（1083），时苏轼正贬谪黄州，参寥不远千里而从之游，相从期年。其时，京师士大夫致函诋毁苏轼，函云：“闻公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苏轼将来函展示道潜（参寥），指其中所引参寥诗句“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笑曰：“此吾师十四字师号耳。”^⑯苏轼尊参寥为师，不可谓不器重参寥。元祐中（1086—1093），苏轼知杭州，参寥卜居西湖智果院，与苏轼品茗赋诗，诗茶往还，留情山水，留下了一段极其宝贵的记忆，至今依然让人缅怀、追念、想往不已。绍圣（1094—1097）初，苏轼贬居岭南，参寥坐诗中有讥讽语，勒令还俗，编管兖州。纵使如此，参寥依然不顾社会压力与身家危险，多次派人专程前往惠州探望苏轼。参寥于此尚嫌不足，甚且至于准备亲自渡海随从苏轼南居儋州，终为苏轼所阻而未能成行。此情此意，岂止一个义字了得？

据说，苏轼《浣溪沙》“村南村北响缦车”即取意于参寥的这一名句。苏轼曾写过《送参寥师》，其中数句云^⑰：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元丰七年（1084），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四月，游庐山，会晤东林常总禅师（1025—1091，法号照觉），作诗《赠东林总长老》。东坡夜宿东林兴龙寺，曾与照觉禅师“论无情话，有省”，于是写下了一首有名的参禅诗偈：“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⑱在《五灯会元》卷十七中，苏轼被列入“东林总禅师法嗣”。

玉泉承皓（生卒年不详），俗姓王，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依大力院出家，系北塔广禅师法嗣^⑲。苏轼至荆南（今湖北江陵），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机锋不可触”，便微服前往参谒，“拟抑之”。玉泉承皓禅师问：“尊官高姓？”苏轼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玉泉承皓禅师喝斥一声，问：“且道这一喝重多少？”苏轼无言以对，于是施礼

拜之^⑩。禅本不可道，“说似一物即不中”，更不可斗量斤秤，禅师自也不可斗量斤秤，又怎能秤出禅师的一喝呢？

绍圣元年（1094），苏轼赴岭外，过金陵时曾与法泉禅师（号佛慧，？—1095）斗机锋。东坡问：“如何是智海之灯？”法泉禅师对曰：“指出明明是甚么，举头鹞子穿云过。从来这碗最希奇，解问灯人能几个。”东坡于是欣然。^⑪法泉禅师有《送东坡居士》传世，“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无复问旛风。好将钟阜临岐句，说似当年踏碓翁”（《宋诗纪事》卷九二）。

禅宗不但影响了苏轼的个人生活，而且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创作。如清人刘熙载（1813—1881）即晓畅明言，“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⑫。我们完全可以说：苏轼对禅宗是情有独钟，并对他影响深远，历久而弥真，历时而弥坚。因此，苏轼在赠龙光长老的诗中盛誉禅宗：“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⑬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15页、第381页苏轼《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第1750页、第906—907页、第2423—2424页苏轼《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輿，得两竿。时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

⑥、⑦、⑧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4页、第1127页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第248页苏辙《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第1146页苏辙《天竺海月法师塔铭》。

⑨、⑩、⑪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65页苏轼《王大年哀辞》、第1752页苏轼《与程彝仲》、第638页苏轼《海月辩公真赞》。

⑫、⑬、⑭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第40页苏轼《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第41页。

⑮、⑯、⑰、⑱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7页、第1146页、第1012—1013页、第1146页。

⑲宋赵令畤《侯鯖录》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⑳宋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㉑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㉒清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6页。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孙开中）

（上接48页）

④、⑤、⑥、⑦、⑧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宋史本传》，第2805、2806、341、1818页。

⑨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页。

⑪、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270页。

⑬张亚新《从陶渊明到苏轼》，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⑭、⑮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1、708页。

⑯王先谦注《庄子集解》（影印本），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88页。

⑰、⑱、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3页。

⑲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责任编辑：孙开中）

“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 ——兼与有关“东坡地在何方”争鸣的朋友商榷

饶学刚

内容提要：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的躬耕地东坡在何方？一直为后人所关注。“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东门，近东坡之门也”，“西临大江，东傍湖泊”。无数史实表明：从近黄州府署的西北门入城向东，行百余步，就见山垄高下，进入东坡地，便是平旷开阔的地势，其西有古楼岗，北有龙王山，东有银盘山，南有柯山环绕之。“东起一垄，颇高”的便是银盘山下农作物高垆。于是，我以为东坡地的范围大致为：今西起古楼岗，东至银盘山下体育路（南端），北起龙王山下，南至十八坡、十三坡。大约50亩土地。

关键词：东坡地 50亩 州治东 东门 审慎

自从拙著《苏东坡在黄州》出版以来，产生不同反响，鼓励者说是“填补研究空白的文化建设工程”，批评者指责东坡地体育路说“有误后来君子”。最近读了张龙飞《寻找东坡》（载《苏轼研究》2010年第1期）和王琳祥《东坡雪堂故址考》（《黄冈市首届东坡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后，获益匪浅，感谢两位先生的可贵启示。对照他们考证确定属东坡地南沿的合理成份，我冷静地做出反省：偏失的就改正，正确的仍坚守。我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对待学术上的争鸣。

“东坡”地之争表面上属于地名学，究其实质则属于方志学、考古学、考据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综合学科。它向我们提出了较高的专业素质要求。首先要求我们应以准确的历史和地理的考察视角、立场来统领。从不同时代、不同视角、不同认识来考证，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我过去是站在宋代黄州“郡东”、“州治东”、“东门”、“东

（边）坡（地）”的立足点上，来审视“东坡”地的方位和坐落的，没有大的失误。要说差错就是在东坡地50亩面积界定上少说了话，认定的体育路东坡地范围太小，我暂拟称为东坡地东沿，恐怕只有两三亩地。张龙飞先生担心我这个黄冈学者的“传统思维难以改变”，NO！请放心，我“择其善者而从之”，正在修正完善我的“东坡”地方位和坐落之见；且做到简明扼要，不绕弯子，不繁索引，全让事实说话。

“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

宋神宗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黄州。四年，老友马梦得在府衙求得一块废营地。东坡先生“幅巾芒屨，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东坡”地在何方？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赤壁、州治、东坡地走向、坐落、距离的确定。

苏东坡说：“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可是否？”（《记赤壁》，《东坡志林》名《赤壁洞穴》）

北宋人张文潜说：“黄州，江南流在州西。……去治无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颇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矶也。”（《续明道杂志》）

由上可见，黄州州治（黄州府署办公地）、守居（太守住所）与赤壁矶的距离为“无百步”或“数百步”。不管哪个朝代，按现代人的理解，三步两米，州治与赤壁距离少则有60米左右，最多按900步算，州治与赤壁距离也只有500米左右，约计一

里程之距。认定州治在原黄冈县人民政府院内是合适的。

南宋人施元之说：“东坡在黄冈山下，州治东百余步。”（《东坡八首》并序，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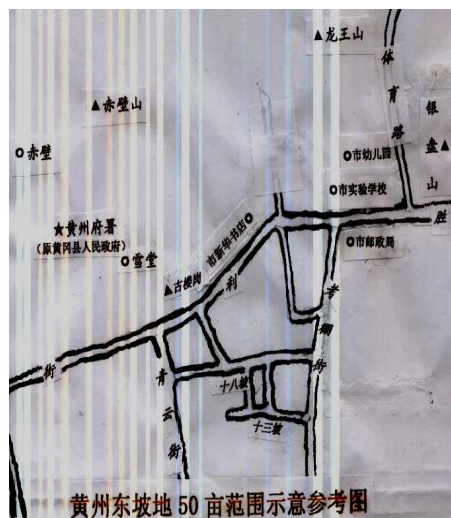
南宋人王象之说：“东坡，在州治之东百余步。元丰三年，苏轼谪居寓临皋亭，后得其地，立雪堂而徙居焉。”（《舆地纪胜》）

南宋人祝穆说：“雪堂，在州治东百步。”（《方輿胜览》）

由上可见，东坡地与州治之距离为“百余步”或“百步”。不管哪个朝代，按现代人的理解，三步两米，东坡地与州治只有 65 米左右的距离。非常明确，东坡地、雪堂，“在州治东百步”，东坡地的西沿起点当是古楼岗以东了。

赤壁、州治、东坡地三者距离这么短，坐落链又这么严密。有一链是固定的，那就是赤壁。三者呈“西北—西—东”的钝角三角形走向。这是我审视东坡地在何方的第一个基本立足点。我们考察东坡地的走向、坐落，必须围绕这三者坐落链进行，紧扣“东坡在黄冈山下”，在“州治东百余步”不动摇；一经离开，就是强辞诡辩，什么也说不清，即使搬出牢城失火说、佛庙鸟窠说、荒祠塑像说，也不能改变这三者坐落链的客观存在，更无法改变东坡地坐落在城东边、城东门坡地上的客观存在。

张、王也承认“东坡、雪堂只能是黄州城内距离黄州府署所在地百余步的地方”。可是他们考证论定起来，则改变东坡地位于郡东（太守办公地的东边）、州治东、城东、东门的走势，偏向了郡南、州治南、城南、南门，冒出了东坡、雪堂“县学东一字门南边四百三十步”说，“与一字门相近”说，



“东坡在府治东南县学处一字门西侧”说，雪堂“今日黄州区幼儿园的南边”说，等等，这些坐落离州治太远了，何止百余步，实在是“与黄冈人传统

的看法大大相悖”。

“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

苏东坡说：“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与章子厚二首》）

南宋人叶真说：“东坡在黄，即坡之下种稻为田五十亩，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几死。（《叶真坦斋笔衡二十一则》之一《东坡牛医》，孔凡礼点校《爱日斋丛抄》）。

“有田五十亩”，这是我审视东坡地在何方的第二个基本立足点。当年，我做“东坡”地坐落的文章，所定的方向、方位没有错，扣住了郡东、州治东、东门走向；然而，最大的差错在于缺乏考证的严密性，在东坡地 50 亩面积界定上少说了话，未多做点具体阐述工作，更未见诸考据文字，认定体育路东坡地的范围太小，只是东坡地东沿的一部分，恐怕只有两三亩地。当初，我所依据的是南宋人陆游和范成大对 50 亩东坡地的描绘。陆游说：

“（八月）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入蜀记》）范成大说：“郡将招集东坡雪堂。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东坡卜居时，是亦有取于风水之说。”（《吴船录》）现在，我用今日的视点，试图把陆、范所描述的东坡地坐向译述于下：从近黄州府署的西北门进城向东，行百余步，就见起伏的山垅地农作物，入东坡地，便是平旷开豁的地势，其西有古楼岗（赤壁山微脉），北有龙王山，东有银盘山，南有柯山环绕之。“东起一垄，颇高”的便是银盘山下高垅的农作物。这高垅正好是东坡地东沿的标识。于是，我以为东坡地的范围大致为：今西起雪堂、古楼岗，东至银盘山下体育路（南端），北起龙王山下，南至十八坡、十三坡，其间涵盖体育路（南端）、黄冈市幼儿园（部分）、黄冈市实验学校（部分）、黄冈市新华书店、古楼岗，再由此斜向南扩展至黄州青云街的十八坡省黄梅戏剧团，十三坡市商贸局，又北回至黄冈市邮政局（部分）。大约为 50 亩土地。这东坡地正好坐落在郡东、州治东、城东的黄冈山下的平坡上。

王琳祥先生的文章引用与引用、观点与观点很多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东坡、雪堂只能是在黄州城内距离黄州府署所在百余步的地方”，

这基本上是对的,只是“黄州府署”后少了一个“东”字;另一方面又说:东坡、“雪堂在黄州南门的南边四百三十步”的地方,这是令人费解的。这里离州治只有百余步吗?何况又大大偏向于城南。在另一处则看见了张、王可喜的观点。张龙飞先生说:雪堂“大约在市烟草局宿舍区和市商业局一带;东坡应该就在十三坡,大约是市商业局至胜利街派出所。”王琳祥先生说:“东坡雪堂的准确位置就在十三坡黄冈市烟草专卖局宿舍院内”,“在黄州城区内的青云街与考棚街之间”。不论是“大约”也好,还是“准确”也好,除“雪堂”肯定错了方位、坐落外,均意味着两者接近了东坡地南沿之实际,非常有价值。不过,他们与我同样犯了只点明东坡地边沿(南沿)方位的错误,以点代面,未扣住东坡地50亩的广大范围,尤其远离了郡东、州治东、城东的方向,至多也只有两三亩土地;何况也不能把50亩土地的东坡地,局限于一个机关宿舍区。

“东门,近东坡之门也”

“东门,近东坡之门也。”这是我审视东坡地在何方的第三个基本立足点。苏东坡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东坡八首》并序)

苏东坡说:“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与杨元素书》之七)

苏东坡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书》之一)

苏东坡说:“近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与蹇授之书》之六)

东坡地在城内,这个认识无有分歧,而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城中”方位的准确界定。是偏东,偏西,偏南,还是偏北?认识不一。其实,历史早有定论,偏东,东边的坡地,坐落在黄州宋城之东,有范成大“郡东”说,有施元之、王象之、祝穆“州治东”说为证。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当时人当事人东坡先生和小东坡75岁的南宋人王十朋的认定。东坡说:“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笑我此何求。”(《日日出东门》)。王十朋注说:“《东坡图》云:东门,近东坡之门也,在乾明寺前五步,今无矣。”非常清楚,城中的东坡地就是苏东

坡天天寻城游、步近城东门之地也。离开了东坡地近东门之事实,还谈什么东坡故址考证。事实胜于雄辩,不容置疑。

然而,张龙飞先生说:“东坡在府治东南县学处,而县学就在一字门西侧,刚好也在州治之东百余步。”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东坡地、州治,怎么跑到城南一字门去了?那东坡地在“州治东百余步”、城的东坡之上,州治又在赤壁附近、距离赤壁只有“百余步”又怎样理解呢?这说明张先生脑子里清晰的东坡地轮廓还没有形成。

“西临大江,东傍湖泊”

苏东坡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他又说:“黄州小郡夹溪谷,茅屋数家依竹苇。”(《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

北宋黄州刺史王禹偁说:“黄州地连云梦,城倚大江。”(《黄州谢上表》)他又说:“齐安古郡废,移此清江头。筑城随山势,屈曲复环周。兹楼最轩豁,旷望西南陬。武昌地如掌,天末入双眸。平远无林木,一望同离娄。山形如八字,合会势相勾。三国事既远,六朝名亦休。远从唐未来,争夺互相仇。斯楼备矢石,此地控咽喉。终朝望烽燧,连岁事戈矛。”(《月波楼咏怀》并序)

北宋文学家张文潜说:“黄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有藩篱,城中居民才十二三,余皆积水荒田,民耕渔其中。”(《明道杂志》)

明弘治十四年(1501)《黄州府志》载:“本府城,宋元在今城南二里许,西临大江,东傍湖泊,水涨淹没。本朝甲辰年指挥黄荣于此展筑,洪武十七年指挥曹奉、永乐六年指挥郭显,前后修理高二丈一尺,周围一千八百二丈八尺五寸,绕以壕堑,为门四,东曰清淮,南曰一字,西曰清源,西北曰汉川。”

由上可见,黄州宋城是座“长江绕郭”的矮土藩篱城,其间为溪谷、积水、荒田、竹苇、茅屋,民耕渔其中,与山乡没有两样。东坡先生躬耕其中,是自然不过之事了。宋城的西面和南面倚枕长江,北面仰障龙王、赤壁山势,东面与湖泊为邻,远远大于明城好多倍了,仅城南就比明城大二里,最少远1500步。(下转63页)

颍水清流 淡泊明志

——苏轼《泛颍》赏析

熊朝东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
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
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
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
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
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
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
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
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
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颖诗。
——苏轼《泛颖》

这首诗作于元祐六年（1091）八月苏轼知颍州时，宋之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有颍河绕流城郭。共汇流处称之为西湖。《清一统志》云：“西湖在阜阳县北三里，长十里，广二里。颍河合诸水汇流处也。”

诗起二句描写了诗人本性爱水，而任所恰又有颍水且奇美的喜爱心情。确实，苏轼好似命中带水，一生与水湄结缘，凡为官之地大都有湖，可说游湖成了苏轼生活中的一部分。当时便有人说：“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王直方诗话》）他的学生秦观也说：“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你看他“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十天就有九天泛于湖中，其泛颍之勤说明诗人对颍水爱之深。但却将颍之“奇”与泛颍的悠游乐哉避而不写，横生一笔去写“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的岸上见闻，使诗的意境顿然拓开。这两句很有趣味

和蕴含。苏轼既是个“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待人不分贵贱的谦谦君子，又是一个爱民为民做好事的官，他曾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其性格和为人很受百姓爱戴。因此，“笑相语”是吏民对“使君”的一种亲昵表现；“老而痴”是吏民对“使君”处境的同情与怜悯。故而诗人以玩笑的口吻回答说：“使君实不痴”，非常巧妙地道出“九日河之湄”真情。元祐初，司马光一派上台后，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却反对尽废之举，特别是免役法，主张兼用所长，不肯“惟温（司马光封温国公）是随”。既受旧派排挤，又遭台谏官攻击，苏轼“自此不安于朝”。于元祐之年，乃接连上书称病，要求离京出任地方职。到翌年才获准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元祐六年二月又召还朝后，再次受到洛党攻击，八月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出知颍州。有这段因由，诗人却点到为止，以“流水有令姿”既机警地避开这个话题，又起到承上启下而转入描写颍水之奇的正题，使得诗情诗意含蓄深沉，波澜起伏，妙趣横生。

这是怎样的一幅有“令姿”的水中画景呢？诗人以“流”字入笔，流水潺湲，静静如玻，画船轻浮，“不驶”、“不退”，恰到好处，人在船中，船在水中，优哉游哉，好不惬意。十里流水，或“直而清”，或“曲而漪”，“直”而有情，“曲”而有态，上、下流态各不相同，都是如诗的画景。画景中映着诗人的影子，情致何等有趣：“笑问汝为谁”？东坡高兴得自己给自己开起了玩笑。忽然，微风乍起，“吹皱一河河水”，扩散出一圈又一圈涟漪，使得波摇影乱，水中人影随之“散为百东坡”。很快风又停，波又静，影子“顷刻复在兹”了。河风一吹一停，不但使颍水上、下流的姿态随之变化，而

且水中既有真相又有变相，其情其态自然和谐十分有趣味，可谓传神之笔。诗人意犹未尽，想像说这是水在给自己相互嬉闹开玩笑。“薄相”，即“白相”之意。从“流水有令姿”到“与我相嬉嬉”这一段，充分表现了苏轼“随意吐属，自然高妙……情景涌现，如在目前”（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情才华。

到此，我们看到了诗人爱颍水之奇的真正目的：“颍水清流，淡泊明志。‘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诗人说，世人为荣华富贵，升官发财，声色货利所炫惑，弄得七颠八倒。“夫求祸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苏轼《超然台记》）。这些人只在斤斤计较于一物之得失，不能游于物之外。而诗人却把这些看作是水中之物，顷刻间的变化；是儿戏之物，如水的玩笑没有二样。他的爱水、泛颍，其目的用以自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表明自己“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的品格和淡泊明志的个性。

结尾四句，看似多余之笔，实则不可少。以补出同游的人有赵德麟、欧阳修的两个儿子，说明处于同一事物中，各人都悟出道理来，也许是相同的道理，也许是不相同的道理。“天人”，即物我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观妙”，即是由客观景物悟出人生哲理。在苏轼悟出的“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确是“观妙各有得”的。恰如方东树所评：“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景，匪人所测；于篇中又各有不测之境，其一段忽从天外插来，为寻常胸臆中所无有。”（《昭昧詹言》）

全诗语言流畅，当止则止，当放则放，进退转换有度。诗的意境深远，既有情趣，又含蓄深沉，使读者读之有诗内有“诗”的联想。

（眉山市东坡区新闻中心原总编，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山流水）

（上接 61 页）这是我审视东坡地在何方的第四个基本立足点。至于那东门，就超出明城东门清淮门更远了，今体育路一带自然在东城范围内，正好处于古楼岗东与银盘山西“地势平旷开豁”间的东隅一侧，即东坡地东沿的起点了。

然而，王琳祥先生说：明清时代留下的东门“坐落于今市邮政局、市幼儿园的那一段街面上（明清

时代的黄州城是在唐宋时期的黄州城址上修筑的，只是西北边稍加拓展），……而市邮政局、市幼儿园东边的地方皆属城外。”这显然不符合宋城的原本面貌。王先生不顾宋城“东傍湖泊”的客观存在实际，仅凭明城遗址而做推断，不免有点望文生义，想当然耳。这说明王先生脑子里清晰的东坡地轮廓还没有形成。

在东坡地方位、坐落的认识上，我们没有根本的原则分歧，明显的大同就在于我们的视点都进入了东坡地区了。有的是站在东坡地东沿的视点说话的，有的是站在东坡地的西沿的视点说话的，有的是站在东坡地南沿的视点说话的，即我是站在东坡地西沿和东沿的视点，张、王是站在东坡地南沿的视点来考证东坡地的方位坐落的。这就形成了我们界定东坡地 50 亩范围共同参照点了。我们要客观对待，再不要毋视存在于“郡东”、“州治东”、“东门”的东坡地东沿的客观实际，而过早宣判什么“明清时代的黄州城是在唐宋时期的黄州城址上修筑的”呀！什么“主张今日黄冈师院老校区、体育路一带系东坡雪堂所在地者，实际上都是把苏东坡的躬耕地误会成位于在黄州城外了”呀！这种宣判是不客观的，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应尊重古人和今人有关东坡地方位、坐落的考证，不要动不动就宣判他人的考证是误人子弟。我赞赏张龙飞先生的“大约”实事求是文风。他对陆游《入蜀记》中“自州门而东”句做出了审慎表态：“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此门是黄州城的东门，应该是出了东门，所以东坡在东城外；有的认为此门不是东门，实际上是临皋亭附近的门（西南方向），应该是自此门向东至东坡，游完之后再出城五里到安国寺，所以东坡在城中。我们反复推敲，如果仅从字面理解，还无法判断东坡在城外还是城中。”假若按照王琳祥先生的“又‘出城五里，至安国寺’，这个城门又只能是南门”语理解的话，实在有点离谱。请问：临江的南门至安国寺有五里路远吗？何况宋城南门比明城南门还向南远二里地哩！

历史地名也是科学。东坡地方位、坐落之争是正常现象，多点冷静谨慎，无须急于求胜。我们还是多以换位思考、磋商通融、存点小异为好！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山流水）

草野文化的力作

——读熊朝东《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

孙开中

一、令人迟疑的话题

熊朝东先生的《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出版以后，社会反响不一，热之者认为算得上杰作，读起来很对口味，有新意，启人深思，叫人爱不释手。冷之者则认为，关于苏东坡的传记全国各地近些年出版太多，炒陈饭的多，有新意者少。无论如何，这给评说者增添了难度，需要说吗？费力不讨好怎么办？

再说，熊朝东先生本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先报道三苏文化研究的新闻工作者，从了解到热爱，再从热爱到深入研究，一步接一步，他像拓荒牛一样，为弘扬东坡精神，“不用扬鞭自奋蹄”。三十年来，他出了专著近十本，硕果累累。作为东坡故里土生土长的草野文化的代表性作家和研究者，他的成就早受到国内苏学专家的肯定。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邱俊鹏表示：熊朝东的“作品文笔清新、活泼，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文学欣赏的雅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则热情洋溢地肯定熊朝东先生“集历史、学术、情感、理性、道德、艺术于一身的独特传记文学作品”，约言之，称其作品具有理论、情感、学术、艺术四个方面的独特品性。

面对这些享誉海内外知名的大专家的评价，不少人住口了，因为要么狗尾续貂，多此一举；要么随意胡说，贻笑大方。或者矮子看戏何曾见，只附他人论短长。其实这是文坛的老毛病，任何作品问世，都希望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应。反应越强烈，效果往往越好。无人搭理，反倒是一种悲哀。

好在熊朝东先生对人一向热情、诚恳，他不是那种眼睛只顾向上、只愿听好话的文学小青年，他

自信而不自我迷信，成熟而不自我陶醉。作为熊朝东先生的一名老读者、老朋友，本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态度，我不揣冒昧，决定不再缄口，很愿意像茶馆中的茶友那样，推心置腹而不必装腔作势地谈谈对《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的管见。

二、草野力作漫谈

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客观上都有一个适应范围、文化定位的问题，这不管作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事实就是如此。当然，文化本身具有流变性，人们的喜好、口味、阅读习惯也随时随地发生着变化。因而文化的适应范围、定位问题又经常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朝东先生基本上是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植根于三苏故里的文化气场，主要着力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三苏文化的宣传、开掘研究、利用而开展他的事业的。从他个人的经历看，说他具有草根性，绝无任何贬低的意思。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句名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多少年来，三苏的成就一直被大大低估，那场国人记忆犹新的文化大革命的“野火”，恨不能把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三苏文化，直弄个“灰飞烟灭”。恶梦醒来以后，朝东先生以“根正苗红”之身，一头扎进故纸堆，枯寂地进行着时人谓之“老古董”的三苏研究。他不是“科班”出身，对于大专家也感叹“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的苏学研究（参王水照《永远的苏东坡》），硬是奋不顾身地扎了进去。他的执着和牛劲，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不同于那些“老学究”，钻进去了就爬不出来。他似乎是一个深海的探宝人，他有自己的定海神针和检

测仪器，一旦从苏学研究中获得了什么宝贝，他会源源不断地，甚至不厌其烦地向新时代的人们展示和宣传。这就是苏东坡九百年后的乡亲——草根苏学专家熊朝东！

读了他的新作《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联想到他的全部著作，“草野文化”这个概念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草野文化是我杜撰出来的，相对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草野文化的原生性、边际性特征显而易见。其实《诗经》中的国风部分，《离骚》中的“九歌”、“九章”，就保留着当时草野文化的痕迹。一部《嘉祐集》，可算是中国古代草野文化的代表作。苏洵进京以后，奉命与人合著《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反而消隐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草野文化的原生性、边际性和发展性，赋与它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曾记否，唱彻中国天空的《东方红》当初不就是陕北地区的一首“信天游”么？据说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著名作家沈从文，其代表作也属于湘西“草野文化”啊！

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

（一）有为而作

新时期到来以后，长期遭受贬抑的苏东坡算是交了好运。苏东坡（还有苏洵）的作品分别进入大中小学教材，凡具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知道苏东坡、“三苏”。苏学研究由“危学”而逐渐成为“显学”。绘画影视、故事小说、百家讲坛，你未唱罢我登台，热流一浪高过一浪。这当中，既有科学认真的用心之作，也不乏随意戏说、娱乐化倾向严重的庸俗无聊作品，还有小肚鸡肠者自鸣得意的恶搞和炒作。

熊朝东先生在本书的引言中说：“2000年，法国《世界报》出于对历史人杰的景仰与尊崇，对人类发展的伟大历史追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了一次从1001年至2000年世界级杰出人物的评选活动，共评出了十二名杰出人物，称为‘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一名入选的中国人。《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西方人眼中的苏东坡》的评论员文章，予以全面介绍。”这段话，交代了本书书名的由来，说明作者眼光的开阔和高远。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是触发作者下力气重写苏东坡传记的诱因和远因。和老农瓜棚豆架下的古老故事不同，作者的动笔，有着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意愿与冲动。

有必要着重指出：《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的写作，一开始就有鲜明的目标性。现任中共眉山市东坡区委书记李晓宇在本书的序里表示：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孕育了三苏文化，三苏文化浸润着东坡故里。生在苏东坡的故乡，与东坡先生有缘，是一种福分。”这些年来，苏东坡的故乡是把“秉承三苏文化，弘扬东坡精神”当作增强地区软实力，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头等大事而真抓实干的。推出朝东先生这本书，已不是简单初级的“启蒙”，而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苏东坡、学习苏东坡”，朝东先生的著作，客观上起着深化地区改革和发展的教材作用。这种文化现象表明：优秀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已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和掌握。从“玩物”、“武器”，到推动历史前进、社会进步的清洁能源，反映了整个社会认识的巨大变化，或许这应当使我们对朝东先生的《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刮目相看。

（二）精巧构思

在中国历来的文化名人中，关于苏东坡的文字资料特别丰富。除了本人留存下来的多姿多彩的各类作品，还有正史、野史、笔记、传说及数不清的研究文章，涉及地域之广、人物之多、学问之深、影响之大，且不说望而生畏，至少令一代又一代的饱学之士望洋兴叹。

朝东先生自己说过：“我和苏轼同乡，……小时候就经常去三苏祠，循着他留下的足迹漫步，品其陈列馆内的名句佳篇，仿佛缩短了九百年的时间差，成为与他日夕往来、和睦共处的乡邻和倾心交谈的师友。”数十年间，正是这种令无数“粉丝”汗颜的执着和韧劲，丰富了他的大脑和行囊。称他“草根”，并非说他“痴迷”，孤陋寡闻，其实他是在学海中见过一些世面的人。所以他敢充满自信地宣称：“我将不遗余力地为弘扬三苏文化继续努力，不负做一个三苏故乡人。”

为苏东坡写传记，不愁没材料内容，难点在构思。首先“丹青难写是精神”，传主苏东坡一生究竟贯穿着什么精神，必须有深入的研究和整体把握。其次，纷繁复杂的材料需要一一鉴别、梳理、挑选。再次，用什么形式框架、描叙方式、语言风格把挑选的材料一一贯穿起来、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形神兼备、灵动精巧的整体，让人爱读、会读、开卷有益，这才是过筋过脉，考作者手艺的地

方啊！

《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全书二十万字左右，作者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从第一章“苏轼之名”开始，到第二十章“死必不坠”结束，全用四个字构成的精炼语言，组成全书每个章节的标题。并且每章标题之外，都附有一段概括而意在导读的文字。这种处处为读者着想的安排和规范作者自己写作的严谨作风，令人佩服。这和那种信马由缰、絮絮叨叨或雄辩滔滔，以征服压倒读者为目的的写作是很不一样的。

以第十五章“有德于民”为例，导读的文字为：“苏东坡与杭州的情缘，不但成就了他诗歌创作中最华彩的一页，而且治理西湖、救民于水火的功绩，更是他宦海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人生喷发的最炽热的生命之光。他‘有德于民’，百姓‘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一章文字并不长，却把苏东坡作文、做人、做官的情况高度浓缩和融合在一起，集中展现了苏东坡的人生追求和精神风貌，既点了题，同时揭示了苏东坡生前和死后备受人民群众喜爱崇敬的原因。

其它各章，章章有重点，章章有特色，共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始终激发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叫人难以暂歇。

（三）灼见新知

文章的价值，往往决定于是否有新观念、新内容。无新不活，无特色不立，在已有众多高手为苏东坡写传记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由传统的文人形象，“全能作家”、“保守派”等等，一跃为东西方共同瞩目的“千年英雄”，这是对传主的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整体性变化。《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恰好完成和体现了这种变化。而要作到这一点，就要广泛地吸收众多苏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并有作者的创新、发现和认同。

说实话，朝东先生这本历史人物传记，并不以情节的曲折生动见长。摆事实、讲道理、发议论，在传记中占据着十分显著的地位。抒情、描写等文学性手法，有一些，不多。值得特别珍视的，是人物传记处处体现的学术性。作者用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语言，不断地传达着新观念、新内容，向人们推出了一个真实、鲜活而亲切的伟人苏东坡。

第三章“东坡精神”，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它概括了一大篇或多篇学术论文的成果，独力表达了

自己对东坡精神的理解，言之有据，行文成理，对于认识和弘扬东坡精神大有助益。

至于第九章“密州出猎”，第十章“黄楼丰碑”，两章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苏东坡在地方官任上的政绩，突出了他爱民为民的情怀，大量引用苏东坡同期的诗文书词作，伴以深入精彩的分析，突出了文化型官员的典型特征。文章也写了苏东坡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心情，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苏东坡的成就与魅力。文章还引述了当代大专家朱靖华、大诗人臧克家的相关评说，增添了苏东坡业绩成就的信度，同时提升了传记本身的理论高度。

朝东先生坚定地认为：“苏东坡的伟大、崇高、杰出，不仅在于他是一位集文学、书法、绘画、音乐、医药、水利、酿造、烹饪、养生等于一身的全能大家，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一生为民请命、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彻底的民本主义者。即便他命运数度沉浮起落，其亲民爱民始终如一。他不唯上只唯民、正义就是一切的真正士大夫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真正的根，有着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上世纪自林语堂先生写《苏东坡传》以来，对苏东坡最全面、最深刻、最真诚的评价，虽然其中包括着数十年中他人的研究成果，但朝东先生的真知灼见包括胆识是令人佩服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人物的认识，突破了原先人为预设的警戒线。“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革命的宏大气魄和自信心，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过，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也确有一些“风流人物”始终被国人同胞惦记着，并引以为骄傲。这“风流人物”一词的发明者苏东坡便是众多历史风流人物中的一个典型。今天人们拂去历史的烟尘，至少欢迎他充当当代人生活的一面镜子，不正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

当然，朝东先生《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一书的看点还很多。

比如，关于苏东坡的家世，历来说三苏是唐朝名人苏味道后代，总觉牵强不踏实，这次经过考证，朝东先生在第一章“苏轼之名”中特地说明：“苏味道有一子名廷宪留于眉山。延续到苏洵之父苏序，已是第八代了”。可谓石头落地，令读者放心了。

又如苏东坡《泛颖》一诗，单独读来也很喜欢：“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

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觉得很有情趣，令人佩服“生活大师”的老天真，不过，仅此而已。但读了朝东先生的传记第十六章“颍水写真”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原来苏东坡在颍州面对着如何科学治水、具体如何执政为民的重大难题。“苏东坡喜玩水，是他的天性；而治水，是他的职责，从不懈怠。”“由此可见，苏东坡‘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的实质，尽在于思考解民水火的问题。”如我这类自以为有些苏学常识和研究能力的老书生，不能不产生恍然大悟之慨。

三、朋友的希望

当前，书评一类文章很不好写，不知是缺乏诚意还是受社会歪风邪气的影响，总之，要么满纸好话、溢美之辞，动辄“独创”、“特色”，文曲星好像马上降临人世似的，这种文字全类市场上的小广告，评论者自觉不自觉地降格为廉价的书托。虽然原书作者的态度并不一定如此认同，但彼此心照不宣、相互借重，以共同赢得市声和蝇头微利而已。还有要么空话连篇，言不及义，虽然下笔千言万语，尽情玩弄新概念，似乎学问高深莫测，但究其实，不过从地球的某一角落，甚至“三家村”私塾先生那里，借用了一下讲义罢了。真有点价值的书评，既需要论者的眼光和平时的积累，又需要能讲真话，不虚伪应酬的德行和智慧。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这些简单朴素的道理，谁都会说，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

恕我直言，《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力作”、“佳作”，但离严格意义上的“精品”、“经典”还有距离。

由于出版部门缺乏专人把关、校核，一些文字上的纰缪不容忽视，比如李廌《师友谈记》，弄成《师友谈话录》（53页）：“按捺不住”弄成“按奈不住”（57页），“恪尽职守”印成“恪尽责守”（171页），东坡名著《后赤壁赋》中“适有孤鹤”印成“适有狐鹤”之类，无论作者或读者就不能一概容忍或马虎过去了。

本书事涉学术方面的，也提一二。朝东先生说：“密州是苏东坡文学创作的成熟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创作了诗歌一百二十七首，词二十六首，文六十四篇，共计二百一十七篇。”（102页），持论公正严谨，很能服人。可后面又说：“所以，我们说

黄州是苏东坡文学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是他生命中最有趣的一个‘空间站’”（137页），前后对照，就难免使人惶惑了。又如“苏东坡的大舅子王淮奇将带来的一株荔枝树栽种在来凤轩书屋的窗下”（68页），不仅张冠李戴（王淮奇为“三老”之一，又名王庆源，系王闰之叔父），而且荔枝栽于何处，已属小说家臆想之言了。

如果进一步推敲，紧扣《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的中心，章节亦可作适当调整，有的需要充实、加强。既名之“千年英雄”，就不能只局限于苏东坡生前，显然身后的影响应纳入书的范围，不能一笔或几笔带过。

以上点滴，纯属朋友个人意见，不一定都正确、都采纳。

当今社会，心态浮躁甚至一门心思傍孔方兄的人多，能够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人实在凤毛麟角，朝东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作为已步入学术殿堂的草野派学者，不能满足于既有的成绩。古人讲：“十年磨一剑”，他的剑继续磨一磨，是可以而且有望纵横天下的。好心的朋友都静心期待着。当茵茵绿草布满每一座山冈甚至荒原之时，万紫千红的春天就会永驻人间。

2010年4月

（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山流水）



熊朝东著《生命之光——千年英雄苏东坡》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第1版

定价：28.00元

赤壁矶头唱大江

——记“赤壁山人”王琳祥

何志弘

我刚到《黄冈日报》副刊部当编辑的时候，王琳祥每有新作，总是亲自送给我。对于东坡赤壁年代久远、繁复浩瀚的史料，他进行详尽而通俗的评述和解读。读之，不仅使人亲切体会到东坡先生当年那栩栩如生的真实情景，更让读者欣赏到东坡先生那美如金玉的作品真义，给人以“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的审美愉悦。从此，我们也就成了文友。

近些年，因我与龙王山中“东坡雪堂”的另一种特殊因缘，我亦成了东坡迷，向他求教、与他交往的次数更多起来，我会常常抽空骑上单车，穿过闹市去东坡赤壁风景区拜访他。临近赤壁时，我便推车慢行，在林荫道的徜徉中回味苏子情怀。我更喜欢在王老师那坐拥书城的办公室里，品着他泡的绿茶，与他促膝相谈。我们谈兴颇浓时，常常谈得他办公室里室空人稀才想到下班回家；有朋自远方来，想去拜谒苏东坡，我也必然会领他们先去拜访王老师。今年国庆，师父游玄德道长的朋友、中国著名的白族女作家、《茶马古道》的编著、中国民族音响出版社副社长景宜女士，在去赤壁拜谒苏东坡前，我特地带他们去拜会王老师，正好他节日值班。在清寂的秋日里，我们沐浴着东坡赤壁别一样绚丽美妙的阳光，听着王老师去繁就简、如数家珍的解说，一路捡拾着“苏海”中的奇珍异宝，品尝着王老师日锻年炼用心烹作出来的文化美食，确有一种清虚朗净、超迈高古之感。景宜女士喟然长叹：“来黄州赤壁听王老师解读东坡先生，是真正的文化之旅；夜晚去雪堂礼拜东坡，赏明月，是最好的中秋之旅；明天去大别山的南武当拜张三丰祖师、拜道长，是虔诚的朝圣之旅。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

因为是朋友，王老师心中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他也会到我家来小坐倾吐。仍然是一个秋月朗朗的晚上，在我家客厅东窗下的榻榻米上，我们席

地而坐。看上去，他似有不快的惆怅。几盏茶后，我第一次问起他的身世和人生经历。缄默良久，他终于向我敞开了几十年人生经历的千千心结，那是一个至诚的东坡赤壁研究学者满含辛酸、九曲十八折的苦苦跋涉！

1978年，王琳祥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他学的专业是民乐笙。由于多才多艺，善诗工书，又配上堂堂儒雅的仪表，当年分在黄冈地区文工团时颇为抢眼出色，爱情也就顺理成章地来临。他与一位女演员相亲相爱。出于对苏东坡的景仰之情，他选在苏东坡《赤壁赋》写作900周年的那一天，即1982年农历七月十六日百年好合。新房里没有过多的陈设，只有王琳祥自己书写的赤壁“二赋一词”悬挂在卧室之内，给人的感觉新颖独特，韵味颇多。一年后，他们喜得一子，小家庭和美的生活也确实让单位同事羡慕不已。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是阵阵和风，人们追求知识的渴望暂时胜过了金钱和物欲。他们男才女貌、清贫雅致的生活，平静而幸福。那个时候，文工团排练演出，王琳祥除了吹笙伴奏，幻灯上的字幕都是他写，他的毛笔小楷非常好。当时文工团经常下乡演出，但不管到哪里，条件再艰苦，只要有空，别人嬉闹玩耍，他便找个僻静的地方铺开书案练习书法。乡镇中夏天蚊子多，他双脚浸在水桶里照练不辍，故被称为文工团的“憨秀才”，颇受人尊重。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呼呼劲吹，文工团里那些金钱智商高的精明人，纷纷利用业余时间下海捞外快，有的去舞厅伴奏，有的到外地串戏，有的还作起了买卖，他们的腰包很快都鼓了起来。然而王琳祥却仍然痴心未改地“猫”在屋里练他的书法，深研他痴迷的东坡文化。如此，同是一个团里的职员，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妻子开始对他多了不少埋怨。

由于钟情于苏东坡，王琳祥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1月调到了东坡赤壁管理处，他像

一个求知路上饥饿的人猛然得到了一块美味的面食一样，又一头钻进了当时众说纷纭的赤壁之战战地的研究之中。悠悠千年，关于真假赤壁、文武赤壁的考证辨析之争，时起时伏从未断过。赤壁古战场的确定，不仅是历史界的大事，也是文学界的大事，更是我们黄州古城的大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主“蒲圻赤壁”之说并广为流传，几成定论。没想到沉沙折戟似乎甘拜下风的“黄州赤壁说”冷不丁杀出了一匹黑马，这就是王琳祥。1991年，由王琳祥一手联系、组织的“中国首届三国赤壁之战学术研讨会”在黄州召开，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90多人云集一堂。研讨会上，风华正茂、才情横溢的王琳祥，亮出了以他为主笔著述出版的《赤壁战地考》。面对高手如林的学者们，他以广证博引且缜密务实的学术态度，慷慨陈辞。其端庄的神情，犀利的锋芒，详尽的论述，使学富五车的专家们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甚至连力主“蒲圻赤壁说”的几位擂主，也对他的论述颇为钦佩，不得不这样自圆其说——“蒲圻赤壁说，从旅游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有理由的。”可惜，王琳祥披肝沥胆洋洋万言的书生之见，仍然没有为黄州赤壁争来“赤壁战地”的确立，政治的综合力量偏向了蒲圻。尽管如此，外表温文尔雅内里却坚定执着的王琳祥，迄今为止，从没有放弃过自己一个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认定的信念。就是善良的妻子不堪贫苦，忍痛与他离婚而去，也没有将他从穷途窘境的“东坡赤壁”学术之路上拉回来。

他记得是1989年年底的一个很深的夜晚，他照例在客厅临时摆置的小床上书写论证赤壁的文章，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妻子要他关灯休息，他未曾理会，仍然埋头写着。恼怒的妻子从卧室冲出来，抓起他的文稿，“哗”地撕了个粉碎，血气方刚的王琳祥实在没有忍住性子，索性将小床前的桌子推倒在地。第二天，当王琳祥从赤壁下班回家时，妻子向他提出离婚，并将写好的离婚申请书放在他面前要他签字，一气之下，王琳祥当即就大笔一挥。就这样，一对恩爱相亲共同生活了七年的夫妻从此分道扬镳。提起这件事，王琳祥自我解嘲地对我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离婚证上签署的日期是1989年12月30日，与我1978年12月30日签署的大学毕业证书日期正好一样，只是毕业证的封皮是红的，离婚证的封皮是白的。这一红一白饱含着多少的无奈与苦涩！”

后来，又一位朴实素雅的女子走进了王琳祥仍然贫寒的生活，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这位中专毕业追求上进的妻子，不仅又为他生了个可爱的儿子，同时更支持他的学术研究。因为单位垮了，一向是单位工作骨干的妻子下了岗，但为了支撑丈夫的事业，支撑家庭的生计，要强的妻子曾摆过地摊，做过小买卖。虽然屈尊，她却坚强而乐观。可看到丈夫为了东坡赤壁没日没夜、淘沙沥金地撰写文章，从来没有节假日，从来没有顾及到家，壮壮实实一个汉子，为单位操劳得两鬓苍白，到头来名份没有，实惠更没有。风景区的许多家属在风景区里大小安排个事情做做，自己的丈夫却从来从不向领导提出要求，也从没有谁出面关照过，心中有一杆秤的妻子很为丈夫不平。王琳祥深感对不住妻子，可向来是委屈、痛苦缄默于心的他，只踩着月光来我这儿喝茶解闷。

清澈的月光透过窗棂洒了我们一身，他不禁雅兴大发地向我回忆起2001年10月中秋佳节：当时，黄冈市举办“东坡文化节”，召开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天晚上，他与苏学研究的同仁一行13人，深夜共游赤壁。皓月当空，一群苏学精英泛舟赤壁，扣舷击浆，追溯流光。在万籁俱寂的夜幕中，他们倾听着东道主王琳祥先生的娓娓解说，东坡昔日的听箫问月，洗盏更酌，“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旷达自适，强烈地感染着这群“世事多变而依然”的现代士子们。在汨汨的江声、静静的心声、悠悠的风声中，他们默默与东坡先生神会交流……那一幅令他陶醉的《现代士子中秋赤壁泛舟图》，在他的心头一悬已有5年了。虽然时不再来，但苏东坡那“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人生遐想，时时激励着王琳祥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苏海。为彰显东坡精神，他日以继夜，案牍经年，著述等身；为考察东坡遗迹，他山林石泉，心足俱到，胸有成竹。其实王琳祥本不是黄冈人，他祖籍新洲，但“赤壁山人”是他自称的最爱。的确，我以为“赤壁山人”这一称谓，王琳祥老师真正是俯仰无愧！

诚如著名学者朱清华先生在《赤壁战地考·序》中对他的赞誉：

健笔雄文辩短长，曹瞒焚舰在黄冈。

文武赤壁乃一处，更喜坡翁伴周郎。

（黄冈日报记者）

（责任编辑：山流水）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四）

池泽兹子

五 《四河入海》的注释和它的意义

为使读者了解《四河入海》的大体情况，这里举《四河入海》卷一之二《泛颍》一诗加以说明，这是《四河入海》比较典型的注释。苏轼的原文是大字，注释是小字。《芳》是《翰苑遗芳》，《白》是《天下白》。基本上每首诗的题下都用《翰苑遗芳》和《天下白》考证作诗年月和作诗时作者的情况。《一》是《一韩翁听书》（蕉雨余滴）。然后开始正文。《四河入海》的注释方法是先分段，然后从诗里抽选重要的词或句子把四个注释收集起来。苏轼《泛颍》本文如下（诗上边的括号表示《四河入海》的分段）：

[一段]

- 1 我性好临水 2 得颍意甚奇
3 到官十日来 4 九日河之湄

[二段]

- 5 吏民笑相语 6 使君老而痴
7 使君实不痴 8 流水有令姿

[三段]

- 9 绕郡十余里 10 不驶亦不迟
11 上流直而清 12 下流曲而漪

(四段)

- 13 画船俯明镜 14 笑问汝为谁
15 忽然生鳞甲 16 乱我须与眉
17 散为百东坡 18 顷刻复在兹

[五段]

- 19 此岂水薄相 20 与我相娱嬉
21 声色与臭味 22 颠倒眩小儿
23 等是儿戏物 24 水中少磷缁

[六段]

- 25 赵陈两欧阳 26 同参天人师
27 观妙各有得 28 共赋《泛颍》诗

这首诗是在元祐六年苏轼 56 岁的时候在颍州

作的。首先看一下题下注。在《四河入海》的题下注里，基本上都是说明作这首诗的写作年月。在这里有（1）的《芳》（《翰苑遗芳》）和（2）的《白》（《天下白》）都注释时间。

在《翰苑遗芳》中收集《施注苏诗》的注释。现存的宋刊《施注苏诗》残缺不全。但太岳周崇用施注的完整本做注释。因此《翰苑遗芳》最大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仓田氏的《苏诗佚注》里已经收集《翰苑遗芳》中的宋刊施氏佚注。其《凡例》4 云(2 页)：

翁文恭所藏宋槧原帙，回出各本之上，自无论已，顾尚缺十卷。其书原藏怡府安乐堂，或云怡王旧有二本，今不可问。求其全璧，未必能遇也。则施注遗失，终不可补欤。吾曰不然，吾邦禅林，承宋世风，诵习苏诗，缁徒递为讲解，笔录传受，约有数种，自王本外，复重施注，每为援用。天文三年(1534)僧笑云清三总揽众说，勒成一书，名曰《四河入海》，凡一百卷。四河者合四家之谓。而僧太岳周崇(1423 年寂)所著《翰苑遗芳》者其一也，其书称引施注最富，淳始发其隐，细阅笑云书，因摘出太岳所录，持校冯氏星实《苏文忠诗合注》所载施注各条，其宋本漫漶处，可据补者，殊为不少。至于宋本残卷(北京图书馆本)，试以照片对勘，宛如符合。乃知太岳所见，并无缺失。与环(小川环树)相顾欣然，莫逆于心，于是特囑铃木君……遍读全书，搜采数千条，遂成施注集本凡十数册。所憾太岳诸人，皆用王注分类之书为底本，均非编年。《四河入海》亦复如是。时环等未见真宋本，各诗先后之次，苦无从定矣。及观文恭本目录，以较牧仲所刊，邵青门删增各卷，颇有乖戾。今兹重新编排，悉遵原目，庶复庐山真面云尔。(《四河入海》

有抄本及古活字印本,《翰苑遗芳》只有抄本)惟太岳等于王注复出之文,稍为节略,而无害大指,冀读者谅之可也。

仓田氏在卷末的《注东坡先生诗与东坡先生年谱》中解释他们发现《翰苑遗芳》用施注进行注释的过程(原文为日文,池泽译):

那么,我们认定《翰苑遗芳》是施注,开始集佚过程呢,我们昭和三十二年(1957)调查《米泽文库》汉籍的时候,特别注目《东坡抄》,感到书中引用的八家注释中,只有《翰苑遗芳》的注释很清楚地出示典故,其他注释不能企及。我们心悦诚服,觉得在苏轼的研究上,此《翰苑遗芳》是非用不可的书。然后调查京都建仁寺两足院藏书的时候,拍成《四河入海》的缩微胶卷。我们把它和东福寺的手抄本《四河入海》比较一下。两足院本在跋中有笑云清三的印章,其中的注释比东福寺本多一点。我们怀疑它不是手抄本,但还是听说它是手抄的。后来我们读诗研究会以《合注》为底本,参考当时可以看到的各种注释,开始读东坡诗。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用《翰苑遗芳》可以很准确地补充《合注》的施注缺文。冯应榴等前人煞费苦心地用其他书考证补充的地方,用《翰苑遗芳》可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经过这些过程我们有把握,《翰苑遗芳》的注释是改编施注的。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太岳的工作,再加上当时北京的傅增湘记录的施注本(它本来缺少第八卷)的所在不明了。昭和三十六年(1961)对《苏轼诗古注的研究》上领科学研究费,我们趁这个机会,请当时参加读书会的铃木隆一、川胜义雄、笠沙雅章、西野贞治各位,抄写活字本《四河入海》一百册(近卫文库所藏本)中的《翰苑遗芳》注释。每首诗分别抄写,一共达到二百字的稿纸三千五百张。首先把次公的注释也一起抄,但后来分开抄了。在《翰苑遗芳》中有一些地方太岳在施注上加笔。比如在施注中除了在卷首的诗上有一些简单的注记之外,没写作诗的年月,太岳在每一篇上用施宿的年谱补充作诗的年月。还有在难懂字上加释音释义。

仓田氏在《〈东坡抄〉与〈山谷抄〉》(内田智雄编《米泽图书馆善本研究和解题》)里详细地介绍此书的情况。据他说,《东坡抄》这书是把《增刊校

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残七卷(存卷第1、第19至第24集,宋苏轼撰,宋王十朋集注,宋刘辰翁批点,朝鲜刊本),一段一段地贴在纸上,把注释(所谓《抄》)写在空白上。此书中引用《胜说》、《天下白》、《翰苑遗芳》、《东坡幻云抄》(月舟寿桂)、瑞岩龙惺、天隐龙泽、河清祖洌、兰波景茝八家的注释。

施注和王状元注不同,施注是编年注释,在《总目》卷数下写上作诗的时间和地点。

(1)《翰苑遗芳》对苏诗的编年,大概是根据施注《总目》的编年在自己的注释里写上作诗的时间和地点。

(2)《天下白》用两种年谱。一种是傅藻(字荐可,仙溪人)的《东坡纪年录》,另一种是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元祐六年辛未,本文如下:

秋七月,累疏乞外,且回避贾易。盖易与赵君锡弹奏先生不已,至摘先生元丰末游竹西寺诗语诬以悖逆。赖太皇察其无他、卒以自明。易与君锡相继逐去,先生寻亦补外。

可以知道《天下白》这个部分是根据施宿年谱。关于这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水照氏在《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的前言里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十云:“《注东坡集》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可知施宿此谱原附《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首以行。

但此谱国内亦久佚。康熙时见到宋刊《施顾注苏诗》的邵长蘅已云“施氏谱无考”(《施注苏诗》卷首《注苏姓氏》),冯应榴亦云“施武子所为《年谱》已不传”(《苏文忠公诗合注》卷首《年谱》案语)。今存《施顾注苏诗》本,仅有宋嘉定初刻本、景定补刻本,共四个残本,皆无施《谱》。日本已故学者仓田淳之助先生于1963年在京都旧书肆发现此谱抄本,原为富冈铁斋旧藏,即予购藏,并在1965年影印于《苏诗佚注》(与小川环树氏合编)一书,始传于世。

《天下白》除了参看这两种年谱之外,还用《方輿胜览》,其中有“颖人”的话和秦观诗,透过这

些资料，读者可以更一步了解当时苏轼的情况。

除了这些年谱之外，在其他的诗里，《天下白》还用了宋代编辑的珍贵年谱，这是何抡的《三苏先生年谱》。《郡斋读者志》卷五上云：“《三苏先生年谱》一卷，左朝请大夫权发遣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何抡。”王水照氏在《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的前言里云：

此书在国内已佚。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藏有旧抄本施宿《东坡先生年谱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一册（原件误题《东坡纪年录》，致使长期沉晦无闻）。……蓬左本中的何《谱》文字，一部分抄在书眉（书眉中又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的部分文字），一部分混入施《谱》的“纪年”、“时事”、“出处”、“诗”四栏。我从中辑得何《谱》文字四五千字左右。……此外，《四河入海》中引用何抡《年谱》达五十多处，与蓬左本相同者二十条左右，可补其缺者三十条左右。

题下注（3）是《翰苑遗芳》的注释。“次公”是在《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姓氏》中，有“西蜀赵氏次公字彦材”。《翰苑遗芳》除了施注之外还利用赵次公的注释。仓田氏在《凡例》6中云：

《翰苑遗芳》所引，除施注外，间标“次公曰”三字，为赵次公注，次公字彦材，西蜀人。曾注杜诗，冯星实云，见宋刊本不全本（后集七卷）曰五家注，次公既在其内，而编次一如七集本，是注苏诗之较早者耳。观其佚文，核以王本，实多遗漏，可见王本所删削太甚。而佚文则似从旧本录出者，赵氏间引胡仔说，胡氏撰《苕溪渔隐丛话》，在绍兴十八年。又赵注中敬避构字，亦有明文。则其刻梓亦当在高宗世矣。意旧时赵注单本尚传吾邦，而太岳犹及见也。今亦集录，而编次仍遵施注篇目，以其原书体式无可考也。其诗有太岳引次公注，而宋本前后集所未收者数首，附于卷末，称曰补遗，是为苏诗佚注之二。

他还在该书卷末的《关于赵次公注》中云（原文为日文，池泽译）：

东坡诗的赵次公注有单行本。本书《苏诗佚注》二里的都是在王状元本里未收的赵次公注。《生日刘景文以古画松鹤为寿，且赋佳篇，次韵为谢》诗的“何许构明堂”句下，有“构

字，次公本作口”的附注。“构”字是宋高宗的讳。赵次公的注是绍兴中的刊本中引用的。因此，这可以证明太岳看的赵次公本是有苏轼原文的绍兴刊本。而且考虑到现存的《东坡集》都是宋孝宗以后的刊本，可以说太岳看的是很宝贵的版本。另外本书第一百七十六页的《华荫寄子由》诗中有“卷首与子由别于郑州”语，这说明该书的编次是编年。……《翰苑遗芳》用赵次公的地方和王状元用的地方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和王本相同的地方。但是两本比较起来，王本引用的注释有删节，分量比《翰苑遗芳》中的少。如果把两本的赵次公注结合在一起，可以知道赵次公原来注释的分量是相当多的。

仓田比较两者说（原文为日文，池泽译）

王状元本的赵次公注文都很短，主要出示典故和直接讲解诗句的意义。这注释的方法，跟王状元本以前的注释方法差不多。可这次我们收集的《翰苑遗芳》中的赵次公注（太岳周崇抄录在王状元本里不见的赵次公注），跟这些中国的注释完全不一样。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形式，富于变化，很有意思。……南宋初期的赵次公注的特点第一个是首先分成段落，摘述大意，表示要点。大概受到赵次公注的影响，五山僧瑞溪周凤在《脞说》里采用了这种注释方法。第二个是在赵次公注中解释诗意的地方多，出示典故地方少，因此他的注释富有启蒙性。他注释杜甫诗的时候也有这样显著的特点。……赵次公注过字义字音，这些当然在王状元本里没有摘录的。他还用诗话，如上所述他用《渔隐》前集。当时诗话很流行，很多注释家利用诗话。

太岳周崇深深地理解赵次公注的特点和其重要性，所以把它都放在自己的《翰苑遗芳》里。以上主要根据仓田氏《注东坡先生诗与东坡先生年谱》里有关《翰苑遗芳》的地方，介绍《翰苑遗芳》的特点。

（未完待续）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唐雅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六）

——省费养财 社稷之福

雷金贵

二〇 苏东坡扯下了北宋的遮羞布

现在来说苏东坡的“厚财货”，就是丰厚国家财政，就是他的国家财政方略，这是他与王安石发生正面冲突的焦点。

苏东坡初入仕途，在凤翔做签判，有机会深入了解民情。凤翔紧邻西夏，西夏受北宋册封仅有二十来年，连年的战争，让甘陕两地饱受创伤，田地荒芜，青壮男子多已战死。一朝之战，十载难复。一路走来，苏东坡之所见，满目萧条，地荒人稀，人皆赤贫，苟延于世。透过民间的生存状态，苏东坡看见的是北宋面临的危机。读苏东坡凤翔时期的《喜雨亭记》，越过其灿烂的文采，我看见的是苏东坡那颗忧国忧民的心。苏东坡在祈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浪漫的举动，要装一笼子的云回家，酿为甘霖，以解旱灾。没有这样的心，哪里有“喜雨”的淋漓文气呢？

要说政治的苏东坡，他在凤翔所作的《思治论》，是不能不研读的。虽然，有关苏东坡的文选书籍，很少有选载它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较长的时间里，是用文的眼光，选看苏东坡。在纵横捭阖的《思治论》及其系列的策论里，苏东坡给北宋把脉的“三患”——无兵，无吏，无财——他有深入的剖析和对策。

一个小小的签判，居然在思谋朝政，好像有越位之嫌。

发展才是硬道理。苏东坡的两个梦想，或者叫做理想，一个富民，一个强国，而且，是有等号相连的。

所以他对北宋的常患无财，深为忧虑。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

看来，北宋朝廷的财政贫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寅吃卯粮，居然已经几十年了。这是个大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苏东坡用他犀利的目光，划开了皇帝和朝廷遮盖这个问题的遮羞布，不是天下的资财减少了，而是取之过多，又用之无度。

取，是杀鸡取卵的取，是竭泽而渔的取；用，是挥霍无度的用，是为所欲为的用。

取之无方，用之无度，和一个家一样，过的日子，当然就过得不周正，不顺畅，过得稀里糊涂的，春也荒，夏也荒，上顿有，下顿无。

北宋的尽取天下之利，苏东坡把它剖得血淋淋的，那是“衰世苟且之法”——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

征者，租者，课者，算者，皆指税赋也；而所谓榷者，是为专卖也。你看，这像不像一个想钱想疯了的人，什么死牛烂马的钱，都想要据为己有。

苏东坡对国家垄断经济，一直都不赞成，无论是初入仕途，以及后来到任何一个地方为官，无论是做副手，还是做一把手，他都在呼吁，要打破国家对市场的垄断。

苏东坡主张打破朝廷对资源的垄断，希图以市场手段配置资源。

苏东坡是熟读历史的人，善于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有益的借鉴。

有文字记载说，苏东坡发蒙读书，不是从人之初开始的，是由他的母亲程夫人教授历史而起的步。好多书上，都有关于苏东坡读范滂传的记载，无须我的赘言。我想说的是，苏东坡对北宋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的抨击，一定是受了历史启

发的。对汉朝忠直大臣范滂，苏东坡崇敬有加，对汉朝的兴衰，自然不会陌生。

我们这些后来人，对大汉王朝的一段历史，称赞为文景之治，或曰汉朝的一段盛世。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汉朝，对个体工商业的发展，施行放开搞活的政策，市场发展，经济活跃，国家税收充盈。之后的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再给个体工商业发展空间，一切有利可图者，皆实行国家垄断，国家财源由此而日渐萎缩，大汉王朝，从此走向衰微。

汉武帝有征讨匈奴之武功，却有扼杀“市场经济”之原罪。

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推动的新法，和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如出一辙。商鞅——桑弘羊——王安石——他们为自己的主子谋划的经济，一脉相承，思想的基础，都是从君天下出发。

生于蜀中眉州的苏东坡，对国家垄断的恶果，有切身的感受。苏家从其父辈起，致力于仕途，与蜀中农村经济因苛政而处于破产边缘，由此而造成家庭经济的日渐衰微，不无关系。

四川，因为地理的关系，偏安一隅。

但是自唐朝安史之乱，唐玄宗退守西蜀起，从前相对安静的僻远之地的四川，从此不再自我逍遥，而被卷入了时事纷争的旋涡里，而动荡不安。后来黄巢起义，逼得唐僖宗入蜀避难，遂有大批中原大户，以及各类名流人物，为了苟全身家性命，举家入蜀，他们带来大批金帛和物资，以及长安和中原成熟的文化。金帛物资充盈了蜀中之财力，文化融入蜀中，杂交了蜀文化。

草莽英雄王建，以起兵勤王为由，在四川落脚，到大唐帝国灭亡，王建趁此占领全川，自立为王，建立前蜀之国；前蜀被后唐剿灭后，受派治署的孟知祥叛而独立，建立后蜀之国。前蜀和后蜀，仅有六十余年。这期间，中原大地，纷乱未了，中央朝廷，还无暇顾及四川，蜀中物产，不需向中央输送一分一粒。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朝以武力荡平蜀地后，大批的财物被输往京都。又在蜀中推行严厉的国家垄断，蜀中物产，诸如盐、茶、马甚至蜀锦等，今天以十钱买进，明天就以十三钱的高价卖出。当时全国的茶叶还没有专卖，却独在蜀中强制施行。横暴的武力统治，残酷的经济压榨，激起了无以存活的蜀中民众的反抗。前面

我已经说过了王小波、李顺、王均的武装抗宋。这是苏东坡出生之前三十来年的事情，这件并不遥远的史实，苏东坡不可能充耳不闻，不可能睁眼不见。

王安石启动的变法，把北宋的国家垄断经济，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同样是力图为国丰财，两个历史巨人择取的道路，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是法家的君权集权道路，一个是儒家的民本民生道路。

写到这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在我国，无论那朝那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多灾多难的，刚一露头，就被无情的掐死了。根本的原因，是皇权思想在作祟，是集权思想在作祟。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臣民；率土之滨，都是皇帝的财产。哪里容得你个人发展壮大呢。

这样说，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我们在农业文明中待得太久，直接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不发展。苏东坡希望剪除北宋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实质是要农业富裕，是要工商业发展，最终达到强国目的。

我想以就近的事情为例，表达我对苏东坡远见卓识的崇敬。

我们想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个体工商业的不同命运。之前，她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被无情铲除的；之后，是被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之前的农业，是大锅饭的农业，却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后的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一下子就把把农业的束缚解放了。我国经济由此而步入恢复、健康、快速发展时期，由此见得“市场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演进，见得“市场经济”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至关重要。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无不是从“小打小闹”的个体工商业起步的。当代中国，仅以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商贸业来说，有几多不是个私性质的，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已经逐步归位，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自承担着各自的职责，各自演绎着各自的角色。

所以，我十分的佩服苏东坡，在千年以前，就从“民惟邦本”出发，力主多予少取，力主取消朝廷的各种“权”权，力主发展农业，力主发展工商业，因此而裕民而强国。

一方面要开源，一方面要节流。

苏东坡对北宋朝廷的用之无度，予以无情的揭露，把北宋身上的脓泡，一个个都戳破了。

其一，每年，朝廷对西夏、契丹所谓赐予，而实质是拿钱买苟且之安的开支，庞大得惊人，银数十万两，绢数十万匹，茶数万斤。

其二，朝廷和皇家每年的“无益之费”，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

其三，同样是无底洞开支的，是惊人的官费和惊人的军费。

现在有一个说法，指责别人的问题，说起来是头头是道，要他拿一点主张出来，却是比黔驴还要技穷。

苏东坡是口头派吗？

肯定不是。

苏东坡不仅看见了问题，还有明确的主张，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还敢于千方百计，因法以便民。这个，我想在后面的文字里来说。

二一 小河流域江河满

现在来看，没有经济学家帽子的苏东坡，又如何“丰财”？

苏东坡“厚财货”的主张，我把它归纳起来，用现时的话说，一是广辟财源，二是节用财富，或者说叫开源节流。

苏东坡的裕民策略，核心是多予少取，其实就是开源之举。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万涓细水，方能成河。国家与个人，不是锅与碗的关系，国家与个人，是小河与大河关系，是大河与大海的关系，是大海与海洋的关系。

苏东坡“轻赋役”、“均户口”、“劝农桑”等等裕民方略，那是开源。发展才能开源，没有生产，没有能力生产，就无源可开。广辟财源，不是变着花样收钱。苏东坡主张的是培育财源，如同打井取水，得有长久的水源，不然，打一口干井，取水不成，反成陷阱。苏东坡的这些发展经济的思想，前面我已经说过，现在来说苏东坡的节用主张，即开源之后的节流。

节用的前提，是廉取。

苏东坡说，要成功的治理天下，需要皇帝后宫，需要朝廷百官，省俭费用，以满足人民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苏东坡警告说，如果广取人民

财产，一味满足皇帝和朝廷的穷奢豪欲，皇帝的龙椅将坐不稳当。

苏东坡以周朝为例子，在文王武王时候，“国不过百里”，但是，因为实行积极的发展政策，“关市无征，山泽不禁，取于民者不过什一”，所以才“而财有余”；然而到了周朝衰败的时候，由于挥霍无度，所以虽然“内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国之贡”，但是仍然“而不足用”。

苏东坡又用形象的说法说，一家人，只有十金之资，只要会用，一切开支，不但都能满足，而且还有宽余；等到稍微有了积蓄，就开了其他开销之门，欲望之门一开，亏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苏东坡贬谪黄州时，一大家子人，钱很拮据，就把钱挂在屋梁上，计划着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仅度过了十分艰难的日子，而且过得有滋有味。如果换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还有后来的苏东坡吗？所以，用钱，节用或者豪奢，与生活的态度有关。

苏东坡毫不留情的批评当朝，不做推动生产发展的工作，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穷竭虑以广求利之门”。

苏东坡还做了深入的阐释，他苦口婆心的劝戒皇帝说，一国之治，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

国家每年收入节用有余，那么，经年的积蓄，就足够官府用来应对“水旱之变”，“盗贼之忧”，而且，关键的关键，还不要老百姓出一分钱，出一斤粮食，“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这是苏东坡矢志追求的万世之计。

国家一年的收入仅够支出，平常的年间，“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不可以动，可逸而不可以劳。”此乃一时之计。

而不终月之计，乃是杀鸡取卵，量出为入，不够使用了，就尽用衰世苟且之法，搜刮民财，国家急难之时，却没有一点抓拿。

苏东坡的廉取，就是要求政府减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他指责“禁关、征市、租盐铁、榷酒、谋茶”等，“求利太广而用法太密”。

为此，苏东坡奉劝皇帝，你已经富有四海了，就不要与百姓争锥末之利。

夫兴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

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利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也，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苏东坡的忠告，后来不幸而被言中了。

苏东坡目光犀利，看清了事物发展的方向。

苏东坡的节用，目标很明确，或者说，现实的针对性很强。首先杀向了皇家王族的禁区——

一个是，耗费无度的祭祀，和活动频繁的皇家节庆。每三年，宋皇帝要举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皇帝都会慷国家之慨，大把大把的银两，赏赐随行的官吏们。皇帝是玩高兴了，大臣们得了赏钱，得了实惠，当然也跟到安逸了。那个时候，自然没有节庆搭台经济唱戏的借口，纯粹是一种“势”的铺张。

一个是，大修宫观，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巨大。“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在苏东坡看来，皇帝做这个事情，本来已经很过分了，但是，皇帝不仅如此，为此还要派出大臣，专司这个事情，每年的花费，那是以巨万而计，那是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黑洞。

一个是，节制后宫花天酒地的无底洞开支。苏东坡的胆子很大，他不怕得罪皇后娘娘，或者皇太后，或者太皇太后，以及皇帝的宠妃爱妾，她们都是在皇帝身边吹耳边风的人物。他把后宫的耗费无度，视为拿钱向西夏、契丹买安宁一样，乃祸国之举。

看看苏东坡说得可有道理——

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而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促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

一个是，皇帝兴之所致随意开支。苏东坡举例说，你神宗皇帝，要过元宵节，你要过就过吧，却偏偏要强行的贱买四千盏浙灯来玩。苏东坡严厉指责“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民）口体必用之资”。

在苏东坡的眼里，这样的无底洞一般的开支，统统是“无益之费”，必须要剪除。

这些开支，十分庞大，又尽是肉包子打狗的勾当。

苏东坡的指责，不是无中生有，不是硬要去惹是生非，也不是苏东坡吃了豹子胆，偏偏要和

皇帝后宫过不去。我看见的是，士大夫的忠心，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因为无私，所以无畏。

其次是挥刀冗官冗吏冗兵，简而言之，就是要精兵简政。精兵，前面的文字已经说过；简政，后面的文字将有叙说。

初入仕途的苏东坡，年轻而理想，满腔热忱，口无遮拦，笔无阻挡，欲以其裕民政策，实现其强国梦想，由此而为北宋王朝，寻求一条万年之策。

老实说，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千年以前的苏东坡，就已经站在百姓立场，拿出一整套治国安邦方略，以民为本，荡涤振刷，很先锋，很高瞻远瞩，很深谋远虑。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考核，利为民所谋的苏东坡，当是一个出色的亲民官员。

但是，苏东坡是以其理想之举，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

你要拿皇帝开刀，你要拿后宫开刀，皇帝当面可以表扬你，后宫当面可以称赞你，内心里，却是给你记了一笔的。尤其是，你要裁减官员，裁减官费，改革军制，要动的奶酪，不是一个人的奶酪，是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甜蜜的奶酪，这还了得。

苏东坡荡涤振刷的思路，是要自上而下的。而且要触及皇帝、朝廷、百官的眼前利益，而且又要见效果，吹糠见米，虽然，仁宗皇帝是欣赏的，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重用苏东坡，就撒手归天了，虽然留下了政治遗嘱——东坡兄弟是他为子孙选拔的宰相人才，却被后来的皇帝束之高阁；即位的英宗皇帝，是想要执行仁宗皇帝的政治遗嘱的，但是，他却是个短命鬼，只坐了四年皇帝，恐怕龙椅都没有坐热火，就一命呜呼了。之后的神宗皇帝，年轻气盛，急于有功，而建立自己的威信，同样激进的王安石出场了。

神宗皇帝，喜欢苏东坡的诗文，可以读得废寝忘食。但是，他不喜欢苏东坡的改革思想，这是个怪事。

苏东坡的一整套设想，因此而被放到了一边。

（未完待续）

（眉山电视台副台长）

（责任编辑：唐雅兰）



悼 词

——哀挽孔凡礼先生

刘尚荣

（孔凡礼年轻时照片）

孔凡礼，字景高，1923年出生于安徽太湖，2010年8月20日1时28分逝世于北京温泉医院，享年88岁。1947年毕业于安徽大学，1952年进入北京三中，是优秀的语文教师，也是著名的苏学专家；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也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顾问。点校整理《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编撰《苏轼年谱》、《苏辙年谱》、《三苏年谱》、《孔凡礼文存》等专著40种，发表论文三百篇。

庚寅年七月十一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孔凡礼老师的宝贵生命，时年88岁。

敬爱的孔凡礼老师出身贫寒，长于乱世。在故乡完成了中小学学业后考入国立安徽大学深造，1947年毕业即失业，困居安庆，在凄风苦雨中迎来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从家乡的小学中学师范开始其教学生涯，1952年辗转进入北京三中担任语文老师至今。

孔凡礼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为人师表，严于律己；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认真备课，传道解惑，处理教材有独到见解，课堂讲授又充满激情。他对学生一视同仁，从不训斥，和蔼可亲，呵护备至。他关心学生成绩提高，更关注其身心健康成长。因此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亲如一家。以至于孔老师1956-1959年跟班带到毕业的七十余名同学，在告别三中45年后，竟有多达41位同学重新串联集结，为孔老师举办“孔凡礼学术活动45周年暨80华诞庆典”。并集资赞助孔凡礼出版了个人旧体诗集《熙湖诗抄》。（六年后又有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中校友借校庆之机再相聚，为《孔凡礼文存》的出版发行送上了衷心的祝贺。）面对学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不谐和音泛起，孔门弟子的义举和壮举率先奏响了“尊师重教、不忘感恩”的主旋律，《光明日报》

等媒体做出的及时专题报道，昭示着孔老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教书育人的实绩，也证明他是一位好老师。

1958年孔凡礼先生以陆游资料汇编为其学术研究的起步，进而与中华书局合作至今，是中华书局最忠实、勤奋、敬业的作者。孔凡礼与书局合作时间之久，相互理解之深，承担任务之重，奉献著作之丰，在书局近百年历史上均首屈一指。由他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享誉海内外，已有日语节译本单行问世，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走向世界的先河。他编的《范成大佚著辑存》、《全宋词补辑》入选“近百年最有影响之宋代文献辑佚”六大成果（居其二）。他推出编年体《增订湖山类稿》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李一氓组长的公开表彰，他编撰的《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他整理古籍，研究文史，鸿篇巨制，层出不穷。他治学严谨，精于考订，拾遗补缺，资料扎实，去伪存真，见解新颖。终其一生，出版专著四十种，发表论文三百篇，总计达一千三百万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老师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呕心沥血，一息尚存，奋斗不止。他无愧于“无冕学者”的雅号。

孔凡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眷恋故乡，甘于清苦，默默奉献，醉心学术，矢志不移。他自号四平居士，向往着平平静静、平平淡淡、平平常常、平平和平的生活，最后是平平安安地走完了平平凡凡而又大放异彩的人生路程。

桃李满天下、著作传九州的孔凡礼老师，学生为你骄傲，友人为你动容，亲人愿你安息，让我们共同祈祷：孔老师，一路走好。你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一部编审）

（责任编辑：山流水）

一蓑烟雨任平生

——悼著名学者孔凡礼先生

余世磊

201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古城西安，当年杜甫典衣换酒的曲江之滨，细雨纷飞，秋凉拂人。手机里接到一个信息：“今日1时28分，孔凡礼先生在北京温泉医院逝世。”尽管心里对此早有预感，但还是感到突然、震惊、痛心。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个像孔老一样真正淡泊名利、执着学问的“怪人”、“傻子”。他是安徽省太湖县人，生于192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1950年初到北京治病，应聘北京三中教员。利用京城优良的治学条件，他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主攻宋代文学。36岁那年，其妻病逝，终生不娶。1961年，向校方要求停薪留职，从此，每天带几个馒头，泡在国家图书馆，采取“竭泽而渔”的治学方式，即把图书馆有关的书全部通读，做出笔记。其治学涉猎陆游、范成大、郭祥正等宋代大家，重点攻“苏（轼）学”，出版了《苏轼年谱》等著作50多种，近2000万字，是当代公认的“苏学权威”，在海内外都颇有影响。

中华书局的领导欣赏孔老，想调孔老进入书局工作；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几次找孔老，邀请他加盟……这些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都被孔老拒绝了，他不想让太多的俗事影响做学问。因此，他这辈子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甚至连一个职称都没有。自然，也得不到位子、房子、票子，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一间几个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连个卫生间也没有。真可谓“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孔老不改其乐。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曾搬至北京大兴租一农舍著书立说。近年因年迈搬回市里，生活过得极其拮据。今年春上，因要穿过街道，到对面上厕所，不慎摔倒，对身体摧残很大。8月初，再次摔了一跤，送到医院，药石罔效，与世长辞，享年88岁。

作为孔老的同乡后学，我三生有幸，与孔老结下一段厚缘。15年前，我作县报的编辑，给孔老赠寄报纸，由此结识孔老。我与孔老仅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太湖中学邀请他回乡参加校庆，一次是他为太湖县图书馆捐赠手稿。见面虽然不多，通信却不少，其中不少是我求教他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的回信，用的都是纯蓝墨水书写，字小如蚁，密密麻麻，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便是勉励我为发掘家乡历史文化多多用功。再之外，孔老知道我爱书，每有新著出版，总会签名赠我，包括煌煌三大厚册的《三苏年谱》。如今，我客厅的书架上，他的书占了将近两格。孔老的平易、亲和、认真，每每令我这个晚辈深深感动。从今以后，再也读不到由他用纯蓝墨水写就的书信了，再也收不到由他签名的大著了。

为聊表对孔老的感谢，我每年给他寄1斤家乡的茶叶。今年，我的一本关于朴老（赵朴初）的书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孔老应请欣然为序。早春，我还给孔老打过电话，听他声音洪亮，他告诉我书出后，一定多寄他几本，他要送人。可叹我的这本书因为多种原因，直到现在还未面世，对于孔老，也成为我一个遗憾。7月中旬，我从一位老师的博客上看到孔老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瘦骨嶙峋，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即给孔老写去一封信表达问候，同时给他寄去1斤茶叶。7月30日，收到他的复信，向我表示谢意，这封信只有寥寥数语，语句已有些无伦次，想不到，竟是他留与我的绝笔。

见面中的孔老高大魁梧，家乡的熟人都说：孔老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的。我想，如果社会能给孔老一些更好的条件，或者说，如果孔老不放弃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也许会多活几年的，也许会有成就。（下转79页）

挽词 唁电

孔凡礼先生千古

张志烈

哀电闻中国，文星陨北燕。
壮心存海岳，浩气辅眉山。
功业追歆向，辞章绍孔颜。
三苏年谱在，伟碣世间传。

2010年8月21日

千秋岁二首

沉痛追悼孔凡礼先生，为祈冥福

刘尚荣

星霜流换，孤彩横天半：宋词补，苏集变。
放翁悬案多，元量亦非贱。无所好，一生兴致唯开卷。
垂暮逢清晏，堆案书山乱。学友见，皆惊叹。不移立誓志，著述名山愿。翘首处，鸿篇巨帙非虚幻。——其一

星移物换，岁月销磨半。人虽老，因时变。
素心诚可贵，岂信古书贱。抒壮志，研读整理万千卷。
难料温泉晏，月冷行云乱。竟撒手，须忧叹。芸编清理罢，告慰平生愿。公去也，流芳百世谁云幻。——其二

庚寅七月十七日

唁 电

孔凡礼先生家属：

惊闻噩耗，悲痛万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淡定处世，勤勉治学。著述等身，泽被后世。
无冕学者，苏学大家。驾鹤西去，一路走好！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2010年8月21日

孔凡礼先生家属：

凡礼先生与世长辞，我们痛失诤友，学会痛失顾问，学界痛失泰斗。走好，凡礼先生！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邱俊鹏、曾枣庄
2010年8月21日

孔凡礼先生家属：

惊悉孔凡礼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孔凡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苏轼研究专家、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顾问，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苏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谨向孔凡礼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此致

敬礼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2010年8月21日

（上接78页）

没有必要指责这个社会的势利，社会有它的游戏规则，更不值得议论孔老的迂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孔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财富，但我以为，还有非常重要的，是他以他的一生，恪守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淡泊名利、好学敏求的高尚德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而这些，也正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学人最为缺乏的。

去年，去省城合肥开一个纪念朴老的会，见到一位编过孔老的书的编辑，他告诉我：“你们太湖县除了朴老，还有一个孔老，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给我讲一个孔老的故事：孔老总是写作到深夜，太困了，就离开家，在家门口搭上一辆公共汽车，随车晃动打个瞌睡。车子绕了一圈，回到家门口，再下车，继续他的工作……

孔老去矣，他总算可以放下他的笔，好好地歇一歇了。我更相信：他会沿了时空的隧道，回到宋朝，和他多么熟悉的苏东坡、陆游、范成大等在一起，尽情地嬉游。“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们都是有些固执的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

（责任编辑：山流水）

三十而立 继往开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年举行纪念活动

本刊讯（流水）8月18日至1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名苏学专家聚会东坡故里眉山，参加纪念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年系列活动——第10届理事会、参观三苏祠和学术研讨会。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召开全国性苏轼学术研讨会16届，举行不挂届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活动7次，在三苏作品整理出版、三苏研究专著及生平传记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30年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组织机构日益健全，成果转化成效显著。30年来，该学会对促进东坡文化宣传与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30年发展壮大，主要有一批著名学者积极参与，有苏轼遗址地党委、政府积极支持，有国内外苏学爱好者的

热心加入，中华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苏轼研究热潮。

18日下午，召开了学会第10届理事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作总结报告，对苏轼研究学会30年辉煌历程作了回顾，对今后5年学术研究及重大活动指明了方向。此次会议还修改了章程、增选了顾问、副会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38人。19日上午，举行了“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蔡心华主持，张志烈会长等8位与会专家作了精彩的发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眉山市政协主席苏灿作会议总结。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10届理事会 新增顾问、副会长、理事等名单

顾问（2人）：

孔凡礼（北京三中） 刘尚荣（中华书局）

副会长（1人）：

涂普生（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

副秘书长（2人）：

惠光启（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

张龙飞（黄冈市赤壁风景管理处）

常务理事（12人）：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 木 斋（吉林大学）

王兆鹏（武汉大学） 黄鸣奋（厦门大学）

康 震（北京师范大学） 雷汉卿（四川大学）

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 张海鸥（中山大学）

金生扬（西华师范大学） 崔海正（济南大学）

韩国强（儋州市东坡文化研究会）

刘清泉（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理事（21人）：

彭 华（四川大学） 吕肖奂（四川大学）

李咏梅（四川大学） 潘殊闲（西华大学）

马斗成（青岛大学） 李景新（琼州学院）

王启鹏（惠州学院） 杨子怡（惠州学院）

王影聪（眉山市委） 阮 忠（海南师范大学）

王琳祥（黄冈市赤壁风景管理处）

赖正和（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

孙开中（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胡先酉（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苏士福（栾城县苏轼文化研究会）

苏 慎（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邵玉健（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齐会斌（凤翔东湖风景管理处）

尧 军（吉奥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王 伟（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何小苇（乐山师范学院）